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目 录

- 私立奋斗中小学校史料辑要……郭轶平（1）
- 国立绥远中学始末……王崇山（62）
- ✓ 洋教士逼我走上革命征途……刘进仁忆述
田聪颖整理（71）
- ✓ 解放前后天主教在河套地区活动点滴
……邹国华（102）
- ✓ 天主教会在后套的历史简述……刘景冲（109）
- ✓ 三盛公天主教主教座堂历任主教情况
……郝威（117）
- 傅作义的稽查处、督察处与国民党的
的缉私处……王兴亚（125）
- 抗战时期傅作义在河套地区举办的绥干团
……董炎炳（136）
- 乌拉特中公旗世袭札萨克政治制度概述
……罗布森那木吉拉（遗作）（152）
- 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
……吉林太 罗布森那木吉拉 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胜道翻译（198）

私立奋斗中小学校史料辑要

郭轶平

奋斗学校是傅作义先生抗日战争时在我盟创办的一所中小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几度迁移，但我盟陕坝是该校的创业基地，它为我盟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巴盟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傅作义先生军人出身，半生戎马。他在军事之余捐资兴学，聘用了一批造诣较深的知识分子治校，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学校有长远的设想，健全的组织，明确的培养目标，严格的规章制度，因而办得很有特色，在河套地区声望较高。

笔者因编修巴盟教育史志之便，走访了原奋斗学校教师徐秀泉、郭步云、韩光等前辈，同时也访问了刘静仁、柴如璧、高炳炎等知情者，还查阅了有关原始档案资料，汇成此文。

奋斗小学

一九三七年，日寇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

不久华北沦陷，全国告急。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奋起抗战，给日寇以一定的打击。但终因日寇锋芒正锐，归绥失陷，傅作义率军退守绥西后套，随军眷属团安置于宁夏宝丰县黄渠桥。

日寇入侵，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傅部撤出省府归绥，军政干部子女大量失学。眷属团驻地黄渠桥和临时省会陕坝市，学校极少，难以容纳大量失学的儿童。面对这种现实，傅作义本人以及部属焦虑不安，自办学校就成了傅先生酝酿已久的计划。远在一九三六年百灵庙抗日战役之后，傅作义就开始约集同人，筹募经费，准备实现这个办学计划。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傅作义先生经多方努力，草创奋斗小学于宁夏黄渠桥，聘请蒋志伟女士做校长并兼任教师。初创的奋斗小学规模很小，只有一间教室供教师办公，学生上课用，另有三间土房作学生宿舍。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奋斗小学宣布开学，五月六日正式上课。入学的儿童虽仅十七名，却分在六个年级，性质与私塾无异。正如校长蒋志伟在筹备报告中所

说：“住在黑暗的小屋里，要出去找校址，回来写计划，饿了还得自己动手做饭。”创设匆促，规模简陋，可见一斑。

奋斗小学创立之初，傅作义先生明确指出了办学的目的。他说：“中国极弱，已及百年。瞻国之士，不曰实业之不兴，即曰军备之不振……，其较深入者则谓文化之落后。故吾人领导干部，欲求其功，宜养其力；欲责其廉，先释其累，余立斯校，意即在此。明白言之，即所以为国家育人才，代干部教子弟，能使仰事俯畜之不忧，始有高风亮节之足言也。”

在这里，傅先生指出了中国贫穷挨打的原因是文化落后。改变这种现状的措施，傅先生认为是要使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安于职守，全力务政，有所建树。但保证干部有充沛的精力，必须解除他们的家庭负累，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创立奋斗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替干部教育子弟，为国家培育人才，解决了干部的后顾之忧。

一九四一年，傅部随军眷属团迁至宁夏石咀山，奋斗小学随迁该地。田玉册续聘为校

长。学校规模有所扩大，设备稍有增益，课程设置遵行中央政府教育部规定标准，采用统一教本授课。

一九四二年八月，奋斗中学在陕坝筹设，次年春，奋小即迁往陕坝与奋中合为一校。到陕坝后，奋斗小学采用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的学制，按程度将学生编入各个年级，从此成了正规的完全小学。

一、奋斗小学的组织与行政

奋小迁至陕坝后，本着逐渐发展、力求实效的原则，重新部署，其组织情形如下：

(一) 傅作义兼任校长。郭揽青出任奋小校务主任。后来由于学生日多，校务日繁，旋增聘唐自强为副校务主任。校务主任遵照校长之命主持校务，总揽校政。

(二) 校务主任之下，设级任教师八人，管理八个班的班务；设科任教师五人，主持各科教学；设事务员、书记员各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后勤事务。

(三) 学校在校务主任之下，分设教务、

训导、事务、会计、文书、自治、学籍、卫生、图书、成绩、统计、游艺、体育、课外活动和推广教育等十五股。全校教师分担各股工作，减少行政人员。

（四）奋斗小学在每学期始，各举行一次校务会议（多与中学联合举行），研究教学计划，总结教学经验。另外，每星期二与星期五分别举行教学研究会及行政会议一次，进行教研活动，研究行政工作。必要时，随时召开各种临时会议，商讨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

奋小迁陕后，起初确定了以下行政原则：

- （一）准时上下课；
- （二）功课教会教完；
- （三）实行教室常规；
- （四）严整集会秩序；
- （五）提倡高尚游戏；
- （六）创造勤奋校风。

不久，对上列行政原则进行了增补，共八项，包括：（一）继续六项工作；（二）贯彻校长“八训”；（三）增补战时教材；（四）研究教学方法；（五）实行严格管教；（六）倡导儿童自治；（七）履行工作日记；（八）创造勤奋风气。

按照总的行政原则，学校每年定有当年的

行政重心，对各项工作做具体布置和要求。例如，一九四四年秋，奋小规定了当年各部门的工作任务：

校务主任：总揽校务，肆应内外。

副校务主任：推进校务，发动工作。

级任教师：严管严教，处理级务。

科任教师：各科教学，教会教完。

教务股：教学研究，注意效果。

学籍股：月月整理，随时添补。

训育股：确定中心，切实训导。

自治股：纠察督导，特别加强。

体育股：普遍发展，特殊进步。

卫生股：学生整洁，环境卫生。

课外活动股：分组推进，充实内容。

游艺股：周会活动，临时表演。

图书股：购置保管，尽量利用。

成绩股：架上成绩，每周更换。

文书股：保管公文，草拟稿件。

统计股：各种活动，统计结果。

会计股：把握预算，撙节开支。

事务股：人物管理，力求适当。

推广教育股： 联络家庭， 教育民众。

事务员： 管理杂务， 训练校工。

书记： 缮写文件， 帮办杂务。

二、奋斗小学教师

奋小教师同奋中一样采用招聘制，招聘教师兼重才学，例如，一九四四学年度的十七名教师中，有大专学历者二人，有师范学历者七人，高中毕业、肄业者二人，中学毕业肄业者五人，高小毕业者一人。除事务员是高小生，任课教师全部是中学毕业以上程度。除正校务主任、事务员、书记三人不任课外，其余十四位教师都任课，多者每周每人三十四节，少者每周九节，一般任课都在二十五节以上。这十七名教师负担着高初两级八个小学班四百七十二名学生的课业，分担着学校十五个行政股的事务工作。每个教师基本分担一个股的事务。学校订有作为教职员行为准则的《私立奋斗小学教职员信条》十则，其内容为：

一、我们相信：教育儿童，是效忠党国的基本工作。

二、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是一种事业，不仅是一种职业。

三、我们相信：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家庭。

四、我们相信：我们是儿童的慈母，民众的顾问。

五、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是有兴趣的，有规律的。

六、我们相信：教育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七、我们相信：教育儿童，是没有地域、没有时间、没有范围的。

八、我们相信：教导儿童的效率，莫过于以身作则。

九、我们相信：教导上最好的方法，是师生融和—气，共同生活。

十、我们相信：我们有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另外，学校对教师日常工作、生活是这样要求的：

每日早起，参加升旗。在校食宿，绝不破

例。教育儿童，毫无偏私。批改作业，切实积极。上课下课，绝对准时。每次教学，充分准备。谈话重心，集中教导。各种集会，全体出席。热心负责，协助他人。乘时进修，充实学力。

可以看出，奋斗小学对教师要求是严格的。

三、奋斗小学学生

奋斗小学招生对象以“绥西前方干部子女”为主，“以成绩之优劣，为取舍之标准。学生经录取后，须找保证人，填写保证书，然后编级上课。”家长不能担任保证人。保证人必须由二人充当，一个必须是武职少校以上的军官或文职县长以上人员，一个必须是本陕坝市的殷富商号的经纪人。保证人要亲自填写保证书并签名盖章，并对学生在校行为负全部责任，学生损坏学校财物，保证人负责赔偿。学生交保证书后才能入学上课。这种制度在陕坝奋小一直实行到抗战胜利、傅作义回师归绥为止。

从一九四四年的在校学生可看出该校学生家庭构成情况：该年在校共四百七十二人。

其中军职人员子女二百五十九人，政府工作人员子女一百三十八人，党团部门干部子女三十五人，教职员子女十七人，其它部门干部子女只有二十三人。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军部和绥远省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份迁回归绥。军政干部子女也大部返回归绥。此后，留在陕坝的奋斗学校开始根据成绩录取社会上报考该校的学生入学，其中也包括一些贫寒人家的子女。

四、奋斗小学的教学工作

按照民国三十一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小学新课程标准，奋斗小学开设下列课程：公训、读书、说话、作文、写字、算术、常识、体育、音乐、图画、劳作、自然、历史、地理等。

奋小起初选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课本作教科书，适当加选战时教材。后来，改用从西安定购的统编课本授课。每节课规定为三十分鐘，个别科目可以两节连上，延长为六十分鐘。放学时间与陕坝市办公时间一致。低年级

每日在校时间为二百四十分钟，中高年级约三百九十分钟。

在每天的教学活动中，正课以外，还有朝会、课间操、课外活动、文会、星期日活动等课余时间，目的是使学生得到休息锻炼，增强体质，全面发展。

奋斗小学在教学中力求体现下列方法：低年级重分科设计，中年级重问题讨论，高年级重自学辅导。根据年级和教材的不同，在教学中分别采用直观法、示范法、问答法、研究法、欣赏法。另外，学校订有教学十箴，这十箴是：

- (一) 先常规，后教学；
- (二) 先发问，后指名；
- (三) 先举手，后发言；
- (四) 先全体，后个人；
- (五) 先已知，后未知；
- (六) 先讨论，后用书；
- (七) 先具体，后抽象；
- (八) 先归纳，后演绎；
- (九) 先说明，后实践；

(十) 先求对，后求快。

奋小的学业考试分平时考查、月考、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几种。

月考每学期举行三次，平时考查可随时进行。

考查成绩的方法，低年级重是非法和正误法，中年级着重选择法和填充法，高年级着重比较法和问答法。评定学生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六十分为及格线。

学生每天的作业包括日记、大楷、笔记、各科课堂作业。学校要求教师按时批改收发。日记要求早收晚发，大楷晚收早发。其它作业要求及时收发。试卷和作业的批改，要用统一的符号，如“√”表示正确，每扣一分在对号上加一点，扣三分用“∨”符号表示。作业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级。

奋小每周进行一次观摩教学，主讲教师课前写好教案，誉印分发全校教师，全校教师全部出席听课，并在听课表上填写评语。表上有十项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时间、仪态声音，教材使用、教学过程、发问技术、学生反映，

教室常规、准备程度、备考等。教务股翻印分发全校教职员，当日晚上，开会评议，以求改进。会上同时研究讨论其它教学事项，提出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下面是该学校一九四三学年教师提出的部分教学问题：

(七) 教学小学六年级英语，应采用什么方法？

(八) 公民训练的教学，怎样才能使学生不感觉枯燥？

(十) 日记、作文、大字、算术、演草及其它各种课卷，批改很费时间，有没有方便有效的方法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十一) 低年级国语科练习生字书写，因无适当用具（如石板石笔等），每日由学校发纸，似乎不太经济，应如何处理？

(十五) 家事教学如何与学生家庭联系？

(十六) 教小学低中年级儿童，应具有哪些教学技术？

对于每次教学例会讨论的内容，学校都作详细的记录，然后立案存档，以备查检。

五、奋斗小学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配合

奋斗小学对家庭配合学校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学校订有详细的《家长意见征集表》，摘要如下：——

(一) 你对于你的孩子，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二) 你的孩子，性情如何？爱好什么？肯犯什么毛病？希望我们怎样教；怎样管？

(三) 你的孩子，对于所学各科，最感兴趣的是哪几种？

(四) 你对于本校教学时间、教学方法、教学进度，有何意见？

(五) 你觉得本校一切设施，有何优点？有何缺点？并请提示改进意见。

《敬告家长：怎样教育你的孩子》是奋小恳亲会订列的另一种和家长联系加强学生教育的要求。全文如下：

(一) 儿童每日生活时间，在家庭多，在学校少。单以时间论，家庭教育之重要，实较学校教育尤甚。当家长的，对儿童教育，应

特别注意，不可把责任完全委诸学校。

(二) 家庭中所有的人物，多与儿童骨肉相近，实施教育，天然而有力。为长辈的，应随时以身作则，使儿童潜移默化，受教于无形。

(三) 邻里街巷，为儿童活动的领域，亲友子女，为儿童最易接触的伴侣，必须为其介绍好朋友，以免习于不良。

(四)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培养优良习性，是教育儿童最要紧的一件事。应从儿童落地之日起，即予以适应的指导，使其常常如此，不许发生例外。

(五) 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本是儿童，必须彼此联系，步调一致。家长应当来学校，商谈教育儿童的方法。

(六) 父亲和母亲，对于儿童的成就，影响最大，必须态度协调、意见相合。父严母慈，并不是教育的好方法。

(七) 儿童虽是父母的子女，同时亦为国家的公民，要使儿童做新中国的主人。不要只把他看作家庭的宝贝。

(八) 父母对儿童说话，必须言之有信，

说到做到。不可随便发言，随意变更。

（九）教儿童做人做事，比教儿童读书识字还重要。要教儿童做主人，做正人，做实事，做好事。

（十）儿童读书识字，不宜太早。给他一副钢铁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十一）教育儿童，犹如培植花木，春风夏日，均所需要，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

（十二）祖母、外祖母、姑母、姐姐等，对于儿童，应予以合理的教育。过分溺爱，是大错误。

（十三）性教育要从儿童开始实施，不要使其持神秘的观念，污秽的心理，自戕自贱，遗害终身。

（十四）早婚最是危害儿童的健康与前途。为父母的，不能只图各人的方便，使其抱无穷的遗憾。

（十五）儿童虽小，亦有人格，为长辈的，不可一味压迫，肆意凌辱，而应尊其人格，指导其生活，诱其走上正当途径。

（十六）教儿童立志，是其一生最重要

的一个关键，应根据儿童的个性，家庭的情形，社会的需要，及早给以正确的指导。

（十七）服从是儿童时期十分需要的优良品质，应从幼时即注意鼓励，随时指导，绝其粗暴蛮横的恶习萌芽。

（十八）儿童不是打骂成的，而是教育成的。应该多勉励、多指导、多示范、多督促。

（十九）鼓励儿童使其遇事想着做，忙着做、自动做、创造的做、有兴趣的做。

（二十）如果你有几个小孩，要施以公平的爱，不应打骂大的，偏爱小的，亦不应打骂男的，偏爱女的……。

（二十一）儿童时期，爱吃零食，爱吃甜食，容易养成偏食的毛病，父母应多方诱导，使其步入正轨。

（二十二）儿童时期，须有充足的睡眠，并养成按时起按时睡的好习惯，晚间的娱乐场所，最好使其不去。

（二十三）儿童花钱，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长辈应供给其需用品，不可给钱，任其自

由的消费。亲友对儿童的施惠，亦应交给他的父母，师长，及其他监护人，最好不要直接交给儿童自己。

(二十四)拘谨而呆板的儿童，其将来未必能有多大的出息；规矩而活泼的儿童，方是理想的国民。

(二十五)三岁至七岁，十岁至十五岁，是儿童生活上两个转折点，要好好的注视他的变化，亲切地加以指导。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较完善的儿童教育规程，如要实施，可以肯定，对于儿童身心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六、奋斗小学学生的奖惩

对于儿童的教育，除了正面引导外，奋斗小学同时订有奖惩条例，原则是：儿童对于善恶观念并不十分明了，偶有错误，多出于无意识之冲动，奖惩时，切宜公正审慎，酌情处理，并须申明理由，不可过滥。奖惩事项为：(一)奖励事项：儿童有热心服务，努力求学，操行优良，体育进步等善良行为，除每学期终了

时，酌予物品奖励外，应随时加以口头奖励，使之“乐于为善”。惩戒事项为：儿童有违背校规，怠惰学业，损害校誉，怙恶不改等不良行为，宜先查明原因，多用劝导和隔离等法，使之“知过悔改”。

奖惩办法是：

(一) 奖励办法：设名誉奖、明文公布、颁发奖状、奖品、奖金、奖旗及留影等。

(二) 惩戒办法：设训戒、罚站、扫除、限制自由、罚金（赔偿），警告（定条约），记过、警告退学等。

对奖惩事项之情由较大者，应事先呈明校务主任或提交本校行政例会通过，然后施行之。

这些规定，惩恶劝善，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品德。当然，惩戒条例中有惩罚性的规定，是它消极的方面。

七、师生请假制度

蓬莱小学的办学者认为：一个优良的学校，必须做到老师学生均不请假，因此学校要求教师请假要慎重。虽然不能控制人人均不请

假，但应保证做到“偶有疾病事故，绝对请人代理”。

学生请假必须由师长批准，请病假者要交验医生证明。学生一天内的事假，由班主任老师批准，三天以内事假要由训育股批准。三日以上事假，经校务主任核定执行。请假时，学生必须持家长和保证人的请假证件。

无故缺勤在一日以内的学生，班主任老师当即发函告知家长，查询原因，对学生酌情给予训戒。旷课超过三日以上的学生，班主任老师报请训育股，给予记过处分一次。请假超过一学期三分之一者，便酌令该生留级。

八、教师进修

教师，犹如蜜蜂，必须不辞辛劳，随时采蜜，奋斗小学认为教师要有学而不厌的收入，才能保证诲人不倦的支出。否则，只有支出而无收入，“亦难乎其为教师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教师进修一事，奋小抓得很紧。

奋斗小学教师进修的方式，约有以下几种：

(一) 随时读书。奋小主张教师在工间课余手不释卷，除教师要自身努力外，学校保证图书借阅，以便促使他们相机读书。

(二) 饭会讨论。奋小教师在开饭前后有组织地漫谈教学，讨论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形式被称作“饭会”。

(三) 每周研究。每个星期二是奋小的教研会活动时间，教研会上常结合观摩教学，讨论研究各种教学问题。

(四) 全校教师集体参加西北师范学院办的国民教育师资函授学校的函授学习。

另外，学校组织了教师读书会，全体教师均为会员。读书会每月两次例会，听取读书报告，交流读书心得。学期末，学校对读书最多、报告生动的教师，给予荣誉奖励。

寒假同仁进修会，是奋小教师集中进修的组织形式，寒假是该会的活动时间。活动内容包括读书、专题讨论等。会上的学术空气很浓厚。

九、学校经费和学校沿革

奋斗小学经费来自校董会。下面是奋斗学校自包括中学在内两年来经费支出的具体数字。从其开支可看出学校发展情况。

一九四三年支出是三万五千七百零五元，一九四四年支出增为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元五千八百六十四元。（以上均为旧币额）。

学生入学后的课本由学校免费发给。学校每年冬夏各给学生发一套制服，一般不收（费。但学生离校时，校服、书籍、各种符号全部交还学校。

一九四三年奋斗小学聘用教师十人，一九四四年聘用十四人。一九四三年该校有六个教学班，二百八十二名学生。一九四四年奋斗小有七个教学班，四百七十三名学生。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是六岁，最大的是十六岁。其中以十至十三岁的占大多数。

奋斗小学第一届高小毕业生共四十名，除个别留级的、考入省师范、绥中和就业的外，其余大部分升入奋中。

奋斗小学创办于宁夏黄渠桥，不久迁往石

咀山。一九四三年八月迁至陕坝市，先在陕坝天主堂赁屋授课。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招六十三名新生，八月三十一日移居新校舍与奋中合校上课。九月一日奋斗学校在天主堂旧址举行开学典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奋斗中学校庆暨校舍落成典礼在新校礼堂内举行，奋斗小学师生参加了大会。傅作义校长到会讲话。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绥远省政府和傅作义军部回师归绥，奋中随之迁走。奋斗小学留在陕坝原址，归绥增设奋小一所。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傅作义部队调驻张家口一带，归绥奋中高中部迁往张家口，并在该地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同时在北京设奋小一所。

一九四九年，张家口解放，傅作义军政干部及其子女云集北平。张家口奋斗中小学迁往北平。张家口奋小与北平原奋小合为一所。

奋小在宁夏黄渠桥草创，历经石咀山、陕坝、归绥、张家口、北平等地，几乎是一所流动小学。

留在陕坝的奋斗小学，解放后于一九五二

年与普爱小学合为陕坝镇第三完小，当年秋季，又合归于陕坝师范附小。

奋 斗 中 学

一、校董会

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胜利后，日寇龟缩包头，不敢冒然西犯。绥西河套一带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军事的胜利、政局的稳定，为发展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傅作义先生偕同王明德等人，发起筹办奋斗中学事宜。随即成立了傅作义、袁庆曾、陈炳谦、鲁英麟、张濯清、王国英、孙兰峰、董其武、袁庆荣、张德、王明德、郭揽青、曾士先、张傅德、潘玉祥十五人参加的校董会。董事中军职人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七，教育界人士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还有民政、财政、军队行政方面的官员，包括绥远省银行总行经理。这样的人员构成，为办好奋斗中学奠定了基础。

八月二十日，在陕坝市召开了第一次校董

会。会上大家公推傅作义先生为董事长兼校长。由傅校长聘任王明德为校务主任，代行校长职权。曾士先为教导主任，总揽教务。

会上确定了办学三原则：

甲、课程标准及教学时数，完全遵照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颁规定。

乙、初、高中采用三·三制，男女合校。每个教学班以五十人为限。初中设双班，高中设单班，逐年发展，六年完成。

丙、施教重点：

不仅传授知识，更须导正认识。

不仅训练个体，更须切合整体。

培养学者头脑，实行战时生活。

会上并通过了招生简章，学生待遇等章程，规定并颁发了《私立奋斗中学校董事会章程》。该章程共五章十六条，摘要如下：

第一章规定：“本会目的，在谋私立奋斗中学经费之充裕，基础之巩固，为期教育设施之发展。”

第二章组织规定：“本会设当然校董一人，由私立奋斗中学设立者傅宜生先生（即傅

作义)充任之。

“本会除当然校董外，设校董十人至十四人，由设立者聘请之。

“本会至少须有四分之一校董，以曾经研究教育或办理教育者充任之。

“本会校董应互推一人~~为~~董~~事~~长，二人~~为~~常务校董，组织常务校董会，处理本会日常事务。”

第三章职权规定：“筹划私立奋斗中学之经费；审核私立奋斗中学之预算及决算；管理并监察私立奋斗中学之财务；管理私立奋斗中学之其它有关财务事项；聘任及辞退私立奋斗中学之校长；制定及变更私立奋斗中学之章程；发给私立奋斗中学学生之毕业证书。”“校董任期，除当然校董为终身外，每年改选二分之一，但得连选连任。常务校董任期一年，但得连选连任。”“私立奋斗中学之校长，以校董中选聘为原则，任期三年，如校长非由校董充任时，校长得列席校董会议，报告校务。私立奋斗中学之行政，由校长负完全责任，本会不直接参与。

第四章会议及会期规定：本会全体校董会议，每学年开始前召开一次，由董董事长召集之。常务校董会议每年召开四次。于每学期始末举行之。”另外，必要附开临时会议，出席校董须在全休校董五分之一以上，始能召开会议。各项决议案，要出席会议校董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五章附则规定：“本会董董所暂设于绥远省临河县陕西街私立查斗中学内”

二、八级办学设想

查斗中等建校之初，就酝酿出咱已教育发展的远景，这个宏伟设想是要把查斗学校办成一所八级教育系统。其“是对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就承担起教育责任，再直接养他们成为中国最需要的象样美的表”（引自奋中《本校教育发展理想》）。据查询资料所得，将其设想画一轮廓：

第一级婴儿院。专收初生至四岁的婴儿，设备力求完美，教育着重军事，替一般家庭妇女解决照顾子女的真课。这种设想来源于教育

较为发达的英法两国，要达到避免一般抚养婴儿那种缺乏真正母爱的病态。奋校的构想者认为，这婴儿院是人生的基础教育场地，虽然最费钱，最难办，“我们希望有机会，促其实现。同时，要办亲职教育，以图根本上改良中国的家庭。”

第二级幼稚园。收四至六岁的幼儿。欲集世界各先进国幼稚园的优点，创造一种新型的幼儿教育机关，着重儿童共同天性及团体活动的开发，给中国幼稚教育展开新的一页。

第三级是初级小学。招收六至十岁的儿童，施以初步的学校教育。它要具备家庭的温暖，母爱的抚育，优良生活习惯的熏陶；还应注意与幼稚园相联系。尤其对一年级儿童，宜以游戏为教导中心，而不必拘泥呆板的知识教育。初级小学，应该看环境的美化与活动的自由。千万不要认为游戏和自由活动是无谓的浪费，相反，这正是最适宜的教育。

第四级是高级小学。这一级与初级小学紧密相连，列入初等教育阶段。是我国清末从日本抄来的教育体系。在新县制中以乡镇为设置

中心，名为中心小学。它是义务教育的延长，职业教育的准备，社会教育的试验，初步人才教育的实施。这是做人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五级初级中学。初、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大都在十二岁至二十岁之间，是人生身心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心理学家称其为“人生再造期”。奋中初级中学采取双班制，在同年级中，分设甲乙两班，为使天才庸才，各得其所。教育以学生全部实际生活为对象，以其本身为出发点，贯通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各方面的联络，加以合理的训导。如果天赋有限，不宜深造，那么在这一阶段，给以试探的机会，从而决定他们未来的前途，加以培养，使学生成为能做能说、有为有守的基层建设人才。

第六级高级中学。这一级教育，采用宁缺勿滥的原则。暂设单班，严加选择。在普通教育之中，稍加重理科。对于生活教育，兼采英国的导师制，美国的自治制。对于学生个性的差异，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人格气节的涵育，尤其要注意。

第七级大学专科教育。奋校构想者认为：

“大学与专科教育，目的不同。大学着重传授高深学术，养成自动研究的能力；专科着重专门技术的训练，能学以致用”。奋校的教育专家们准备先从专科学院做起，逐渐发展健全，再根据政府教育政策，配合国力与实际需要，造就治学治事治人的通才与专才，使教育力量得到充分发展。

第八级研究院。这一级专为吸收人才作高深的研究，也为应付急需，做到求实求精。

这是奋斗学校发展的蓝图，是值得研究的宝贵设想资料，但仅实现了中间四级，未能全部付诸实施，确实令人遗憾。

三、校长八训与行政十原则

校董事长傅作义在奋中校舍落成典礼上亲自宣布了他为学校拟写的《校长八训》，作为教学方针，务求贯彻。

- 一、要有科学的头脑；
- 二、要有愉快的精神；
- 三、要有活泼的体态；

- 四、要有健康的身体；
- 五、要过朴素的生活；
- 六、要有明白而坚决的语言；
- 七、造成互助合作的团体；
- 八、养成说实话办实事的风气。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奋中举行了校务会议，会上确定了奋中十条行政原则：

- 一、一切设施，先求简要适用；
- 二、努力节约，尤须预防漏历；
- 三、聘请教师，尽量增加专任；
- 四、教职人员，做到分工合作；
- 五、课程内容，着重科学国史；
- 六、各科教学，必须完成标准；
- 七、学生饮食，力求营养适宜；
- 八、学生言动，实行严格管理；
- 九、生活指导，注重做人做事；
- 十、互助合作，创造优良校风。

四、校旗、校歌

奋中设计了校旗，谱写了校歌。校旗释义为：

- (一)、旗为矩形，中有圆徽。围以笔尖

九，书本九；以示有棱有角，中规中矩之意。

（二）、旗色深紫，以示崇高深厚。笔书金黄，以示文化之永恒璀璨光华。

（三）、圆徽中白色奋斗二字，以示清明纯洁。

（四）、小学之小字为火红；中学之中字为高粱红。以示活泼愉快，热烈成就。

校歌词曲作者分别为曾士先和赵增寿。歌词如下：

天行健，君子贵自强！

我们要创造，无尽的创造；

我们要奋斗，不断的奋斗。

发扬民族文化，开拓国运无疆！

我们心情愉快，我们活泼紧张，

我们学习勤苦，我们身体健康。

学校是：

工厂、田庄、社会疆场，

我们要锻炼成钢！

天行健，君子贵自强！

我们今日同堂，异日相扶相将，

建设新的中国，责任由我们担当！

奋斗，创造！创造，奋斗！
要使青天白日照彻八方！

五、奋中校舍建设和搬迁

奋斗中学经过一个阶段筹划，于一九四二年招生。经过考试，录取新生八十名，分置初一年级甲乙两班。暂无校舍，商借陕坝天主堂十余间房屋作教室。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上课，并开始筹建校舍。旋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在陕坝北郊购民田一顷九亩，成立了以王明德为主委的校舍建筑委员会，着手建校事宜。越二月，设计工序告竣，三月二十一日校舍奠基，当年竣工。计建礼堂、教室、校本部、学生宿舍一百二十六间。

一九四四年秋季，奋斗中学准备设置六个初中班，加之四三年奋斗小学从石咀山迁来陕坝，学级足额，房舍紧张，不敷应用。本年三月十六日又动工兴建图书馆、理化馆各一座，教室六座、学生宿舍以及库房、碾磨房、豆腐房等六十余间。六月二十五日建成。

一九四五学年奋中计划招收高中班，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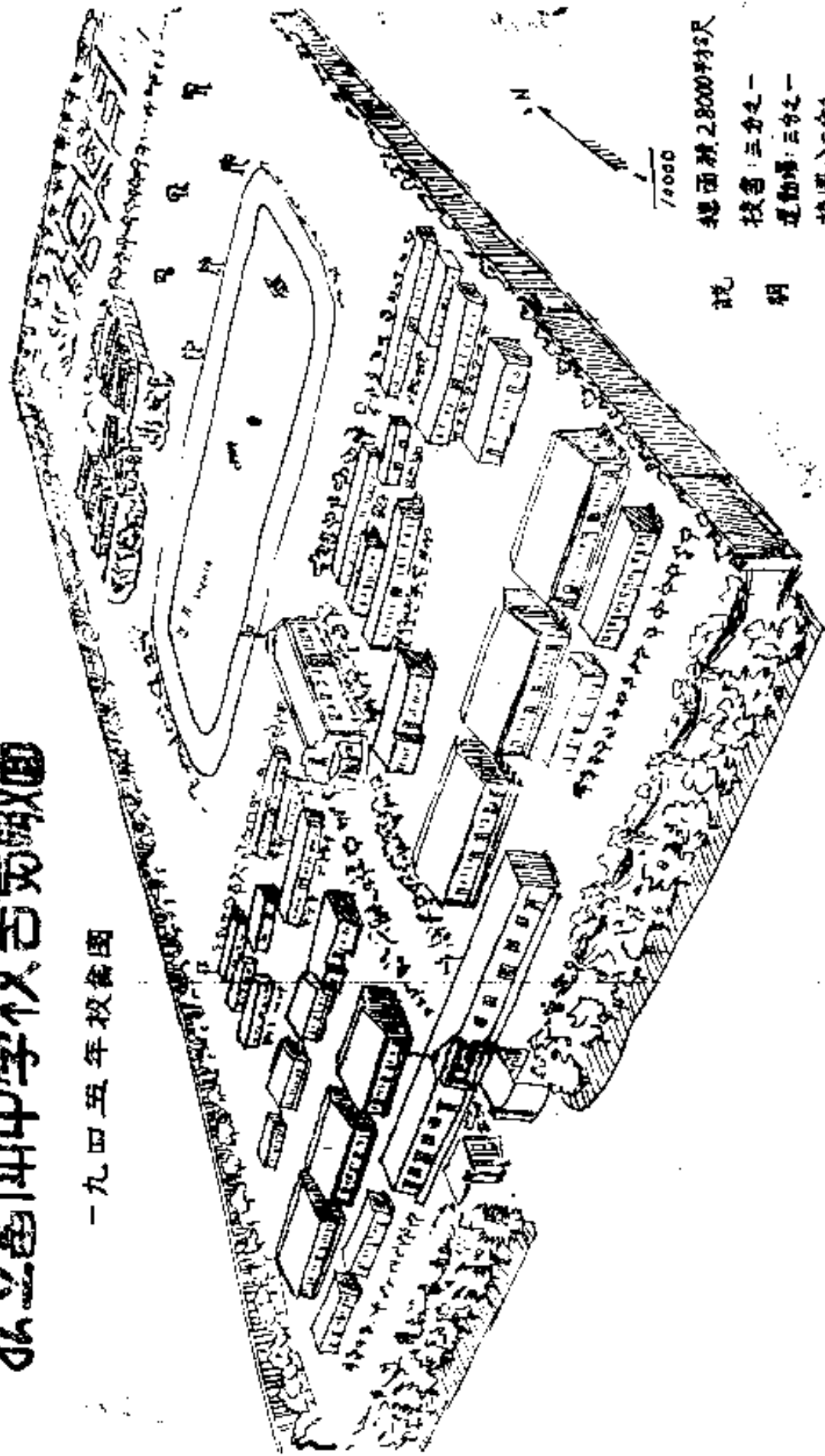
也要发展成十二个班的规模，一九四四年又动工兴建高中部，同时续建小学教室六座，教职员宿舍三座，共计六十一间。四五年七月交付使用。建校经费曾得到地方绅士资助，米仓县武仲玺捐款十万元。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奋斗中学随军迁至归绥（呼市），一九四七年，奋中高中随军迁往张家口，并在张家口增设初中、小学，归绥留初中一所。一九四八年，傅作义驻北平，奋斗中小学又从张家口迁到北平。此后学校变更不大，解放后，归绥奋中迁回陕坝，与陕坝奋中合为一所，其后又与其它几所中学合并为陕坝中学，结束了奋斗中学的历史。

奋斗中学由军事首脑人物创办，招收学生又大都是军政干部子弟，这就使它不能久驻一地，时有迁徙。但它是在绥西陕坝市发展起来的，这里的校部建筑也最完整，一直保留到解放后。

私立奮鬥中學校舍圖

一九四五年校舍圖



總面積 28000 平方尺

- 校舍：三十分之一
- 運動場：三十分之一
- 校園：五十分之一

說明

六、奋中的行政组织及会议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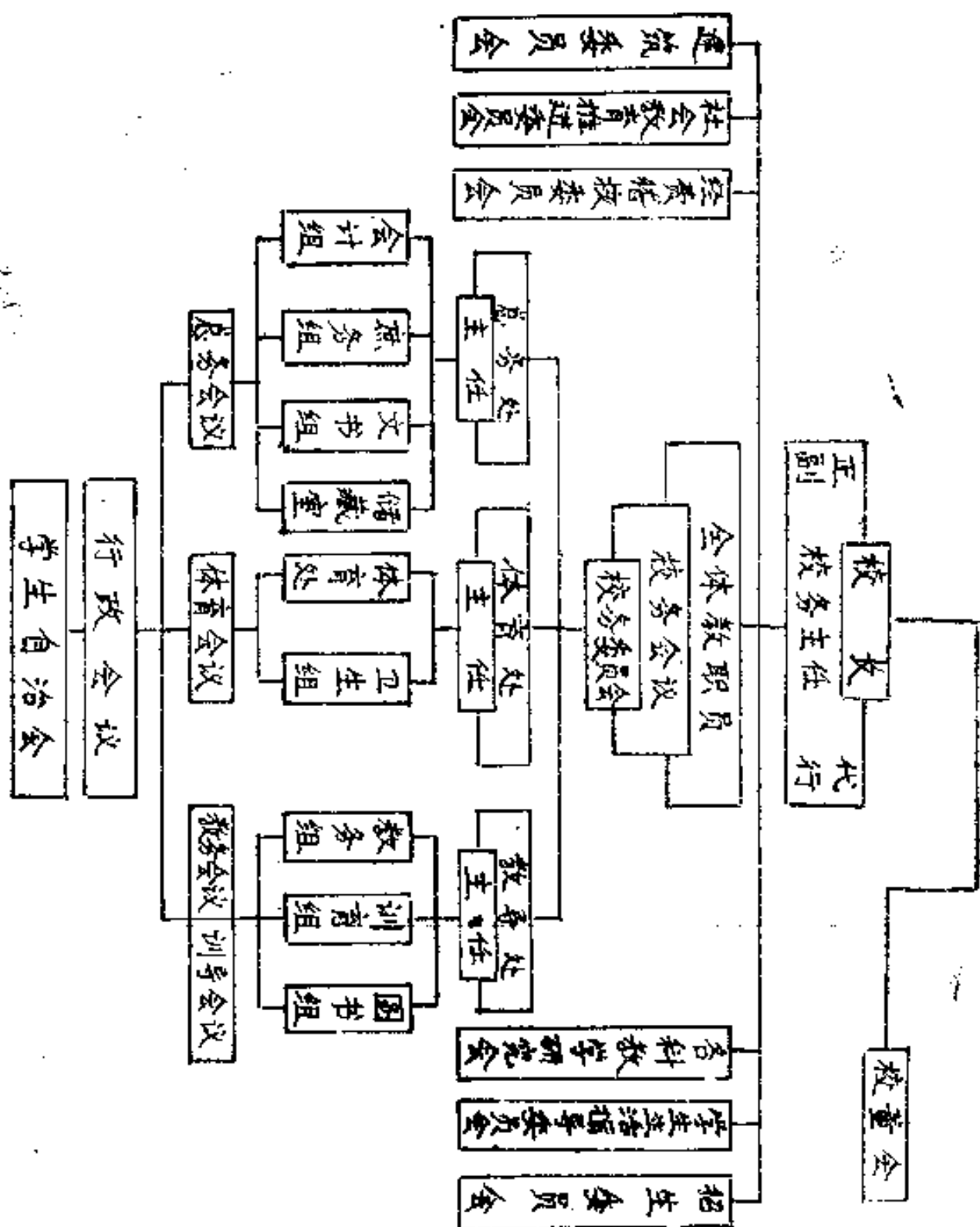
奋斗中学上有董事会，校长由傅作义先生兼任。王明德受聘为校务主任，郭揽青为副校务主任（兼奋斗小学校务主任）。曾士先为教导主任。另设有事务主任、体育主任、农场主任、军事管理员、女生管训员、教务员等职务。其组织机构见下表。

奋斗中学的各类组织较健全，在工作中注意人事协和，联系密切分工合作，运用灵活。奋斗中学也比较注重各种会议。上自教职员之校务会议，下至全体学生之自治会议，均注意集体领导，以求教育民主化。对于各种会议的职权及组织形式，奋斗中学在《私立奋斗中学学则》第三章、各种会议中有明确规定：

第二十一条：本校由全体教职员，组织校务会议，每学期开学后一月内及放假前一月内，各举行会议一次，校长或校务主任为主席，议事范围如下：

（一）审议本校教育设施之方针与计划。

（二）审议本校行政及组织上之重要事



项。

(三) 审议教学大纲、学级编制及教学上之重要事项。

(四) 审议训育目标、实施方法及训育上之重要事项。

(五) 审议校舍之建筑及设备事项。

(六) 审议一切规程、表册及报告。

(七) 审议各种会议之重要决议案。

(八) 研讨各种学术上之问题。

(九) 听取本校经济情形之报告。

(十) 其它有关校务事项。

第二十二条：本校由校长、各主任、全体教师，及教务、训导、体育等组组长，组织教务会议，每月开会一次。校长或校务主任为主席，议事范围如下：

(一) 决定教学方针。

(二) 规划教务上应行改进事项。

(三) 审定教务上各项章则。

(四) 讨论课程分配及教材编订。

(五) 研定各学科成绩考查办法。

(六) 讨论图书设备购置事项。

(七) 其它有关教务事项。

第二十三条：本校由校长、各主任、各导师、校医、童子军管理员及训导、教务、体育各组组长，组织训导会议，每月开会一次。校长或校务主任为主席。审议训导方面事务。

第二十四条：本校由校长、各主任、校医、体育、训导、教务各组组长，组织体育会议。每月开会一次，校长或校务主任为主席。商讨体育教学与工作。

另外由校长、各主任参与，吸收各有关人员组成的事务会议、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学生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以及由全校教师推选专任教师三人组成的经费稽核委员会、由全体教职员推选九至十五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各科教学研究会均按规定时间开会，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奋斗中学办学者的民主精神是值得推崇的。这正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处此科学的群众时代，首重民主，民主之具体表现，要在会议，而会议之精神，更在有关人员，均能按时出席，集思议事，研究求精到，执行求切

实。”

奋斗中学对校务主任职权也有详备的规定，摘引如下：（《奋斗中学学则》第四章学校行政）

第三十二条：本校正副校务主任，秉承校长之命，处理下列行政事项：

（一）每学年及学期开始，规划校务改进与发展之计划，制定进度表与行政历，公布实施。

（二）编订及审核各项章则。

（三）依照法定标准，遴荐各科教师。

（四）根据实际需要，派定各处、组职员。

（六）出席各科教学研究会。

（七）考核及调整职员工作。

（九）调阅学生各科作业簿及试卷。

（十二）核阅往来公文依时办理。

（十三）编制经费、分配预算，稽核经费收支。

（十四）主持或参加各种重要会议。

（十五）办理对外联络事宜。

办学者认为奋中是一所具有政治性、成长性、战时性、边疆性的教育场所。又定行政原则四条：

（一）“奉守法令”，凡政府颁布之法令章则，无不详加研究，切实奉行。

（二）“适应需要”，根据本校具体情况和所处环境，求其发展，办出个性。“寓创造于适应，随适应而进步。”

（三）“安定生活”，“欲教师之力量充分发挥，必须使其生活安定”，“良以教育工作，虽被誉为清高，教师究为筋肉骨血之躯，人所需要者，教师亦需要之；且教育工作，精神为主，生活不能安定，精神焉能愉快？”

（四）“教学相长”，取韩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做注脚，为使培养出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上引文均见《奋斗中学行政原则》）

七、教师任用

奋中聘任教师，殊重学历。虽在战时，地处僻壤，奋中聘任的教师资历较高。据一九四

五年的资料，当时受聘的教师学历情况如下：

国内外师范大学或教育学院科系毕业生三人，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或专修科毕业生十八人，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生四人，中等学校毕业生十三人，具有其它资历者三人。奋斗中学所聘的专任教师，大部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生，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这就为办好这所学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私立奋斗中学学则》第二章教职员中，规定了教职员的招聘待遇办法：

第九条：本校教师，由校长聘任之，以专任为原则。遇有特别情形，得聘请兼任教员，其人数不得超过教师人数四分之一。职员由校长任用，均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条：本校教师之聘请，于学年或学期开始前一月，由校具备聘书，送达受聘教师。初聘任期以一学年为原则，续聘任期为一学年。

第十一条：本校专任教师，每日在校时间至少七时，每周教学时数，为十八至二十四小时，并不得在校外兼任任何职务。

第十三条：本校专任教职员，均以住宿校内为原则，与学生共同生活。

第十四条：本校教职员俸给等级表，及年功加俸办法，参照国立中学情形规定之。但俸给等级，应以能维持适当生活为标准。

第十五条：本校教师继续任职满九年者，得休假一年，从事研究考查，并须将成绩送达学校，迳呈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审核。此项休假教师，应仍支原俸，但以不兼任何有给（薪金）职务者为限。

第十七条：本校女教职员，在生产期内，予以六个星期之休息假，其代理人之俸给，应由学校设法，另行支给。

第十九条：本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恤金办法，照国民政府公布之学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办理之。

第二十条：本校教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用：

- （一）违犯刑法，证据确凿者；
- （二）成绩不良者；
- （三）旷废职务者；

(四) 怠于训育及校务者；

(五) 患精神病或身有痼疾不能任事者；

(六) 行为不检或有不良嗜好者。

奋斗中学一九四二年建校至一九四五年的几年中，共招聘过近七十名教职员，其中只有校长、校务主任与校董会董事，校医，在这几年中一直在奋中工作，而大部分教职员处在流动中，招聘即来，解聘则去。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共有教职员三十六名，其中教员十七人，大部分教员代两门课。副校长主任郭揽青也代国文、公民两门课。教导主任带历史课，体育主任带体育课。其中副校长主任郭揽青在工作教学之余，著书立说，写有《学校行政纲要》、《现代中学教育》、《新小学行政之研究》、及高初级小学课本等专著。

八、教学与教务

(一) 招生和考试制度。奋斗中学招生通过考试录取。新生入学考试由校内外人士组成考试委员会，组织命题、考试、录取工作，公开取舍。

奋中的初中是双班制。初一年级两班的课程，进度统一。学年考试后，再行分班。分班时根据学生的成绩、志愿，设置甲、乙两班，即快慢班。甲、乙班的课程设置、教学进度、课时分配有所不同，为的是因材施教。

奋中考试分平时考查、临时测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四种。

平时考试，教务处组织命题、评分，规定每学期考试次数。同时教务处可以随时对各班各科进行抽查、检查、督促各科教学。抽查时间不予先通知。另外，各科教师可以随时进行随堂测验，时间由科任教师自定。每次考试，成绩必须记录在案。不及格学生名单要列表公布。

学期考试，在学期终了时进行，考试范围是本学期内各科所学的全部内容，考试前停课一至二日备学生复习。考试地点设在大礼堂，集中全部学生统一编号，一起考试。目的是培养学生尊重荣誉、克服怯场情绪。期考结束，即将学生成绩函告家长。

毕业考试，时间定在第三学年修满后举

行。考试范围为三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以及所有内容。考试前留给學生三至四日的复习准备时间。参加各地举行的毕业会考學生，则免除本校举行的毕业考试。

考试后的成绩计算，具体办法是：

日常考查与临时试验成绩合为平时成绩。其中日常考查成绩占平时成绩的三分之二，临时试验成绩占三分之一。

平时成绩与学期考试成绩，合为各科学期成绩。平时成绩在学期成绩中占五分之三，学期考试成绩占五分之二。

學生各学年的平均成绩同毕业考试成绩，合为该生的毕业成绩。各学年的平均成绩在毕业成绩内占五分之三，毕业考试成绩占五分之二。

學生每学期各科缺课时数在该科教学总时数三分之一以上者，学校规定不得参加该科的学期考试。

奋斗中学學生升留级是根据成绩确定的。留级的办法是：

學生没有学期成绩的学科或成绩不及格的

学科，在三科以上，或国文、英文、数学、劳作四主科中任何两科无学期成绩或不及格，都责令留级一学期。连续留级只限两次。本校如无相当学级，发给转学证书，到外校学习。

学生不及格的成绩不是上述主科而仅在二科以下者，可在次学年随原级附读，并设法补习各该科目。补考及格者，准予升级。如仍不及格，仍留原年级肄业。补考以两次为限。不能升级的学生，发给修业证书，令其退学。

毕业考试成绩有三科以上不及格，或初中主科中的二科不及格，均令留级一学年，留级以二次为限，如仍不能毕业者，发给修业证书，令其退学。

毕业成绩中有一科不及格，或二科不及格，但不是主要学科，可允许补考二次。如仍不能及格者，发给修业证书，令其退学。

（二）课程设制：奋斗中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时数，实施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初中设下列课程：

1、公民； 2、体育； 3、童子军； 4、卫生； 5、国文； 6、英语； 7、数学； 8、

植物； 9、动物； 10、化学； 11、物理； 12、历史； 13、地理； 14、劳作； 15、图画； 16、音乐； 17、地方自治。

（三）学生的思想教育：学生的思想教育，称之为“训导”或“训育”。要求贯彻在各科教学中。学校规定：

语文学科要求讲述“先贤励志言行，远代、世界新知，诱掖学生欣赏固有文化兴趣，及创造未来世界之理想。并使学生养成治事合于条理，待人准乎仁恕之美德。”

史地学科要求在教学中贯穿训育，“叙述我国文化之悠久，山河之壮丽，及祖先之丰功伟业。以激发学生爱护国族情绪，承继文化大志，及开拓自然宏愿”。

社会学科则要“阐述群己关系及社会建设基本法则，以养成奉公守法习惯，敬业乐群精神。”

自然学科中要“解释自然现象及法则，以养成学生观察分析之习惯，准确合理之行动，并鼓励学生探求事物本末，及发展国计民生之志趣。”

艺术学科在“借练习雄伟乐曲，临摹自然美景”中“使学生性情和乐调畅，欣赏能力提高，并使其行动活泼而中乎规矩，态度积极而不涉于浮躁。”（以上引文均见《私立奋斗中学学则》）

除了在各科教学中贯彻训育外，每个教学班设导师（班主任）一人，专门做思想工作。

对于同学间的关系，要求学生要和睦相处。男女生间，要求教师以解说代防范，培养学生自尊互尊的人格，明喻他们之间兄弟手足的关系，使学生真正了解做人的常规。

奋中还制定了《私立奋斗中学操行评点表》评点表共分十四类包括：（1）衣（2）食（3）住（4）行（5）视（6）听（7）言（8）动（又分五类：一般、请假、操场、诊断、会客）（9）礼节（10）风度（11）律己（12）待人（13）处群（14）任事等项，计二百五十七条。

奋中校长傅作义先生是很重视学校的思想工作的，他曾说过：“我们要悲悯他抗战失学子弟的可怜，我们要觉得他拼命努力的憨态可

爱，我们不嫌他资质差，我们不恨他习惯坏，我们要把功课教完，要教他学会，要教他会用。总而言之，是要负责教他好。”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奋中举行开学典礼时傅校长到会用《八训》训勉学生。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奋中召开恳亲大会，傅作义先生又在会上讲话，傅先生还经常召请校务人员商讨学生的教育管理。这方面傅先生耗费了不少心血。

（四）教务处的职责：奋斗中学规定，学校的教务，由教导主任秉承校长及正副校务主任之命，协同有关教职员共同管理。其职责如下：

- 1、拟定教学上各种章则。
- 2、拟定各科教学实施计划。
- 3、拟定各科教学研究计划。
- 4、拟定学生实验计划。
- 5、依照课程标准，会同各科教师，制定每学期教学进度。
- 6、编配学生作息及各级教学时间。
- 7、支配教室自习室及实验场所。
- 8、会同各科教师，选定各科教科书及教

具。

9、查核教师自编讲义，及补充教材状况。

10、查阅各级各科教学预定及实际进度。

11、查阅各级教室周志本。

12、办理教师缺课、补课及调课事宜。

13、检查各科作业次数。

14、规定学业试验及补考办法。

15、订制学业成绩计算办法。

16、订立教师督导学生自习办法。

17、考查学生自习状况。

18、指导学生课外研究。

19、拟定各学科竞赛办法。

20、拟定学生假期作业办法。

21、办理学生升学及就业指导事宜。

22、造报教学实施状况。

23、办理新生插班生入学考试。

24、办理新旧生入学及注册。

25、编定学生学号。

26、登记新生插班生学籍。

27、整理及保管学籍簿。

28、登记及保管学生各科成绩。

29、办理学生转学、休学、复学、退学及毕业事宜。

30、处理学生课间请假及旷课。

31、造报各项员生表册。

32、会同总务处计划及支配全校教学设备。

33、择请各科教师，自制教学设备。

34、拟定管理各项教学章则。

(五) 课堂秩序要求：每班各设值周生，负责清洁教室，擦黑板，整理什物。学生听到上课信号，迅速把应用书籍、文具，整備齐全，携入教室，静候教师授课。教师进入教室，值周生即发“立正”口令，并报告人数，等教师答礼，再发“坐下”口令。下课时，仍由值周生发“立正”口令，等教师答礼出教室后，再发“解散”口令，然后依次离座。授课时，学生都要端正严肃，振作精神，专心学习。学生如有疑问，请求解释时，须先举右手，得到教师许可后方能起立发言。教师点名，学生要起立答“有”，如有询问事项，也

必须起立对答。

(六)升旗或降旗仪式：奋斗中学规定每日早晚进行升降国旗仪式。每日升旗时学生穿好校服，闻集合令迅速集合到指定场所，严肃整洁，听从指挥。升旗后由全校教师轮流讲话。讲话内容针对性要强。

下午放学时举行降旗仪式，降旗时由学生轮流讲话，时限为五分钟。讲述内容为表扬建议等。讲演名单，先期公布，每次为两名学生。讲稿要事先征得师长同意，这种讲演对于锻炼学生能力无疑是有益的。

奋斗中学无论冬夏，一律采取两放学制。作息时间据季节适当变动。每天早晚各安排一节自习，供学生预习复习，教师可解答学生疑问，但不在自习时授课。

(七)假期：奋中平时除国定纪念日外，概不放假。即使星期日，也仅留较短时间供学生处理生活杂务。寒暑假五十四天时间：暑假十四日，寒假四十日。另外，有春假二日，校庆纪念日（六月二十五日）一日。

九、经费筹措与后勤事务

奋斗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学校经费靠校董会筹集提供。其中一部分是傅作义先生“多年从政所得俸禄之节储”，一部分是募捐来的款项，另一部分则是工厂农田的收入。

奋中在四川成都市郊区有一处工厂，叫永华制革厂。农田有三处，一处是在四川灌县，有七十六亩水田；一处是在临河永嘉乡，有田一百三十六顷二十四亩六分一厘；一处是在五原，有田三十四顷四十亩。这些地全部用款购进。除自己耕种二十顷外，其余租给农民耕种。校园中还辟有菜地二十多亩，种植蔬菜，以供师生伙食。菜园中还设有碾磨房、豆腐房。

《私立奋斗中学学则》规定，学校经费支配原则为：（1）奉给费（工资）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七十；（2）设备费至少应占百分之二十；（3）办公费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奋斗中学后勤事务的原则是“发挥人力，节省物力”。经费收支由经费稽核委员会管理审核。财务制度严格，傅作义先生在建校之

初，即号召“教育生产化”，要求学校师生生活要自给自足。学校师生自己经营菜园，参加生产，蔬菜副食一般能够保证自足，学生课程中即有“劳作”一课，而且把它作为主课对待。

学校伙食由学生轮流主办，事务员给予指导。食谱花样经常更换。每个学生主副食费每月在二百元以下（一九四五年）。后勤事务人员购买主副食品本着不失时机不吃亏的原则，能早买者早买，能整买者整买。加之自种蔬菜，仅按成本记费，所以伙食费用耗资不多。

奋中设有总务处管理后勤事务。总务处设主任一名，第一任总务主任姓余，一九四四年又改聘范展英继任。下设会计、庶务、文书三组，各组设组长一至三人，协助总务主任办理日常事务。其中庶务组一九四五年有五人，组长为张国龄，其余有四名庶务干事。会计组有组长、干事二人，文书组有书记二人。

十、体育卫生

奋斗中学的体育教学每周教学时间为二小

时。上课方式以室外为主，室内讲授为辅（多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上室内课）。教育原则为：指导方法、训练技术、提高认识、培养道德。

奋斗中学提倡智育、训育、体育三育并重，所以在体育方面花费不少精力。在设备方面，只要经费允许，尽量添购充实。他们认为：没有充足的设备，便没有充分的活动。奋中运动场地有二百三十米圆形跑道一处，其中有百米跑道、跳高池、跳远池、铅球池。另外还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地各一处，有垒球场二处，板羽球场地则随处设置。

体育器材，当时能购置到的球架，杠杆、跳高架、铅球、篮球等基本都有。但投掷用的手榴弹仅有两枚，垫上运动也只能在草垫上进行。双杠也只有一副。

体育教学内容包括（1）体操，（2）游戏运动，（3）技巧运动，（4）球类运动，（5）竞技运动，（6）夏季河渠游泳、冬季土法滑冰，（7）拔河与踢毽等项目。学校在一天的教学时间内，安排两节课外活动，每节

五十分钟并将全校一百九十八名学生分成十一个队，划分场地按规定时间分头活动。并设考勤制度，督促所有学生参加活动。

奋斗中学每年在校庆纪念日和秋季举行两次全校运动会。省内青年团、教育厅举办的青年节运动会、九九运动节、双十节运动会等，都要选拔运动员参加。平时还在班际组织各种球类、拔河比赛，师生间、校际间也经常进行各种比赛。

春假时，学校组织全校师生长途徒步旅行。在旅行中由童子军教员组织军事演习及游戏活动。

奋斗中学每日在早上升国旗做十五分钟的早操，冬季则改为跑步。

奋中在《私立奋斗中学学则》中，对体育卫生也有明文规定：第八章、体育卫生，第八十三条中称：

本校学生体育成绩总分，以满六十分为合格，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但体育成绩总分虽满六十分，而出席勤惰项下扣分，超过体育成绩总分百分之二十五者，仍作不及格论。

第八十五条中称：

(3) 无论正课或课外运动，如有缺席或旷课者，均扣除其体育成绩总分。计：①正课缺席每次扣体育总分一分；②正课旷课每次扣体育总分二分；③课外运动，无故缺席，每次扣体育总分半分；④无故早退，作旷课论；⑤迟到二次，作缺席一次论。扣分满十五分时予以警告，借资警惕。

奋中对于卫生要求养成习惯，保持健康，改善环境。办学者认为：“此事在穷国，在战时，在边疆，难讲而最需讲。”所以全校大力进行环境的美化，

奋中建在陕坝北郊（即今杭一中校园），没有城市的噪音，环境幽静，利于教学。另外校舍布局合理，教室光线充足，宿舍整洁，当时到该校参观的人无不交口称赞。（另见校园平面图。）

奋中设校医一人，诊治各种疾病，并定期作保健检查和疫苗种植，预防传染病发生。

十一、学生管理与奖惩

奋斗中学一九四二年成立，招收新生八十名，加编级生一名；一九四三年招生七十二名，加编级生二名；一九四四年招生六十八名，其间有部分学生参军、转退学；到一九四五年初共有学生一百九十八名。这些学生分别在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中学习。每班设导师一人，管理教学生活事务。学生上课期间的考勤，一律由值周生负责，教师只负责抽查。学校设有生活指导委员会，指导学生日常生活。

除学校教职员进行学生管理外，学校还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宗旨是为养成自治精神，学到社会服务技能，促进德知体群各育，达到平均发展的目的。

学生自治会以班为单位。学校总设常委会，常务会分设下列六组：

1、总务组，下设文书、会计、事务三股。

2、组织组，下设督导、统计两股。

3、生活组，下设伙食、卫生、纠察三

股。伙食股负责分配管理伙食之人选，参加伙食结算、报告、公布等事宜。卫生股负责管理校舍卫生清洁，慰问患病同学。纠察股负责纠察排解同学言行纠纷。

4、学术组，下设图书、研究、出版三股。

5、康乐组，下设体育、游艺两股。

6、服务组，下设合作社、及劳动服务两股。

奋中实行下列奖惩办法：

1、学生一月内除节假日外，包括自习一节不误者记功一次。

2、个人或全班学业成绩特别优异者，学校酌予奖励。

3、记功一次，算大功一次，记大功一次增加本学期操行总分一分。记过者反此。但前功不能抵后过，后功可抵前过。

4、学生未经准假一日不到校者，记过一次，三日不到校者，记大过一次，一周不到校者，强迫退学。请事假超过一学期三分之一者，令其休学。

5、学生无故旷课一次者，训戒，二次者，记过一次，余类推。满三大过者令其退学或开除。

6、学校每学期设置傅作义先生奖学金三十名。

奋斗中学的奖惩制度是严厉的，上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上各部分，仅是对奋斗中小学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且本人掌握的情况不够丰富，脱漏不详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知情者与行家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国立绥远中学始末

王 崇 山

国立绥远中学（以下简称国立绥中）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绥远沦陷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三九年成立的。当时的绥远省教育厅长阎伟，因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有关系，奉命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回陕坝筹备，同年九月正式开学上课。当时只有学生近三百人：初三一个班二十余人；初二一个班四十余人；初一四个班二百人。这些学生一部分是由沦陷区（主要是托县、莎县）招收来的流亡学生，大部分招收的是河套地区的学生。

国立绥中第一任校长由阎伟兼任，教导主任李成，总务主任卢继业，教师职员共二十余人，大部分是在筹备期间由沦陷区来的。当年冬天，由于日寇侵略河套，学校遂由陕坝迁到宁夏平罗。到平罗后正值春节期间，休息几天后，即向地方借到一些房舍，开始上课。

一九三九年底傅作义将军打响了五原战役，彻底消灭了日伪军，收复五原后，学校于四〇年五月迁回陕坝。由于地方缺少、分散在几处，校部在铁匠炉巷陈三仁院内，教室占着公产房（即现在实验小学），学生宿舍占数处民房，由于上课、住宿分散，不便管理，按照傅作义指示，翌年校址迁到三道桥梅令庙。

一、学校的组织机构：

国立绥中的组织机构比较庞大而完整。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校务委员会，由九人组成，学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来决定。学校设校长一人，下设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会计处，分别设主任一人。教务处设教学组、注册组、设备组，各设组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训导处设训导组、管理组，各设组长一人、干事若干人；总务处设文书组、事务组、伙食组、出纳组，各设组长一人、干事若干人；会计处有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

历任校长：

第一任校长阎伟（教育厅长兼），一九四

○年由宁夏迁回陕坝后，由曹诚斋接任。一九四〇年后半年曹病故，由张淑良接任。不久又由教育厅长潘秀仁兼任。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又由张淑良担任，一直到学校迁移呼市后，张调教育厅，由段成梁接任，直至解放。

历任主任：

教务主任有：李成、吉作哲、贾武、邢钟岳。训导主任有：王绥之、孙蔚章、金载民、段成梁。总务主任有：卢继业、苗国华。会计主任有：阎秉鑫。

历任组长：

教务处：教学组长耿子德；注册组长王崇山；设备组长：（姓名不详）；训导处：训导组长李育德；管理组长高云、高庚宇；军训教官有：崔子奇、魏春长、唐希舜；总务处：文书组长张伯平；事务组长王维新；伙食组长张吉甫；出纳组长王纪三。

历任校务委员：

除历任校长为当然委员外，有李成、卢继业、吉作哲、贾武、邢钟岳、苗国华、金载民、孙蔚章、阎子刚、孔博泉、耿子德、王崇

山、王广统。

二、学制、班级和学生：

国立绥中从一九三九年成立后，即设立初中班、高中班，随后又设立了简师班。初、高中的修业年限为三年，简师为四年（四四年后改为三年）。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七年春搬迁呼市。解放后于一九五〇年春与“归绥中学”、“私立正风中学”合并为“归绥中学”。

国立绥中历届招收的班级：高中是十个班，初中是十七个班，简师是八个班。高中除第一届、第二届为一个班外，其他各届均为两个班。初中除三九年成立招收初一四个班外，其他各届为二个班。简师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学生每班为五十人，到合并时止，总共招收学生约一千七百余，毕业生约一千四百余人。

三、国立绥中对绥西教育所起的作用：

绥西即当时西山咀以西的地区，也称河套地区。绥西当时设安北、五原、临河三个县，后增设了米仓县、狼山县、晏江县共六个县。

绥西地处边陲，交通不便，除水运有些大木船外，陆运只有少数骆驼。所以，绥西的教育很不发达，去外地求学的学生也寥寥无几。除各县城有一所完小外，其他区乡仅有些初小，多为复式班级。中等教育根本没有。

当时，全绥远省也只有几所中学（包括敌占区），归绥有：归绥第一中学，第一师范（五年制），中山学院，女子师范、职业学校。包头有：包头市第二中学。还有集宁师范。每个中学除一、二中设高、初中各三个班，师范五个班，中山学院有高、初、师各三个班，（只毕业了一个文史专修科班），其余均为初中、初师三个班，其他地方根本没有中学。

国立绥中成立后，除招收沦陷区少数流亡学生外，大多数都是由当地招收，所以，为绥西学生上学开了方便之门。国立绥中在绥西的几年中，给初等教育培养了不少师资，也培养了许多大专预备学生。截至绥中迁校止，高中毕业八个班约三百二十余人，这些学生绝大部分考取了外地的大专院校。简师毕业了四个班，学生约二百余人，这些毕业生绝大多数成

了绥西的教员，为绥西发展教育奠定了基础。就以米仓县为例：一九四〇年全县有十九个乡镇中，仅有三个初级中心小学，即初小一至四年级。其余各乡虽有中心小学，也多为复式教学，只有教师二、三人。而各乡设的保国民学校只有一个班一个教师。但到解放前夕，全县已有高、初级小学约四十所（其中有完小四所），学生约三千余人，教师约有一百三十余人。这就不难看出，绥西教育的发展与绥中培养师资、加强了教育事业是分不开的。

国立绥中毕业的学生，不仅在数量上给绥西发展教育增加了力量，而且在质量上也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时，绥中的教师，除了从绥远沦陷区出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外，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一部分新毕业的夫学生，因而，绥中的教师质量是很高的，比如语文教师有陈之德、刘幻尘、程维城、赵寒操；英语教师有阎子刚、朱宝光（朱子平）、范呼三、段成梁；数学教师有曹诚斋、苗国华、段武、邢钟岳、宋雪山；理化教师有阎博群、杨景贤、郑才；史地教师有吉作哲、贾秉温、张鹏举、孙蔚章

等等。这些教师，解放后大部都担任了呼市或内蒙的大专教师。

国立绥中，在抗日战争期间人力物力的困难条件下，除了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外，对文娱、体育活动也相当重视，这也对绥西的文体活动有相当的影响。体育方面：在体育教师孔博泉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大型的田径运动会，篮、足、排球的比赛活动，经常进行，当时在绥西，绥中的篮球、排球、田径项目，都是绝对冠军。优秀运动员如：乔学元、曹万化、姜一强等，不仅是当时的出色运动员，而且，目前在内蒙体坛上也很有名气。国术方面，当时也很活跃，在教师刘恩绥（现在内蒙师大）的指导下，有不少学生每天锻炼，除了徒手教练外，还有刀、枪、剑、戟的训练，经常在舞台上进行真刀真枪的表演。文娱方面也是活跃的，当时有音乐教师姚贤臣，他不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对多种乐器有很高的演奏水平，柳琴、二胡最为特长；此外，对京、晋戏剧也有研究，拉前场甚为熟练。因而在绥中当时文娱活动项目很多，

除大型活动一学期有四、五次外，小型演出差不多每周都有。在文娱项目上，除歌咏、舞蹈、乐器、相声、快板、大鼓等外，每次活动都有话剧、京剧、晋剧的节目演出，并且很受群众赞扬。

四、国立绥中师生的困难处境

国立绥中的师生，在学习生活上都是很艰苦的。在饮食方面主食虽然是小米、白面，但副食质量很差，有一阶段因保证军粮，主食全是豌豆面。住的是土房、土炕，小门小窗，窗上糊的全是麻纸，坐的是泥凳、土台，点的是葫油灯盏。上课没有课本，老师讲课边编边讲；学生听课坐的低木凳，用小木板一块放在膝上垫着写字；用的文具学生是铅笔，老师是毛笔，纸全是麻纸和雪花纸。尽管这样，老师教课非常负责，讲课有教案，作业全批全改；学生学习刻苦用心，认真钻研。

国立绥中的师生，除了在物质上很困难外，在政治上也受了不少灾难。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对

内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大片国土让日寇侵占。凡是爱国的中国人无不发指，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反动派的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不免要有所指责。但是反动派的一些爪牙，把这种正义的言论，说成是“反动”，把有这些正义言论或爱国言论的人，说成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嫌疑分子”。当时，国立绥中就有特务横行，他们经常在教师、学生中间，监视有爱国言论或进步思想的师生。每到寒、暑假前两天，就有国民党军警在夜间武装包围学校，把他们所谓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嫌疑分子”扣捕起来，送到外地“战训团”或陕坝的“国民党战时青年训练团”。前后被捕的教师有王绥之、王绍周；学生有马信龙、赵新民、石雷、周恃天、孙生荣、柴如璧等数十人。所以每到假期来临，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这个东鳞西爪的片断记述很不全面，因事隔多年，情节之误差在所难免，希知情者给予补遗纠正，以使资料更加完善。

（杭后政协供稿）

洋教士逼我走上革命征途

刘进仁 忆述

田聪颖 整理

岁月流逝，一晃我已年过八旬。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洋教士逼我“上梁山”的那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现将它叙述如下。

一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勒索了大量白银，割据了中国的领土，控制了通商口岸，强行设置了租界，取得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内河航行、以及在中国驻军传教等特权。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帝国主义各国大体划分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到一九〇一年九月，清政府同八国联军和比利时、荷兰等十一个国家签定

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

比利时、荷兰这样两个小国，看到内蒙古地区是个空白点，不属于“势力范围”的地盘，故于一八六四年派遣了首批传教士，来到内蒙古地区，这些洋教士们披着宗教的外衣，一手拿圣经，一手持刀枪，在绥远、热河、察哈尔成立了“圣母圣心会”组织，创办人是比利时神甫南怀仁。

洋教士来到内蒙古地区不久，便建立起了三个大教区：第一教区是在一八六五年，南怀仁从绥远到了张北县的西湾子，建立起的西湾子教区。一八六七年南怀仁开始向绥远发展，一八七五年派其心腹德玉明（也是比国传教士）到了三盛公，在绥西和陕、甘、宁一带活动，建起了第二教区三盛公教区，第三个教区建立在热河的松树嘴子一带。这三个教区也称东蒙古教区、西蒙古教区和中蒙古教区。

德玉明神甫到了三盛公后，便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搜集当地情报进行传教活动，地方官

吏见了洋人点头哈腰，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而当地群众不吃洋教士那一套，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和洋人斗争，搞得德玉明之流昼夜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三盛公西有个旧地，这里住着一位农民，以卖瓜为生。洋教士们来到三盛公后，常常到瓜地白吃白拿，这位农民恨透了这些家伙。在一天当午，烈日炎炎，有一个洋教士又来吃瓜，当他低头吃得津津有味时被这位农民手提铁锹，喳地一下结果了性命，然后一溜烟地跑了。这个人命大案轰动一时，官府配合洋教士们好长时间捉拿凶手，结果杳无音讯。随后，德玉明就在这块种瓜地上盖了教堂，由于教堂在三盛公之西，故叫“西堂”，也称“旧地堂”，这是德玉明来三盛公后建起的第一所教堂。后来又在三盛公之东盖了一座教堂，叫“东堂”。还在三盛公的西北方向也盖了座教堂。叫“圣母堂”。这样一来，三盛公便成了绥西和陕、甘、宁一带传教活动的中心地区。

一八八八年，德玉明神甫死了，一个叫闵玉清的比国神甫在三盛公当了主教。闵玉清是

个典型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他的活动遍及各地，西安、兰州、北京他都去过，他曾任过两任教会会长职务，代理过主教一年，后来正式成为西南教区的主教。

明玉清接任了主教之后，使教会有了很快的发展。他采取从土地入手，河套的教堂除了三盛公的东堂、西堂和圣母堂外，后来建起的临河、五原等处的教堂，绝大部分都是他规划搞起来的。每定一新堂口，都是首先置买土地，用土地来利诱农民入教，即谁种地谁必须先入教，不入教者，不给拨地。这种利用土地进行传教和剥削，是洋教士在河套进行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洋教士在河套侵吞土地有两千顷以上。

洋教士们为了大量占据土地，于一八九四年向阿拉善旗租到三盛公周围三处土地：一是南粮台，二是金沙庙，三是傅家湾，并在粮台设立了堂口。明玉清还和萨县二十四顷地教堂的韩默里神甫串通一气，到乌不浪口一带，抢占了杨寡妇的土地，几乎把达拉特旗西部的整个土地搞到了手，并建起了玉龙永教堂。到一九

○一年，河套补隆淖尔一带的沈家河子也被天主教侵占了，当地绅士沈朝品便到宁夏府和兰州府告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样补隆淖尔和沈家河子一带便名正言顺地到了天主教手里。

洋教士们为了逐步扩大地盘，真是不择手段。在二十世纪初，明玉清神甫和一个姓费的洋教士，把三盛公官府的王爷请来吃肉喝酒，当这个王爷喝得大醉之际，把预先写好的契约拿出来让他签字，这位王爷便稀里糊涂地签了字。结果把陕坝、圣家营子、黄羊木头、渡口堂、上下蛮会、南台子等地都拱手送给了天主教。后来，这些地方也都建起了教堂。到民国初年，河套建起大小教堂十几座，从南粮台经三盛公东堂、天兴泉、四坝、渡口、补隆淖尔、黄羊木头、乌兰淖尔、陕坝、兴隆镇、蛮会，一直伸延到河套北境的大发公，几乎遍及河套整个西部地区，教徒猛增到四五百人。真是教堂林立，教徒遍地，一个天主教的“独立王国”在河套形成了。

明玉清等反动神甫为了长期占据河套土地

和蹂躪河套各族人民，既和地方官吏、大地主、军阀相互勾结，又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在教区内，他们包揽词讼，任命村长，分配土地，开办学校，管理治安，举办邮政，建立围堡，豢养打手，私藏武器，美其名为“特殊地区”。他们为了防范教徒和老百姓起来反抗，一方面私立公堂、监狱、任意处罚教徒；另一方面用“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等精神鸦片奴化毒害中国人民。各个教堂都组建起了民团，配备了武器，仅三盛公教堂约有近百条枪。洋教士实际上成了河套的“洋皇帝”，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有这样两件事：

其一是，一位老头被断三截。辛亥年间，从河南省来了一位卖烟叶的老头，到了杭锦旗准葛教堂叫卖。准葛教堂的教会长（绰号叫李长胡子），向老头称了些烟叶，不但不给钱，而且连句顺气话也没说，扭头就走了，气坏了这位老头，他连忙追上去拽住李长胡子的衣襟央求道：

“大人开开恩吧，我家老小全靠这点烟叶钱活命呀！”

“啊！”李长胡子拍了下胸脯咆哮道，“你眼睛长到后脑勺上去了，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这时，围来好多看热闹的群众，老头以为有人会站出来抱打不平，于是更紧紧地拽住李长胡子的衣襟不放。在众目睽睽之下，李长胡子只好如数付了钱，悻然甩袖而去。老头胜利了，围观的人们心里也为他庆幸。可他哪里知道，大祸就由此临头了。

事隔了不多几天，上面要求各地清查上报“哥老会”成员。李长胡子听到这个情况后，心生一计：借这股风给老头定上来后套发展“哥老会”的罪名，以报其受辱之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一天，狂风呼号，黄沙满天，人们眼都睁不开。李长胡子指使几个教徒把那位老头拉来，硬逼其承认是“哥老会”成员。朴实正派的老人哪里知道这是故意谋害他的圈套，于是高嗓门辨解说：

“我是个受苦人，哪省得这个会那个会！”

“胡说！”李长胡子暴跳如雷地喝道，“你是以卖烟叶为名来发展‘哥老会’的！”

这下可更使老头子莫明其妙，吓得目瞪口呆无言答对。“别装蒜！承认不承认？”李长胡子狠狠地往炕上砸了一拳。

……“苍天作证，你就是把我断成三截，我也不是‘哥老会’！”

“哈哈……”李长胡子双手叉腰，仰面狂笑起来。

“好样的，有点骨气。那就断成三截看你再嘴硬！”

教徒们在这个罪魁祸首的命令下，果真立即搬来了铡刀，把这位背井离乡无辜的老人断成了三截，其状惨不忍目睹。

其二是，三位农民被填入冰窟窿。一九一八年，河北大名府一带遭了年馑。有三个人逃荒到了三盛公，给姓常的人家打短工。有一天，他们三人到翰匠滩上砍柴，半后晌在一个银匠家里喝水，无意发现炕旮旯有几对银首饰。真是“饥寒起盗心”，他们三人出来商定：夜晚盗走这些首饰，回老家过个好大年。

深夜，他们三人从窗口上钻进家去，盗走了那几付银首饰，约有三两多重。可巧，这时那位银匠从邻居家回来了，发现偷盗首饰者正是白天半后晌来家喝水的那三个受苦人，他没有理睬，转身到了三盛公教堂向一个叫贝清明的神甫（比利时人）告状。贝神甫立即派人跟踪捉拿，不到天明，这三个受苦人就被五花大绑带到了教堂，贝神甫瞟了一眼，把手一挥说：“拉出去枪崩！”

三盛公教庆儿总管听说发生了此事后，觉得贝神甫小题大作，又没有和他招呼一声就要枪毙人，心里感到窝火，连忙跑到贝神甫那里，陪着笑脸说：“这……这是本地政府的事，由我们查办吧！？”

“什么！”贝神甫眼睛一瞪，“你们王爷地一带成了贼窝子，你能管得了吗？！”

“这……”教庆儿总管抓耳挠腮，无言以对。

“给我走开！”贝神父看见他那副样子，更加狂妄了。

教庆儿总管这个当地政府首领，只好牵拉

着脑袋，灰溜溜地退了出来。

贝神甫为了在当地政府和民众中显示其不可一世的威风，立即把一个绰号叫秃满仓的屠夫找来，当面给了他五两白银，要他把这三个人拉到黄河边杀了。秃满仓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辛亥年间，天主教也曾雇他在大滩堡一次杀了二十多个中国人。这次天主教又雇他杀人，还给了他这么多银子，他当然唯命是从了。

秃满仓这个刽子手把人杀了后，为了不留痕迹。又在河心冰上凿开个大窟窿。把三具尸体填进冰洞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外国传教士这种以传教为名而行侵略之实的罪恶行径，河套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仁人志士早已义愤填膺。

早在一九〇〇年三、四月间，义和团从山东、河北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遍及四乡，大股百余人或七八十人，小股三四十人不等。义和团和当地“在理会”群众联合起来，向东蒙古教区总堂松树嘴子村发动了数次进攻，在赤峰城乡各地区出现了“神坛”，七月间，便攻下

了井沿教堂和赤峰城内教堂。

同年六月间，义和团从河北、山西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在丰镇、集宁、凉城、托克托和三盛公等地散发“神拳单”，设立神坛，教练神拳，号召群众起来反洋教。当时三盛公就组织起一百多人练神拳，与洋教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到玉龙永教堂一次就砍死五六个洋教士，大灭了洋人的嚣张气焰。

一九〇〇年间，西南蒙古教区分三段，东段在二十四顷地。西段以三道河的三盛公为领堂。南段以宁条梁的小桥畔为领堂。到同年六月间内蒙古地区东到集宁，西到三盛公，北到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南至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的广大地区，义和团纷纷兴起，捣毁教堂，惩处罪大恶极的传教士和“吃教”的地痞恶棍。萨县二十四顷地主教韩默理，看到义和团运动日盛一日，感到风声不好，让一个副主教带领了东川一带七八名神甫，火速向三盛公潜逃，而他自己自称主教任重，纠集教民和义和团拼命。七月十九日这一天，蒙汉族人民群众数千人，在义和团旗帜下，向西南蒙古教区总堂至

萨县的二十四顷地教堂发动了猛攻，七月二十日攻下并焚毁了教堂，活捉了主教韩默理，打死打伤了一百多名教友，七月二十四日，韩主教在托克托县被烧死。

同年十一月，明玉清派几个传教士到托克托县和萨县寻找韩默理的尸体。他们到了萨县之后，首先向官府要教堂里失掉的婴孩（广收婴儿是洋教士骗取金钱，收买人心的手段之一），听说这里的婴孩卖到了宁夏，他们不再找韩主教的尸体了，便直接到了宁夏回族地区找婴孩，见谁家有不缠足的女孩一律都要带走，拆散了不少家庭，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义愤。石嘴山南下营子教堂有两个叫梅布桂、彭寿年的洋教士，到当地农民龙占海家勒索婴孩，还要霸占龙的妻子，龙一气之下，在一天中午手提屠刀闯入教堂，把梅布桂当场砍死，彭寿年当时还没断气，过几天也死了。然后龙占海便朝野滩里跑了。后来龙被诱骗捕获，英勇就义。当地群众听说龙占海被洋教士杀害了，自发地组织了起来，用整猪、整牛、整羊在大路上“祭祀”，以表对洋教士的痛恨和对龙

占海烈士的悼念，洋教士们看到如此场面，吓得魂飞魄散，逃之夭夭。。

二

在我幼年时，河北省献县一带遭了灾，我的父母就拖着儿女们逃荒来到了三盛公。那时，三盛公的人一般都加入了天主教，我们全家人也都入了教。父母亲还把我送到了三盛公修道院学堂上了学。

一九一九年秋我在高小毕业后，又到了萨县二十四顷地修道院念了三年书。一九二二年毕业后回到三盛公，给三盛公教会学堂当教师，这时我十七岁。

在教书期间，常能看到教堂所订阅的报纸、书刊。这些报刊有些是北洋军阀办的，有些是天主教办的，还有些是各家流派办的。主要是“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北京晨报”、“顺天时报”等，有不少报纸透露了“五四”运动的情况。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从北京传来一份叫《老虎杂志》。报道了好多关于“五四”运动和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工人

罢工的消息，还有段评论说：

“中国是一只沉睡了很长时间的老虎，现在这只虎睡醒了，龇牙裂嘴吼叫了。这只虎可不是好惹的，到时候会吃人哩！……”

北京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响导报》也传到了三盛公教堂，我记得有这样一则消息：

“……列宁宣布，原沙皇俄国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全部退还中国。签定的所有条约，予以取消。……”

三盛公的一些洋教士看了这些消息后，有的胆战心惊起来。但也有个别的翘起拇指连连称道：中国人不是孬种，真了不起呀！

报刊上的新思想，对我影响颇深，这使我联想到天主教任意杀中国人的惨景，不由地感慨万千，浮想联翩：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受象比利时、荷兰等这样的小国欺凌呢？我们中国人难道缺胳膊少腿吗，难道就不能站起来和侵略者进行斗争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中国青年，应该有点骨气。为什么还甘心给洋人当教

员呢……

一九二三年冬（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父母花上大价钱在三盛公给我娶了妻子。可是过门后由于不能过夫妻生活（当地人叫石女子），我提出把这个女子再送回娘家去，父母认为也只能是这样了，于是就把她送回娘家去了。可是这家人家到天主教那里告了我的状，还给比国贝神甫送了厚礼。贝神甫接收了贿赂后，很快派人抄了我的家，勒令我家把那个女子再接回来。我给说明情由，他们仍不睬理，反而把袖子一甩说：“那是你命里注定，不能过也得过！”

父母怕我想不开，忙劝我说：“官府对洋人都不敢惹，咱们老百姓更是惹不得呀，就依了人家吧。”

是的，父母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洋鬼子，什么事也可以干得出来的，他们不是把河北大名府的三个受苦人填进冰窟窿吗？不是把一个老头儿腰断三截吗？幸亏我还在教堂里念过书，又是给他们当教员的小秀才，对洋教士们来说，还是用得着的人，要

不，说不定也被填入黄河了。

我常常扪心自问。“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给洋人们当奴才吗？不，北平的青年学生已觉醒了，我也不能老是沉睡着，也应该向他们那样，敢于起来斗争。中国偌大个地方，哪里不养人，何必在三盛公受洋人的欺负。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我打定主意要远走高飞，先到萨县二十四顷地找我的学友张焕文商议一下。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初夏，我偷偷地离开了三盛公，坐船顺流而下到了包头，又步行到萨县二十四顷地找到了张焕文同学。他一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把在三盛公受天主教洋人欺负的情况给他叙说了一遍。他说：“这不止三盛公如此，到处都是这个样儿，有些当官的最怕惹下洋人”。我说：“我是不能再回三盛公了，说不定贝神甫等现正在搜捕我呢”。焕文说：“咱俩到绥远念书去吧！”

“能行吗？”我说。

“可以”。焕文满有把握地告诉我说“原

二十四顷地的一位姓阎的老师，现在成了绥远一中的校长，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待我相当好，有一次阎老师曾启发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很有志向，但要成大器，必须多读书，要住几年公立学院”。所以，我已打定主意到绥远一中念书”。

“能接收我吗？”我问。

“我尽力说合，甚不甚先去一趟”。

就这样，我与张焕文相伴来到了归绥城。

到了归绥，给阎老师说明我俩的来意，焕文还特意向阎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阎老师告诉我俩说，绥一中招收的学生，必须懂得些英文。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张焕文懂得点英文，考进了绥一中，而我考进了归绥“西北职业学校”。

同年（一九二四年）冬放了寒假后，我住到一个车马大店里，不打算回三盛公过年了，怕三盛公贝神甫等洋教士们暗算我。张焕文知道我住在了一个车马店时，就通过有关人说情，让我到绥远会馆里住。只掏饭钱，不付店费。

腊月二十六、七日，张焕文要我到他家萨县二十四顷地过年，我当然是乐意了。两位老人对我热情招待，大娘见我棉鞋开了个大口子，连忙搓了根细麻绳子缝好。

当天晚间，在附近二牛子村居住的焕文舅父也来了，只见他满脸愁云，叹声不止，在小素油灯下不停地抽水烟。

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对焕文说：“你好在绥远省都统府给舅舅伸个冤，告那些洋狗日的一状，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焕文和我问道：“是什么事呀？”

这位老实的农民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民国十三年间，归绥一带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管治，在张家口驻扎了军队。冯玉祥为了统一政体，整饬社会秩序，开始了大规模的清乡活动，重点清理隐藏在山区乡村的“哥老会”成员和杂牌匪寇。正在风声紧张时刻，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洋教士彭神甫借机敲诈民财。一天彭神甫见到焕文的舅舅时，表示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说：“不好了，有人告发你是哥老会成员，明后两天西北军就要来抓你”。

这可吓坏了焕文的舅舅。连忙哀求彭神甫说：

“我上有老，下有小，求彭神甫给做主。”

“人命关天哪，我可不敢担这个风险。”

“你代我偷偷地给西北军当官的送些银钱，看行不行？”

一听说“银钱”，彭神甫紧蹙的眉头顿时舒展了，嘿嘿一笑说“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拿钱，就舍上我这老脸去为你说个情。”

“那太感谢神甫了。”

“准备付多少钱？”

“五百元白洋够了吧！”

“不行，这么大的事才送五百元，最少再增三百元。”

“只要保我无事，我好再投亲靠友借吧！”

就这样，我七凑八凑给彭神甫送去了八百元白洋。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彭神甫耍的鬼把戏。我本来没有参加“哥老会”，也更没有人去告发我，可钱已经到了彭神甫手里，彭神甫还装模作样地到了趟张家口，回来对我说亲自

把钱交给了县官。这不是哄鬼吗？！……

焕文的舅舅诉说了这件事的经过后，长叹一声说：“这借下的债我怎能还得起呀！”

我听了肺都要气炸了，我更加恨透了这些洋教士。于是我和焕文当场答应为他写告状的呈子，代他到绥远都统府那里打官司。

过罢年正月初几，焕文和我就回到了归绥，即把告状呈子递给了绥远省都统府总管李明忠。不久李明忠被撤换了。李明忠临走时，把这个呈子移交给了一位新接任的秘书长。二十四顷地的彭神甫听说我俩写呈子告他，急得象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也赶紧给这位省政府的秘书长递来了呈子。呈子里写道：“你们省政府不要听信那些无知的学子胡言乱语。……”

焕文和我听说彭神甫也递上了呈子，就又来见这位秘书长，并向他陈述了事情的原委。这位堂堂的秘书长无可奈何地说：

“这个事我也相信是真实的，打心眼里我也是同情的。如果我的心能掏出来给你俩看看，我也就掏出来了。我也是没法子呀！”

“那也得过问一下，咱们地方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呀！”焕文说。

“是呀，就是因参加‘哥老会’该罚款，也应由当地政府罚呀，天主教罚的是什么款：就是在圣经上也找不出这一条来，省政府不能不管呀！”我有些激动地说。

“好了，你们回去吧。”这位秘书长把手一摆说，“明日打发人去查办。”

次日，省都统府真的打发了两个副官去萨县二十四顷地教堂审理此案。这两位副官到了教堂见了彭神甫，说明了来意，不料彭神甫便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冲地过来一只手卡住一个副官的脖子，一把推出了大门，并喝道：“你们官府管不着我们外国人的事，给我滚远！”

这两个副官，在门外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长长地吁了口气，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俩听说了这个情况，怒不可遏地又去见都统府的那位秘书长，问他说：

“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耻辱？”

“唉！”这位秘书长说，“咱们中国人民

的这种耻辱太多了……”

看到他那无可奈何的样子，我俩便扭头走了。可是这口窝囊气老是咽不下去，仍然继续往都统府里递呈子，都统府便把这个悬案推给了下属“道尹”（都统府下属管行政事务的机构）办理。道尹的主管邓昌跃接收了这个案子后，不但不去审理，反而专程跑到萨县二十四顷地教堂彭神甫那里陪礼道歉去了，好象是洋教士做下了得理的事情似的。我俩听说了这一情况后，真是心寒齿冷，再也不给都统府写呈子了，深深地感到，省都统府的官和三盛公官府的官是一个样，全是些孬种，要使我们中国人象个中国人的样子，靠官府是靠不住的，好多达官贵人在老百姓面前是老爷，一见了洋人就变成了孙子，那副奴相实在令人作呕！官司没打赢，我和焕文也只好忍气吞声，焕文舅舅的八百块银元也就那样被诈骗了。

三

一九二五年春，由于我在西北职业学校学了半年英文，也考到了绥一中补习班。当时有一

位叫邱贤的老师给我们补习班代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他常给我们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可是，“共产主义”这四个字，从来不往黑板上写。邱贤老师举例子说，世界上剥削者是极少数，穷苦人是大多数，就是剥削者内部，也是互相侵吞，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今后的天下，必定是穷苦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天下。

……

我们听了邱老师的课，觉得真新鲜，说出了老百姓心底蕴藏的话。我们同学之间常常私下议论说，邱老师学识渊博，才华过人，敢说敢为，非一般之人。

邱贤老师听说了我不敢回家过年的事后，把我叫去问事情的原委，我就把外国神甫在三盛公随意杀人迫害我的情况说了一遍。邱老师听了很是忿然，他要我写个详细材料。于是我以笔名“向鲁”写了个材料交给了邱老师。

邱贤老师看了材料后，认为不错，基本

上揭露了外国神甫在河套地区的罪恶事实，便投寄到了上海《中华杂志》和《北京晨报》两个编辑部。稿件发出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家编辑部都给刊登了，当时我感到格外欣慰。

我考入绥一中不几日，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同志，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名义，选派了吉雅泰、任殿邦等同志到了绥远地区，筹备成立了“国民党绥远党部”。（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吉雅泰等同志来绥远后，住在了巧尔气召西边的小院内，他待人热情，为人厚道，非常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利用各种场合散发从北京带来的“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小册子和传单，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及民主革命思想；还利用当时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拆了旧城南城门后盖起的“民乐社”放幻灯片子，以此来揭露军阀的残暴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他公开在群众中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地”等口号；每星期天还在

巧尔气召召集会议，给国民党员和进步青年作宣传，好多进步青年以巧尔气召为活动据点，经常去阅读革命书刊、报纸，听吉雅泰同志讲革命道理，讲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特别是绥远一中的青年学生，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起了中坚的作用。

绥远革命青年在巧尔气召开展的活动，引起了反动上层的极为不安。绥远一中的校长赵允义以及省教育厅的潘秀仁等极力反对，在学生中大肆讲什么“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教，制止学生到巧尔气召参加活动。可是，他们越制止，参加活动的人越多，并根据吉雅泰同志的指示，很快以绥远一中为主体，成立起了“绥远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们当场推举张焕文为“学联”主席，下设募捐股、宣传股、交际股、纠察股，我当时任交际股长。有不少要求进步的青年由于受到吉雅泰等同志的宣传教育，积极要求加入组织，吉雅泰等同志就从这些青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中共党员，为绥远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充实力量。

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年初，绥远西北

职业学校换了个校长，叫靳和森，自称是国民党党员。他来后不几日就把他的同学路作霖请到西北职业学校当老师，并兼任教导主任。路作霖是山东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名义上是来绥远西北职业学校任教（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北方局党组织直接派来的中共党员），实际上是来绥远搞党的地下工作。他来时带了好多进步书刊，有《列宁专号》、《红色五月》等，他一来就和吉雅泰等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有一天，张焕文和我说：“听人们传说西北职业学校新来的那位姓路的老师很有学问，而且敢说敢为”。

“我也听不少同学这样说。”

尤其是路老师讲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时，情绪非常激昂，很有感染力。焕文同学用手比划着说。

“和路老师会个面好吗？”

“好，我先去联系一下。”

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焕文同学对我说已和路老师联系好了，让当天晚去见面。焕文同学

并预先向路老师介绍了我被外国教士迫害的情况。于是，我们俩人就到了路老师的宿舍。

路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俩，他看上去很精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举止文雅端庄，一看就象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

“你叫……？”路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问道。

“刘远志。”我回答说。

“哟：这名字可……”路老师风趣地伸出了个大拇指，“听焕文说，你是被天主教逼出来的？”

“是的……”

路老师说：“我们中国人应有点骨气……”听了路老师的话，心里热乎乎的，顿时增添了力量。紧接着路老师拿出一些书刊，有《列宁专号》、《红五月》、《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等，还有些是传单。看见这些书和传单，感到分外新鲜，象“共产主义”、“共产党”这样的名词还是第一次接触。

路老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们反帝的决心很大，这是很好的，但是，与外国教

士斗争，把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单靠几个人去跟他们打官司是不行的，只有象苏联那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组织广大劳动群众起来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人民的愿望。”

“那……” 焕文同学和我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疑问声。

这时路老师显出了异常严肃的神态说，“我们大伙儿要跟着一个党走”。

“跟着哪个党？” 焕文和我的目光同时投向了 他。

“这要绝对保密”，路老师凑近我俩说：

“这个党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 焕文和我又惊愕地同时出声了。

“是的”，他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继续说，“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孙中山先生搞了几年革命没有成功，追溯其原因，就是没有广泛地唤起民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在晚年看清了这一点，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也提出了反

帝的口号。‘反帝’这个口号首先是共产党提出来的”。

……

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路老师这么一说，使我茅塞顿开，心头忽然亮了起来。我们三人不知不觉地谈了六七个小时。临出门时，路老师给我俩带了些书刊和传单，让回去阅读。还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以后常来常往吧！”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第二个礼拜六晚间我单独去见了路老师，他见了我后大笑着说：“来来来，欢迎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次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就颇有赏识呀！”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只是笑，不知说什么才好。

“上次拿走的书看了哪一本？”

“《列宁专号》我看了两遍了。”

“有些什么想法吗？”

“读了这本书，深感列宁是伟人呀，他把世界上的道理阐述的明明白白。”

“你有什么打算？”

“不瞒您说”，我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要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那好！”路老师也站了起来，“你和张焕文等现在虽然是学生，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觉悟是高的，咱们绥远地区准备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共产党的前身，你俩已具备了共青团员的条件。”

听路老师这么一说，我心窝怦怦直跳，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次日中午，路老师带着张焕文和我，在舍力图召的庙廊里举行了入团仪式。经路老师的介绍，我们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代称：“CP”。路老师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给我俩作了指示，布置任务，还发给了一本“入团须知”，再三嘱咐我们要保密，遵守团的纪律。

从此之后，张焕文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见路老师，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和他的教育启发，使我们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吉雅泰同志领导成立的国民党绥远党部，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路作霖同志是来绥远专搞共

青团工作的。由于路作霖同志在西北职业学校任教，所以团的活动中心点也就建立在该校。

我入团后不久，共青团北方区派来了特派员彭振刚同志（东南大学助教）来绥远指导团的工作。为了便于活动，他以张家口西北青年互助总社的名义，在绥远成立了西北青年互助总社绥远分社，我担任了分社的常务委员。

一九二六年六月，我由路作霖、彭振刚二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吉雅泰同志参加了我的入党仪式，我就这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前后天主教在河套

地区活动点滴

邹国华

一、天主教在河套的概况：

河套地区的天主教会，原隶属于绥远省宁夏教区，当时宁夏教区主教王守礼，（比利时人）座堂虽在三盛公，实际上则常住陕坝。常住神父的教堂有三盛公、陕坝、渡口、东堂、补隆淖、乌兰淖、黄羊木头、三道桥、大顺城、王亮滩（新堂）蛮会、大发公、圣家营、临河县城和五原县城等。常住神甫的教堂一般都常住修女（临河县城和五原县城无修女），管理“圣堂”教书或搞医药。宁夏教区，在主教之下设副主教——傅亭维住陕坝，还设河套、银川和三边等三个区长，河套区长周其智住陕坝。

二、天主教的经费：

天主教在河套占有大量土地，并开挖了一些渠道，（即今杭锦后旗园子渠）凡信奉其教的，即可租种其土地，收租多数是按三、七分成，个别的也有二、八或四、六分成的，这是它经费来源之一，也是它的传教的方法之一。后来冯玉祥将军进入后套，收回了天主教占有的土地，他的这一财源从此断绝了。

它的经费还有来自国外的，即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及梵蒂冈教廷。圣母圣心会在北京、上海、天津都设有机构以经管其所属各教区的经费，圣母圣心会所属各教区有绥远、宁夏、集宁、大同、西湾子、赤峰等。

还有一小部分经费来自教徒们的献仪即捐献。捐献有以下几种形式：

1、自动捐献，如信教农民自动捐献活鸡、鸡蛋等实物。

2、弥撒献仪，弥撒是天主教会的祭礼。由当地主教规定，求一台小弥撒多少钱，一台唱弥撒多少钱，一台大礼弥撒多少钱。一般求一

台小弥撒需要一人一天的较好的生活费用。唱弥撒三倍，大礼弥撒十几倍。教徒有婚丧大事，大都要求做弥撒，有时为纪念亲友逝世几周年也要求做弥撒，祈赐早日升天，有时求病人早愈，有时求出门平安等等……。另外还有由国外寄来的弥撒献仪。

3、募捐：每年秋、冬教堂把所属地主等富裕户户主请来以办学等名义，要求认捐小麦若干石，这是比较大的一种收入。

三、天主教的教育与医药：

教会办教育也是它传教的一个主要方法。当时后套天主教所办学校统称普爱学校。抗战胜利后在陕坝还成立了普爱中学，分初、高中。校长孙仲贤是梵蒂冈留学生，解放后被捕，死于狱中。陕坝、三盛公、蛮会、渡口等地设有完全小学，其它各堂（临河县城及五原县城除外）都设有初级小学。当时所有普爱小学除一般应设课程外，都还另设宗教课，教唱教会歌曲，解放前，河套天主教还召开过全河套普爱学校体育运动会。总之，天主教在河套

办教育，其实质虽是传播教义，但客观上对地方的普及教育也起了些积极作用。

后套教会没有医院（解放前，曾筹备过成立医院），只有在陕坝、三盛公、渡口、王亮滩、蛮会、黄羊木头、圣家营设有门诊即诊所。由修女看病，他们大多在归绥公教（即天主教）医院受过护士训练。看病一般是要钱的，也有免费的。平常免费的是贱药。其余教堂虽不设门诊，但神父多数都备有一些常用药给人看一些常见病，大多免费，算是慈善事业，也是传教的又一方法，但对地方上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四、河套天主教会的政治活动情况：

清末民初，国家政治腐败，领导昏庸懦弱，使帝国主义有可乘之机。天主教神甫——外国人在河套竟能行施国家权力。无论民事或刑事，都敢擅自判案，而且生效。后来，河套虽然设立了县，可是天主教在河套仍很有势力，洋人坐上插有比利时旗的红围轿车，可耀武扬威，横行无阻。

全国解放前夕，天主教堂又成了窝藏反动神甫、修士、修女和教徒的场所。如绥远教区副主教白祥，就是一九四八年逃来陕坝，以后逃至梵帝冈的。

当时还有从河北、天津等地，赤峰、集宁、绥远等教区逃来的许多神甫、修士、修女和教徒，其中有些是很反动的，如天津神甫刘马弟。解放天津时，他曾亲自率领教徒，武装抵抗。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经归绥逃来河套（当时我在归绥），后来被逮捕回天津。陕坝普爱小学教师杨益民、大学生，是河北省赵县教区教徒。曾在北京为国民党工作，也来河套教会躲避。

我本人也是由于对共产党不信任从保定经北京、归绥，于一九四九年夏逃来河套的。当时正值王守礼去三边视察，由副主教傅亭维接待了我。安排我到奎会普爱小学任教，寒假王守礼回陕坝，接见了我，特问了我是否有重大政治问题，并说如有重大问题，就设法把我隐藏在较妥善地方，否则就叫我到普爱中学任高中数学教师。我答应可去陕坝，但坚决不去

中学，于是在一九五〇年开学前到了陕坝普爱小学。

解放后，我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九五〇年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某县天主教某神甫提出中国天主教要自传、自养、自治。不久，全国各地教会掀起了“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当时上海寄来内部通讯（拉丁文油印品，是由梵蒂冈公使馆人组织的，我亲自看过）“辟谣”说，关于四川某神甫提出中国天主教要自传、自养、自治之说本刊无所闻。当时王守礼为时势所逼，在陕坝普爱小学召开了抗美援朝大会，宣布自己退位，让副主教傅亭维主持教会，两人还互换了住房。其实，这都是对外，而对内王守礼仍是主教，傅亭维只是傀儡而已。

圣母军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反动组织。全国解放前夕，中国教会大肆宣传将遭受教难，要有准备地应付教难，要仿效古代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伊斯兰教徒，争夺“圣地”。因而成立了圣母军，依靠圣母马利亚的保佑，想尽一切可行办法以应付将遭遇的教难。后来因怕共产

党怀疑教会搞武装叛乱，才改称圣母军为圣母慈爱祈祷会，但活动非常猖獗。

一九五〇年，周其智及李世芳等从天津把这个反动组织的章程和办法等带来了河套，河套地区就由神甫李世芳和徐声远等很快地组织了起来，并积极地活动了起来，党和人民政府识破了它的反动本质，于一九五一年宣布了圣母军是反动组织，要求一切圣母军会员向当地公安部门坦白登记，不久，就毅然进行了取缔。李世芳、徐声远等一批圣母军的骨干分子被逮捕。

一九五八年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团发表了宣言，中国天主教会脱离和梵蒂冈的一切关系，因此再不受梵蒂冈反动法典的约束。

天主教会在河套的历史简述

刘景冲

一八七五年比国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受荷兰、比利时等国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派遣来到了磴口东堂。一八七八年建立了三盛公天主教堂。以后陆续在东堂、天兴泉、圣母堂、粮台、兴盛扬、富太奎、旧地、哈拉图、王亮滩、渡口、补隆淖、黄羊木头、乌兰淖、三道桥、陕坝、蛮会、大发公、大营子等处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座天主教堂。

三盛公教堂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主教堂。管着绥远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五原三个县和宁夏、陕北、榆林等地以及阿拉善、伊克昭、西公旗、乌兰察布盟四个蒙古地区，共有教徒四万多人，占有大量土地，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和武器。并有政治和司法的特权，天主教的势力很大，俨然成为河套地区的天主教王国。

一、强占土地。天主教强占土地方式主要

有三种。

1、勾结、欺骗蒙古封建统治阶级，以廉价收买。据记载，光绪元年阿拉善王，招请教士们到他所属的西套去移民垦荒，光绪四年教士们从蒙人手中租到大批土地。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二年两年，姓费和姓文的两名神甫请来了杭锦旗的各级官员，大肉美酒一连款待了几天，于是包租杭锦旗的土地成功，东至达拉特、西至王爷地、北至乌拉特、南至董达公，允许教会开垦。以后每年由杭锦旗政府来人丈量一次，来丈量的人由教会大肉美酒尽情招待，整天酩酊大醉，丈量方式听任教会办理，或以跑马酌量，或骑马只在地边眺望一下，就坐下商议，加上私下送给银两绸缎，于是一百亩地说成一、二亩，绝大部分土地成为无租白地。

2、逼迫、兼并地主土地。一九二〇年杨米仓等挖杨家河经费不足，陕坝天主教神甫邓德超乘机借给杨米仓八万两银子，渠成后教会要钱，杨家还不起，随将一部分土地让给教会。因而三道桥一带土地，东至沙沟渠，南至

双炮台，西至堂圪子（三淖儿），北至胡柜城，都归教堂所有。当时三盛公一带土地，原为地商申十万所有，后与教会发生纠纷，洋人打赢了官司，把申家原有的天兴泉以下至补隆淖及申家河（沈家河）两岸土地皆归了教堂，申家只剩乌兰木头一小部分土地。准葛地张二奎和其叔父曾包租杭锦旗的一部分土地。光绪三十年张二奎被教会赶走，强占了他的全部土地。

3、借口庚子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失败，强夺土地。光绪庚子赔款，河套的天主教更借此机会提出赔款要求。光绪三十年绥远道用黄特拉亥（黄济渠）、达拉特旗地一千四百顷，抵作赔款。三盛公教堂也提出赔款要求，遂定由阿拉善旗赔银五万两。当时阿旗王爷只能交银二万两，尚欠三万两无力付出，于是将三盛公一带土地作为抵偿。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阿旗札萨克清理此案，重新与教堂订立合同，名义上将旧种之地全部收回，但仍归该教租种。面积达五万亩，占磴口全县面积十分之三。大发公原地商杨三寡妇（山西河曲人）权势很大。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教士闵玉清以

义和团焚毁教堂，杀死教友和杨三寡妇有关系为理由，向萨县政府起诉，结果将杨三寡妇和刘万寿的土地全部归给教堂，作为抵偿（西起户口地，东至公义恒，北至乌拉特西公旗，南至杭锦旗地界方圆六十多里，计地二千五百来顷）。

二、建立军事武装及各种反动组织。教会占据大量土地的同时，又以自卫护教为名，建立围堡，设置军事据点，以巩固其统治。三盛公主教王守礼在《边疆公教事业》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教士们修筑围堡，只求实际的功用，不图外表的观瞻……。”河套有围堡的教堂有三盛公（最早在光绪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建成），其次为蛮会、陕坝、乌兰淖、胜家营子、三道桥、黄羊木头、补隆淖、王亮滩、渡口、东堂等处，到一九三四年修建完毕。各教堂均有许多武器，三盛公总教堂有枪四百余支、套筒枪十余支。各分堂也有数量不等的枪支弹药，临河各教堂均建立起民团组织。三盛公、渡口、陕坝、蛮会等大堂口人数更多。如陕坝的梁疤子、王万红，蛮会的武双双、武

福福都是民团队长。整个天主教形成一个独立王国。此外，教会还建立了许多反动组织。如石扬修很早就~~在~~蛮会建立了“公教青年进行会”、“圣体军”。一九四八年在王守礼的指使下，周其智在陕坝，孙雪帆在三道桥建立了“玫瑰十字军”，河套解放初又暗地在堂口成立了“圣母军”等反动组织。

三、掌握政治、司法权力。据记载，三盛公总教堂附近，有些有地的自耕农，教堂强迫信教，人民不愿，即由教堂解决，教堂有权管理治安事宜。王守礼在《边疆公教事业》一书中说：“……于是传教士又负起了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的责任，除重大案件报告蒙王判处外，其它事情或纠纷，统统由地方传教士调解。”教堂私立公堂，设有枷锁、皮鞭、吊绳、老虎凳等各种刑具，常有人被关禁、吊打甚至被打死。神甫和别人发生纠纷，神甫没有打不赢的官司。传教士霸占、奸辱妇女的事也很多，如乌兰淖天主堂的吕化文、林允中就多次奸辱过妇女。教堂还买人做奴隶。民国十三年有个叫余克荣的贫苦农民，把亲女儿卖给了仁爱堂，

卖身契上写着：

“立写卖女文约余克荣，今因年景不佳，家内糊口不及，故将亲生女儿一名，乳名针针、年方九岁、卖与仁爱堂名下，当取糜子一石，价银一十五两整，同人明言……自今以后，或是不服圣教，违犯教规，或移居远方，任随该堂之便，此女不得自行便。此系两家情愿，并非逼迫成交。恐后无凭，立约为证。立约人余克荣（押）说合人白玉明（押）中见人马步法（押）代字人罗文秀（押）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

教会如此为非做歹，连一些当时游历的外国人也感到惊奇。如法国人奥伦子爵在他写的《三道河游历记最后的野人》中写到：“一九〇八年十月我从定远营到了三道河（三盛公）天主堂，这是比利时传教士们最出色开创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村庄，同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居住着。组织成一个天主教小王国，共有二十多个村庄，其中十一个教堂围绕在主教堂的四角。在这些荒野地方没有安置官吏，主教和各个本堂神甫，就是统治这五千余居民的首领。处理诉讼、任命村长、分配土地等地方社会活动，大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是一种新的‘巴拉圭’式的王国。”

四、开办学校，进行精神毒害。神甫们每

设一个堂口，就建立男女小学校，起初只学经言，后来逐渐增加其它课目，数理化占大部，地理、历史则不让学。灌输的思想是西洋文明，中国落后贫穷，使人消极、悲观、厌世，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神甫常说：“人死后在天主面前都一样，不问你是哪国人等等。”校内根本不让有什么爱国活动，只挂比国国旗，不让挂中国国旗，如在《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所说的：……记者在三盛公时看过他们的国语课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是汉字，但思想是十分有害的，第一说中国之所以穷，是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是由于中国人懒，不知振作……。第二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象我们中华民族的被压迫、被剥削，也是造化主定好了的。反抗也是无用的。

河套除比、荷两国传教士外，从一七八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还有过不少外国人借各种名义，披着各种外衣，来河套活动，为帝国主义刺探情报、搜集资料。如俄国人奥布切夫、斯卡西，法国人莱斯坦伯爵、奥伦子爵，商志华，

英国人马孟、康国太等。

以上这些，是我近几年来查阅资料，走访知情者所得情况，供读者参考。

三盛公天主教

主教座堂历任主教情况

郝 威

庚子赔款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传教士就以这种条约做为护身符，长驱直入中国大陆，进行传教活动。比利时、荷兰的“圣母圣心会”，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内蒙地区开拓传教基地。曾于一八六五年“圣母圣心会”正式接管了原“遣使会”代管的内蒙宗座代牧区。当时的蒙古宗座代牧区，共划分为三个代牧区，即西南蒙古代牧区，中蒙古代牧区，东蒙古代牧区。西南蒙古代牧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省教区；中蒙古代牧区，包括有西湾子代牧区和集宁代牧区两省教区；东蒙古代牧区，包括有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省教区。

一九二三年罗马教廷正式批准建立宁夏和

绥远两个代牧区。一九二九年罗马教廷又批准建立了西湾子代牧区和集宁代牧区。同年罗马教廷也批准建立热河和大同代牧区。从此蒙古代牧区才有了固定的省教区划分了。

三盛公教堂是一八六五年以来蒙古宗座代牧区开创的重点教堂之一。一八七五年阿拉善王爷在察哈尔某地与传教士相遇，得悉他们有志到草原开垦，就在这一年有两个教士德玉明、桂得贞获得阿王之许，先在现磴口县东堂支起毡包作为临时传教点。二年以后，从阿济尔玛移来二百多人，随又由岱海等地移来三百多口人建立了圣母堂、旧地等小村子，作为传教的根据地。

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教会买下了三盛公字号的旧油房一处，这是三盛公教堂的雏形。一八八三年闵玉清为三盛公教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甫，一八九二年华北地区年景不好，逃来三盛公的难民很多。借此闵玉清向罗马要来了修建大堂的款项，由兰广济神甫监工，于一八九三年大堂落成。

三盛公教堂定为主教座堂，一八八四年由

罗马委任比利时人德玉明 (teros) 为西南蒙古的第一任主教。同年五月十八日，德在西湾子祝圣主教归来，定三盛公为主教府。德玉明于一八八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亡故，由比利时人韩默理 (Hamen) 在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三日接任第二任主教。到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起义运动风靡全国，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韩默理命令巴拉盖、二十四顷地的外国神甫火速逃到三盛公避难。并准备了一些马匹、骆驼于八月二十九日起程，从山后逃往乌兰巴托（大库伦）。当时在三盛公聚集的外国神甫共十五人，到库伦后转乘西伯利亚火车回国。韩默理坚持留在巴拉盖和二十四顷地。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义和团起义后，安九夫人在二十四顷地捉到了韩默理，带到托城（今托县）被烧死。

一九〇一年春，义和团运动失败，外国传教士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比利时人闵玉清 (Freming) 被罗马任命为三盛公的第三任主教，在位十四年，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六日死在缸房营子。一九一五年秋，

比利时人葛崇德(Dyckan)接第四任主教。一九二一年葛崇德调任绥远教区主教，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荷兰人费达德(Fredrix)任三盛公第五任主教。以前都称西南蒙古代牧区主教，从他开始改称为宁夏教区的第一任主教。费达德于一九三〇年因年老多病，辞职休养。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选圣，比利时人石扬修(Schotte)为宁夏教区第二任主教。石上任后，首先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我区的“圣母修女会”，任命了裴德非修女为第一任圣母会修女会院长。石扬修在任时，曾亲自带领我们修道生在现三盛公完小西墙外植树造林，人们都叫“主教园子”。原来只有七八十亩大，种有杨、柳、榆等树，其中还种了不少的杏、李等果树。现红卫城关一队张多多的父亲，就是当时看园子的工人。石扬修主教对培育中国的神甫修女是比较认真积极的。他首先选送了陈宽明神甫、万斗轩神甫和郭正基神甫上辅仁大学深造。之后，又派遣魏明哲、李德雷、王睿明、张淑安等女学生到银川师范上学。这些做法对教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石经常巡视宁夏、三边、河

套三个分区的教务，积劳成疾，于一九四四年患病死在三盛公主教府。当时我是五年级的修道生，修院院长樊静安，让我给石主教油画过棺材。

石扬修主教去世正在抗日期间，宁夏教区的教务暂由比利时人圣母圣心会会长包海容代理。

一九四六年四月，罗马教廷委任比利时人王守礼（Ranmelc—Keke）为宁夏教区第三任主教。当时王是呼市公教医院院长，五月二日由穆清海主教祝圣后，随即到三盛公接任。王守礼到后，三盛公本堂和修道院共同举行庆祝主教就任的活动。修道生排演了古经故事剧“古圣若瑟”。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当时的三盛公村来说，可谓之热闹非凡的盛会，观看演出的足有千余之众。

王守礼上任后，随即召开了主教议员会议，会议决定将主教府迁往陕坝天主堂，因为当时的陕坝在河套地区是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城镇。

王守礼到陕坝后，计划在陕坝修建一所较

大的医院，地址选定陕坝天主堂南门外的树园子，并备料修盖陕坝天主堂和扩建普爱中学。王守礼在任三年作了不少计划，选送韩进恒，马仲牧等人到辅仁大学深造，还选派了一批女学生如邢建忠等到呼市公教医院学医。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

由四九年解放至五二年的三年时间里，政府对天主教的神甫修女曾作了不少的思想教育工作，但王守礼等外国主教神甫，始终抱着和共产党敌对的态度，并采取对抗的行动，尤其王守礼在五〇年派李世芳神甫到北京学习“圣母军”的组织经验。李世芳回来后，王守礼马上让李把“圣母军”组织推广到河套各教堂，成立了堂口的圣母军支部（也叫圣母慈爱祈祷会）。我记得陕坝堂是徐声远为该会的指导司铎，候允希为普中的指导司铎，三盛公樊永逸为指导司铎。我没有参加过他们开的会议。圣母军的章程上规定采取直线联系办法，专门拉拢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使之免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到五一年底，圣母军的活动可说是在河套天主教范围内盛极一时的了。天主教的

神甫修女以至于修道生，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是抵触对立、格格不入的，我自己当时也有同样的思想。到五二年政府下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对首要者绳之以法，对胁从者给以教育，对违法的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从此王守礼等外国神甫被驱逐离开了中国的国土，外国人控制了一百多年的河套天主教会，归还到中国神职人员的手中。

事情从来是复杂的，外国的主教神甫虽然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但他们控制中国教会的思想影响还留在中国，留在河套。在王守礼临走以前就安排了他的河套教区的继承人。其排列是：傅亭维、孙雪帆、李世芳、周其智、孙仲贤、刘静山、冯敬礼、徐声波八人。并留言：

“一旦为首的被捕，应按以上顺序马上接任主教职务……”。五二年以后，河套的代理主教一职都是遵照这一安排执行的。

河套第一任代理主教就是傅亭维神甫，他完全按王守礼的布置办事，一九五六年被捕，按王守礼定下的顺序孙雪帆主动宣誓就任。孙在位两年，更是忠于王守礼的嘱托，虽然于一

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了河套教区“爱国会”，政府让孙雪帆任主任，同年选派他出席了北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一届成立大会，但他终于在一九五八年犯错误被捕。

按王守礼提名的八个人只剩最后一人徐声波了。按教会接任手续，五八年春，徐声波当了代理主教。徐当代理主教，记取了前任教训，接受政府政策，同年六月召开了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改选大会，会上改河套陕坝教区，命名为巴盟教区。改河套教区爱国会，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改代理主教为教区长。会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选徐声波为巴盟教区爱国会主任，郝威为副主任，王世彬为秘书长。又选徐声波为巴盟教区教区长，郝威为副教区长，从此河套教会才真正的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

傅作义的稽查处、督察处 与国民党的缉私处

王兴亚

（一）傅作义在绥远设置的稽查处、督察处与抗日战争前的缉私处

傅作义一九三一年由天津退到绥远省后，即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为了绥远全省的治安，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全省各市县都设置了维持地方治安机构，命名为军警联合稽查处。

一、稽查处的组成：

稽查处由当地的驻军及宪兵队（所）和警察局三个单位派人组成。按地区的大小情况，下设分处。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由于是省政府的所在地，稽查处命名为省会稽查处。并在旧城、新城、车站各设分处。包头稽查处，则

在城内及车站设有分处，各旗县只设稽查处，稽查处按当地区域大小及各方面的情况，配备人员。由当地驻军、宪兵队（分所）、警察局派人参加稽查处内工作。如归绥市的省会稽查处，是由三十五军军部派一中级（团级）军官带步兵一个连参加，省警察局派一名警官（处级）带警士四十名参加，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分队长一名带宪兵二个班（计二十六名）参加。包头市稽查处比省会稽查处人员要减少三分之二。旗县的稽查处驻军派一个连长带一排士兵，县警察局派一个警官带警士十名，县宪兵分所只派宪兵二名参加。稽查处的处长，以驻军所派的军官担任，负责处内一切事务，并规定各单位半年接换一次。

二、稽查处的工作任务：

稽查处担负当地维持治安任务，其日常工作是：

1、巡查勤务：二至四人为一组，每日定时或不定时在管区内视察一周，尤其在繁华街道及公共场所要多次巡视。

2、查店勤务：在每日的下午九时至十

时，稽查当地的客栈、旅社、货栈、皮毛店，查询所有外来的客商、货商。按来客登记等依次询问。

3、查娼勤务：稽查明娼、暗娼住客的情况，查出暗娼私留住客者，扣回法办。

4、弹压：在影剧院、公共场所、会场，派出适当的兵力，八名至十六名不等，固定在这一处所，防止发生扰乱治安的事件。

5、守卫看守拘留所：派有固定人数四人至八人，武装看守在押犯人。

6、突击检查：在公共场所，及人烟稠密的街市，实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对有证明的军人或民众，令其通行，无证明者，扣回处内分别处理。

7、检查户口：多实行于夜间，白日很少。查对住户人数，并不是普遍的挨门依户的查，而是一户或数户的突击检查。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党重要人物王若飞在包头被扣，就是该稽查处，根据密探报告，在富三元巷悦来客栈扣住的。当时王若飞化名为黄敬斋，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而不知是王若飞。

稽查处工作的对象：劫盗匪、窃盗、赌博、吸毒、贩毒、政治犯、及一切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人。

稽查处有预审权，对人犯查讯，他们认为无事的释放，涉嫌及有实据的分别送军事机关（军法处）、司法机关（法院）处理、羁押人犯，按规定不得过十五日以上。

一九三七年十月，“七七事变”之后，稽查处这个机构自行解体了。

抗日时期在后套的督察处

在抗日时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傅作义在太原失守后，被派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陕坝（即现在的杭锦后旗），当时在陕坝设置军警宪督察处，直接由长官部指挥。并在五原、临河，两县设分处，任务同以前的稽查处一样，但是职权比过去的稽查处大得多。他是以长官部侦察总队为主干，仍然干宪兵工作，能直接指挥侦察总队，警察局、及当地驻军。

它的内部，亦有正式的编组，处内设处长、主任；下分二个科六个组，有科长、组

长、科员、组员等。

在工作上也比以前增加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严密缉查汉奸、日探的潜入。当时有一度各司法机关大部分羁押的都是汉奸和日探的嫌疑人犯，男女老少都有。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期，严查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成为督察处的第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在陕坝的国立绥远中学学生中，先后被秘密查扣的共产党重大嫌疑犯王恩卫等二十余人，就是陕坝长官部军警宪督察处干的事情。被扣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都受到非刑逼供，如辣椒水灌鼻孔，用猪鬃探妇女奶眼，致使两奶肿如西瓜，以及双膝跪炭渣等种种酷刑。

当时督察处、军法处、警察局、侦查处，还有省党部、三青团所扣押的共产党嫌疑犯，约占全罪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督察处的寿命，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随之寿终正寝了，但代之而起的，仍是联合稽查处。

解放战争时期的稽查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督察处撤销后，傅作义又设置军警联合稽查处。除归绥市、包头市，必需设置外，其余各县，如当地派驻有侦察队的即酌情设置，如无侦查队的县即不设。

设置稽查处的市县，以侦查队为主，侦查队队长为处长。按当地情况，由驻军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但警察局都派警察参加。

工作对象，虽然仍同以前的任务一样，但以发现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为重点。当时五原、临河、晏江、米仓、狼山、安北等后套各县，都由包头稽查处派遣便探去工作。

这个时期的稽查处，听从当地警备司令部的指挥，每日向警备司令部填报工作日报表，遇事请示警备司令部。

当时绥远省政府指令各市县对扣捕的共产党嫌疑犯，不论嫌疑大小、轻重，不得擅自处理，经过调查审讯后，必需持全案审查的详情报省，同时将人犯一并解省处理，不能擅行释放和保外听传。各单位所查扣政治嫌疑犯，送交当地警备司令部，再由警备司令部令稽查处，派侦查

队人员押送交省府青训队。

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一月平津战役后，稽查处即无形中逐渐取消。

（二）国民党设在后套的缉私处

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在后套设置了特务组织缉私处，总处设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陕坝（现在的杭锦后旗），并在五原、临河、伊盟设置了分处；又在马七渡口、乌不浪口、西山咀、碱柜，凡通往日本占领区如包头等要道、渡口，也都设上缉私所，缉私处的总负责人有马汉三、冯兰亭等。

这个缉私处，在表面上是由长官部临时指挥，但是在实际上，是中央军事调查统计局所管辖的一个特务组织，对长官部的命令阳奉阴违、半点也不听从。

缉私处的任务，名义上是缉查对往来日本占领区走私的商旅，实质上是以缉查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为第一要务，同时对当地的军政大事及军政要员的活动进行监督搜集情报，并且对汉奸、敌探也有缉查责任。对盗窃、盗匪、

贩毒、吸毒、赌博、违法犯罪等事件，也要管理和干涉。它把警察、宪兵、军事司法、行政司法的职务，都取而代之。

这个缉私处的组织，有处、分处、分所。人员配备上，处有处长、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十余名。分处有主任及工作人员四五人，分所有所长及工作人员二三名。人员算是不多，但是拿一个分所来说，出入人员至少也有十名以上。他们雇用了一些当地的流氓、地痞、散兵、游勇、无职业者等社会渣滓，为其探情报、做爪牙。这些人无恶不做，无所不为。

这个秘密特工组织缉私处，私立公堂，非刑逼供，并且擅行检查人和住宅，以及逮捕人、扣押人、传讯人、审判人。对过往的商旅，搜腰包，拆看被褥，分卸驮鞍，搜出黄金白银就没收，贵重的物品就攫取，可以说雁过拔毛，无一幸免。比当时的警察、宪兵的行动还要厉害得多。

兹将这个缉私单位所干的一些坏事，据我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伊盟缉私分处（负责人王紧）曾扣获政治嫌疑犯三名，无人证物证竟以非刑拷打逼供，用胶饯乱麻粘在身上，往下拉扯，一缕缕的血肉撕下，使三个嫌疑犯，丧命于非刑之下。经驻伊盟侦查队查明上报长官部，长官部下令缉私处查报，该处谎报：“因系走私扣押，雨夜潜逃，在追捕时击毙。”后经长官部再次追查，始终不予答复，后将伊盟缉私分处负责人王紧调回重庆了事。

驻碱柜的缉私分处，曾扣住青海的商人并带骆驼一百多峰，由包头贩卖货物返回，货物计有自行车、青白布、麻绸、药材、金银箔、冥纸等。该商贩曾由驻该地侦查分所查验放行，又被该缉私所以走私犯扣留。将人犯物资送交长官部处理。经军法处审讯后，证实不是走私，即予开释。可是在该缉私所交送时，私留青、白布五十多匹、自行车五辆及少数药材等。长官司令部查问时，该处竟报称，系看守人窃物潜逃，现在追捕中。

在五原、临河、陕坝、伊盟等地，侦察队、分所，多次查获该缉私处所雇用的爪牙，在

当地打人、盗窃、诈骗、贩毒、捣乱金融等违法乱纪的事件，都由军法处依法判处，同时令该处查复。但该处的复文则多称，“本处查无其人，或前曾录用，现已开除”等语，敷衍塞责。

缉私处与派出所的侦查队分所，经常制造摩擦，故意寻衅，双方不时发生口角、打架，互相攻击，都向长官部报告对方不法行为，缉私处则声称各当地派出所的侦查队分所，应由缉私处的分所指挥和监督。有一次在乌不浪口分所检查行人发生互殴事件，双方鸣枪射击，都有一人受伤，长官部只得命令双方撤换该地分所，将肇事人解送长官部军法处，予以判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傅作义部进占了包头、归绥等地，该缉私处也随往归绥。在同年的十月归绥市旧城，小召半道街的居民报告：“有土匪二人在深夜进入，抢去物件三十余件，并威胁二日后准备银洋二百元，如不准备，再来时就枪毙了你。”后经侦查队查明这两个土匪住在缉私处内。并查明二人在处里住的房间。在一个夜里，派人由该处

将二人扣住，搜出赃物表、栽绒马褥、棉衣、呢子衣、大氅等赃物三十余件，经审讯得知，一为阎某、一为吴某，（阎某还是绥省府委员阎伟的叔伯侄子）他俩是缉私处到归绥时才参加的，还没有发给证件。二人对抢取居民财物之事供认不讳。经呈请长官部（当时傅作义已改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批准，予以枪决。

但缉私处则伪称“该阎某二人，并非本处的工作人员，只是与本处人员认识，想在本处临时工作，还没有正式任用。本处已将该员撤职查看”等语搪塞过去。

总之，该缉私处自命不凡，系中央所派，不听当地指挥，为所欲为。缉私处工作人员飞扬跋扈，生性惨毒。雇用一帮歹徒，更是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当地居民，视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并送给他们一个绰号叫“积尸处”。

抗战时期傅作义在河套地区

举办的“绥干团”

董炎炳

一九四四年春，至一九四六年秋，我曾在“绥干团”担任过训导处考核科长，也曾在该团第十七期中受过训。因此，对“绥干团”的成立始末，略知大概。现根据记忆所及，将傅作义在河套地区举办“绥干团”的始末叙述于后，供史学研究者参考。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军事、政治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尽管在抗战中，高喊什么：“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高调，但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在地方上，军阀割据，中央与地方各行其道，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各派都注意培植个人势力，狠抓干部训练，以期培养出自己的得力干部。

傅作义原属于晋绥军系统，他具有一定的

进步爱国思想，但在当时他也懂得培养自己军政人员的重要性，所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经费、建制来自何方，他总要办起一个培训军政人员的机构。并且在训练机构中打起自己的旗号，采用自己的训练方法，并灌输自己的思想、观点。

在抗日战争中期，傅作义曾转战到晋西北，归二战区统辖。当时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给傅作义的军事干部训练机构名称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政干部学校第二分校”。傅作义则改用：“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的名称招收学员，训练干部。在训练内容方面，他也没有完全按照阎锡山所布置的办事，而是吸收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许多训练优点，并且又掺杂上自己的思想、观点，对干部进行训练。

一九三九年四月间，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在随同傅作义进入河套后，傅便马上更改这个学校的名称为：“陆军第三十五军军政干部学校”（笔者当时就是在这个学校领取毕业证书的）。在傅作义到达河套

后，由于他兼任绥远省主席，有了地方行政权，因此，训练的对象，也由单一的训练军事干部，发展成为既训练军事干部，也训练地方行政干部。为此，他又将干部训练机构的名称改为：“绥区干部训练所”。学校校长始终由傅作义兼任，而培训干部的方式、方法也始终贯穿着傅作义自己的独特方法。

一九四〇年春，五原战役大捷，傅作义名扬全国。于是，傅作义借此机会，在培训干部方面，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补充物资，扩大建制，增加经费。经蒋介石特许，傅作义统辖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可以比照司令长官部的建制，成立训练军事干部的机构；并按照省级地方训练行政干部的建制，建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机构。

一九四〇年秋，傅作义即将原已迁在宁夏省平罗县的“绥区干部训练所”调回河套，并以这个训练所为基础，在临河县的八岱，利用原屯垦队的营盘，扩大建成了“绥干团”。

“绥干团”原是个简化名称。按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批准的干部训练机构的建

制全銜名称有两个：在军事上称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军政干部训练团”；在地方行政上称为：“绥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这两个训练机构，在其他省分都是分别设立的，但傅作义把两个训练机构合并为一，统称之为“绥干团”。不过在对上请领经费，任免人员等需要国民党中央批复、备案的事项，则分别用上边批准的军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机构的名称办理，但在他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一概称为“绥干团”。这一点情况，外人是看不清楚的。

在“绥干团”内，不论军事人员和地方行政人员，一律着军服、挂军衔，完全以军人的姿态受训。如笔者当时是地方行政人员，荐任九级。及至进入“绥干团”受训时，也改着军装，佩带少校符号。团内人员安排，经费使用，训练对象遴选，课程内容安排等等，傅作义都要亲自过问，因此，人们都认为“绥干团”是傅作义独自创办的干部训练机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给的建制和经费。

现将有关“绥干团”的一些具体情况，分

别叙述如后：

一、“绥干团”的建制

“绥干团”系由军事、地方两个训练机构的人员、经费综合建制而成。团主任一人由傅作义兼任，教育长、副教育长均为一人。在正常情况下，军事干部训练与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分别进行；在形势需要时，便把二者合并起来。傅作义经常按照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绥干团”的建制，或分，或合，或扩大，或缩小，运用的非常自如。现将其建制表列于下：

			团 主 任					
			教 育 长					
地 方 行 政 部 分			副 教 育 长			军 事 部 分		
指 导 处	教 务 处	训 导 处	秘 书 室	高 教 室		军 事 训 练	政 治 部	
			经 理 室	总 务 处	医 务 室			
第 三 中 队	第 二 中 队	第 一 中 队	行 政 队	军 事 队		第 一 中 队	第 二 中 队	第 三 中 队

二、“绥干团”的团舍

“绥干团”团舍的修建，先草建于临河县的八岱，后因需要又移建于陕坝东郊。

一九四〇年在八岱建团时，是利用原来屯垦队的旧营盘，因陋就简加以修补成为团舍的，只有一座能站八百人的大礼堂和团部的办公室是属于新的建筑。因缺乏木料，修得也十分简陋。如大礼堂的修建形式是：以挖地窖的方式来代替下半截墙壁，上面再用泥土垒成。大梁是从宁夏买来的，也为数不多。建房所需的椽子，采用当地出产的芦苇、芡芎等物捆扎而成。尽管团舍简陋，但傅作义却在这里集中军事上和行政上的人力、物力，完成了整军和在河套实行新县制的干部集训。

八岱距陕坝较远（四十华里），来往甚为不便。为了集中领导，傅作义命令在陕坝东郊（现盟农研所地址），按照“绥干团”的建制和当时军事、政治的需要，新建比较定型的“绥干团”团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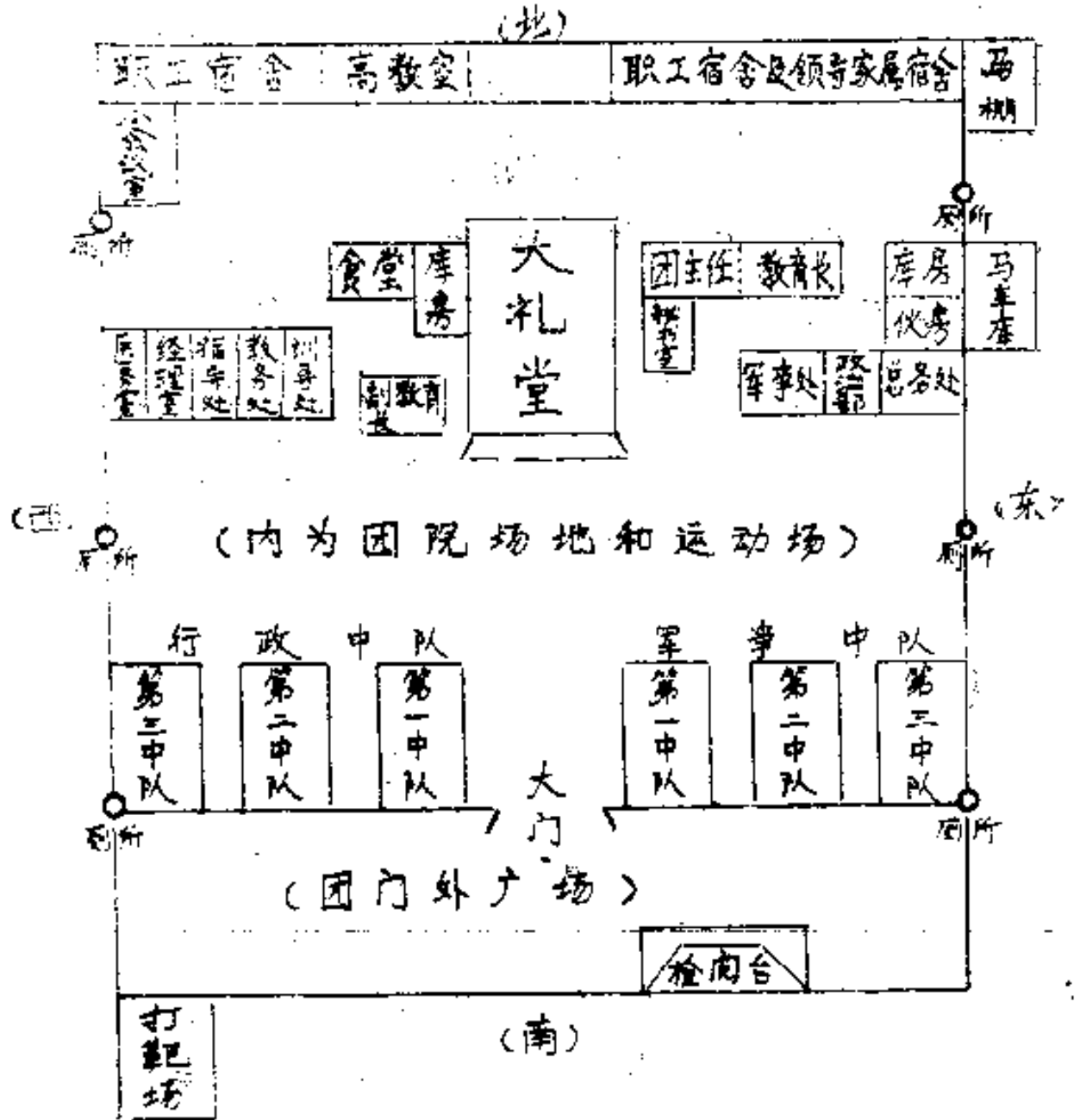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新团舍全部建成。建筑总面

积约为二万多平方米。除大礼堂是个砖门面外，其余房舍均为土木结构。当时因木料缺乏，室内的桌凳都是用泥土制成的。虽然如此，团舍的外观尚称雄壮，颇为威严。团舍门前广场相当宽阔，曾降落过中型运输飞机。院内东西两侧的六个圆型高炮台式的厕所，也表现出军事设施的样子。新团舍建成后，“绥干团”立即由八岱迁入新址。现将“绥干团”团舍形势平面草图，绘制如下：

三、“绥干团”的主要人员配备及变动情况

按国民党中央当时批给军事和行政两个训练团的编制，共为二百四十来人。其中：干部一百六十来人，勤杂人员八十来人。傅作义并未受这个编制的约束，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或增加或减少，由他机动运用。在建团之初，为了适应五原战役后的整军和在河套实行新县制的需要，便扩大了组织，在不使已招收的学生训练中断的情况下，分别召集军官和行政人员来“绥干团”参加了整训。

陕坝东郊“绥子团”团舍平面形势草图



这个阶段团内的主要人员配备情况如下：团主任由傅作义本人兼任，教育长由暂编十七师少将师长王雷震兼任，训导处长由上校康保安担任，教务处长由张世珍担任，军事处长由冯梓担任，总务处长由谢自元担任，医务室主任由牛可欲担任。政治部未设专人，在整军集训期间，由部队政工人员担任。高级教官，由高级军政领导干部担任。指导处虽有建制，未设专人；经理室附设在总务处内。当时，还请了几个苏联顾问，讲课并任军事演习指导。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团内又增设了一个警犬队。

一九四三年，“绥干团”迁到陕坝东郊新址后，因整军和在河套实行新县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为此，将团内人员，作了新的调整，主要人员和一般干部也比较固定了。在这个时期配备的主要人员有：团主任傅作义（兼），教育长李世杰，副教育长康保安，训导处长康保安（兼），教务处长张维勇，指导处长张淑良，总务处长王景泰，经理室主任谢自元，军医室主任牛可欲，军事处长刘春芳，政治部主任刁可成，高教室军事教官朱兴英，

行政教员赵傲时，秘书室主任杨耀迟。撤消了警犬队。除此以外，在军事和行政上仍各设三个队，每队设中队长一人，分队长二至三人，勤杂人员五人。

团内也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没有设置专职人员，全是由兼职人员搞工作。这是傅作义恐怕国民党派人渗入“绥干团”的防御措施。团内建有国民党总支和三青团分团筹备处。总支书记由指导处长张淑良兼任，三青团分团筹备处主任由训导处长康保安兼任。党团业务，均由指导处和训导处的工作人员兼办。

“绥干团”人员的安排，职务的分配，傅作义没有按照上边的意旨办事，采取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办法，由他自己作主安排。如指导处的设置，其任务本为指导各县训练所工作的。但因那时各县还未设立训练所，故改为办理团内生活指导，并兼办党务工作。又如：按建制训导处不分科，但实际却分成宣传和考核两个科。笔者当时上报备案的职务是指导处的编审，可是实际干的却是训导处的考核科

长。

四、“绥干团”训练的课程和思想、作风

按国民党的正式规定，“绥干团”的训练课程可分为政治、军事、业务三大类。政治课程主要有：总理遗教（以三民主义为主），总裁言行、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军事课程主要有：军事知识、基本教练、作战演习等；业务课程，则视训练对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如行政队则以政治和地方行政为主；军事队则以军事训练、作战演习为主；教育班和军事方面的通讯班，则以其本身业务为主。

由于训练的时间短，团领导很重视团内的工作作风。团里的各种活动，有的列入课程以内，有的则安排到课外时间。列入课内者，一般有精神讲话（由团领导和战区及省级领导担任）和党团活动；安排在课外的主要有：升旗讲话（由团内处级干部轮流担任）、体育活动、文艺晚会、参观、野游等等。

傅作义经常利用“绥干团”这个阵地，举办大的整军或施政措施训练，就不受上述规定

课程的约束；在训练不属于“绥干团”规定对象的代训班，也不受正规课程的限制。讲授什么课程，由傅作义决定。

“绥干团”的训练课程，除依据国民党规定的大原则外，还穿插贯彻傅作义自己的东西。傅作义在政治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高见，他只是根据“他为己用”的原则，把他在晋西北时，从边区共产党那里借鉴过来的延安作风，用自己的话归纳成为：“简单朴素，艰苦奋斗”八个字，作为团内奋斗的目标。并在作风上也提倡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苦（傅一贯穿士兵服装，并提倡干部不带家属，他本人首先不带家属）。还仿效共产党的作法，在团内开展小组会议等活动。他的这些作法，当时在重庆和兰州一带曾有过一些流言，说：“河套傅部，有赤化倾向”。

傅作义的这些思想和作风，团内教育长李世杰把它归结成为“人格教育”，并归纳、发挥成为教材，给团内干部和文化程度高的学员进行讲授。在讲解军事课程中，曾把傅作义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在战术战斗中有软打硬

顶”、“退出来，打进去”、“夜袭”、“袭击汽车”“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以及“在较大战役中的掏心战”等经验，作为学习内容。

五、“绥干团”训练的对象

按上级规定，“绥干团”训练的对象为：地方行政部分，训练县级以下科局长、乡长、雇员和小学校长、教员；军事部分：训练连级以下军官。凡合乎上列规定之人，均须列入正式训练期别，并上报备案。所需经费，全由“绥干团”开支。训练期限，一般规定为三个月。每期受训的人数，根据情况，各有不同。

但在实际执行中，傅作义并没有受规定限制。初建团时，他首先招训了一批学生队，还增设了一个警犬队。“绥干团”进入陕北后，他除了集训一批保长外，而且还培训了一批妇女，对她们进行荫麻纤维织布训练。开学时，傅作义特地着一件从西安买来的亚麻衬衫，来团讲话。这些训练，虽然都是“绥干团”举办的，但因不是规定对象，对上不备案，对下不存档，称为“绥干团”的傅廷部

分。

绥远省党、团、警和民众团体，有时也在“绥干团”举办党务班、团务班、妇女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等。这不属于“绥干团”的训练对象，只是借用“绥干团”的团舍、设施，由主管部门主办，“绥干团”予以协助。当时人称这种训练，为“绥干团”的代训部分。

傅作义凡是有关大型的整军集训和行政上的重大改革措施，需要集中训练干部时，都是使用“绥干团”这个阵地，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组成领导班子，并按不同系统，临时抽调人员，进行工作，一俟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如：一九四一年五原战役后的整军集训，一九四二年实行新县制前集中训练地方行政干部，都是在八岱“绥干团”举办的。

外人不清楚其中的底细，误以为凡是到过“绥干团”的人，都是“绥干团”的受训学员。其实这些伸延和代训部分，整军集训和行政改革等训练，都不是“绥干团”本身的事，他们不属于训练对象，因而也不是“绥干团”学员。

另外，在陕坝每遇到召开大型会议，纪念节日，阅兵仪式等项活动，也都在“绥干团”内举行。如每年的生产会议，征粮会议，“双十节”纪念活动，阅兵仪式（魏德迈来陕坝时，曾在这里举行过阅兵式）及傅作义本人发表重要讲话时，都在“绥干团”的礼堂或广场进行。因此，“绥干团”实际上已成为傅作义在河套时的军政活动中心。

六、“绥干团”的结束

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傅作义为了接收地盘，扩大势力，下令“绥干团”正在受训的学员，星夜归队，整装东进。“绥干团”的工作人员，除留下副教育长兼训导处长康保安，统率训导处和其他各处室人员十余人，整備待命东进外，其余所有人员，一律调入东进部队或派任为接收人员。

康保安利用整備待命这段时间，组织全体人员，将“绥干团”在河套训练过的学员档案进行了一次整理。总计整个参加正式受训人员约为六千人次。当时军事部分，未作交接，也

未留下档案；教育部分，参考作用不大，未作整理；着重整理了地方行政干部的档案。计“绥干团”在河套一至二十期，列入正式期别，并上报备案的地方行政干部约有二千多人。在整理中，曾仿照字典编辑笔划的顺序，将每人的简历、学历及受训成绩，列表装订成册，备领导和人事部门查阅。

一九四五年十月间，“绥干团”所有留守人员，奉令进入归绥市（呼和浩特）麻花板东营盘，从此，河套的“绥干团”遂告结束。

乌拉特中公旗世袭札萨克

政治制度概述

罗布森那木吉拉（遗作）

一、乌拉特三公旗的由来

乌拉特（乌喇特、吴喇忒）部落，原游牧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勃儿只斤（博尔济特）氏族布尔海的属民。

十七世纪初，满洲族军事首领努尔哈赤崛起于中国北方，力图强盛，建国号为金或后金。在后金天聪七年（一六三三年）皇太极在位时，布尔海的长子赖葛、孙鄂木布、幼子巴尔赛、孙图巴、曾孙色楞等，率乌拉特部由呼伦贝尔的呼博图查干出发，千里跋涉，归附后金，并向皇太极进贡驼马，以表忠诚。

自乌拉特部归附以来，曾为大清帝国的开疆辟土立下了汗马功劳。计在一六三三年至一

六四九年，十五年的时间内，先后攻打了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内蒙古的苏尼特部和高丽等处，博得了满清统治者的信赖和嘉许。

清顺治五年，叙从征功，封额日和台吉（称号）图巴为镇国公；图们达尔罕台吉（称号）鄂木布之子谔班为镇国公；伊勒敦和硕骑（称号）色楞之子巴克巴海为辅国公；并赐牧于河套北部阴山、狼山、乌拉山之间。划乌拉特部为中、西、东三旗，隶属于乌兰察布盟。

三公中，以谔班掌前旗，称为西公旗；图巴掌东旗，称为东公旗；巴克巴海掌中旗，称为中公旗。各授札萨克（意为执政者，即旗长）职位，世袭罔替。由于乌拉特三旗首领同为公爵，故被人称为乌拉特三公旗。

乌拉特三公旗疆域的划分，大致是：西公旗驻牧于黄河北岸，位于乌拉山前后；中公旗驻牧于狼山山后，位于西公旗的西北方；东公旗驻牧于阴山山后，位于西公旗的东北方。三旗界限凭山川为界，并未特设明显标志，故三旗之人，插花居住，称为一家。

二、乌拉特中公旗的区域概况

当年，乌拉特部分成三公旗时，只分了人畜财产，并没有严格地划分牧场与旗界。因而，乌拉特中公旗的牧场地界，一直是分散占有。也就是说，牧民们随着统治者占有领土的方式，分散占有牧场和水井。尽管乌拉特中公旗驻牧于阴山之北，但有一部分苏木（相当于区）的牧户，长期居住在位于西公旗境内的乌拉山南北两麓，经营着农牧业生产。

从一九一三年到解放前夕，中公旗的旗界大致如下：西与阿拉善旗接壤，西北以昆德斯查干山为界，西南与杭锦旗毗连，南及东南与西公旗、东公旗交叉杂居，部分地区又和达拉特旗相连，东和东北同达尔罕贝勒旗为邻，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尔喀部相望。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统计，乌拉特中公旗总面积约为三万五千平方公里。

分布在边境的牧民，他们居住的十分偏僻分散，户与户相距在五十至八十里之间，致使传达政令，征收赋税非常不便。过去，中蒙两

国牧民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亲如一家。及至一九四〇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乌拉特草原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日寇在国境线上加强了巡逻警戒，并大肆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这样以来，使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西部荒无人烟的阿尔戈壁至东部索仑山，约四百公里长的边境地带。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无水草场，有着辽阔的原野和险峻山岭，野兽成群，盘羊、石羊，不可胜数。能骑善射的蒙古猎人，乘马奔驰，竞相狩猎，你追我赶，热闹非常。

在旗境内部，山脉纵横，河流密布，滋养着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农牧业生产事业。除著名的奎素、哈布特盖、毕冀格图、伊很公、敖伦主都、齐老鄂博等较大山梁外，还有乌力雅斯太山、好日高山、两狼山、巴尔虎山、乌拉山、索仑山等六大山区。在山区内，土地肥沃，牧草茂盛，驼羊牛马，满山遍野，极目远望，犹如繁星。

登山远眺，条条河流，点缀着草原，装璜

着牧区，它们若玉带，若长蛇，蜿蜒盘绕在乌拉特大草原上，有的涓涓细流，有的洋洋大水，象甘露一样灌溉滋润着草场与良田。其中较为著名的河流有：乌力吉图河、纳林河、阿巴日嘎河、吉尔嘎朗图河、莫林河、塔玛嘎图河、哈尔嘎纳图河、博热河、巴彦河、博日和河、东西乌盖河、川井河、海流图河、杜嘎尔河、阿尔其河、达日盖河、阿拉腾河、乌加河、罕乌拉河、呼鲁斯太河、前达门河、奔巴查干河等。

所有这些青山绿水，世世代代哺育着乌拉特中公旗的广大牧民，使之人口繁衍，牧畜旺盛。为了报答大自然的恩赐，中公旗的人民，历来都以祭水、祭鄂博（也作敖包，系用石、土、柴草，堆成的堆子，上插旗杆，充当路标或界标。后来在鄂博内放有佛像、佛经，每年向之祈祷，谓之祭鄂博）等形式，来回敬大自然，用以纪念哺育之情。祭水、祭鄂博原本为庆贺丰收的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活动，及至清代，蒙古的封建主和喇嘛们使这一健康活动，带上了迷信色彩。

乌拉特中公旗，在每年的五月间，举行一次祭鄂博盛会，分别祭祀分布在全旗的索伦海尔汗鄂博（海尔汗是对山的尊称），巴拉乌拉鄂博、呼秋鄂博、朝格温都尔鄂博、巴音希博鄂博、昆都仑鄂博、阿尔其萨日奔海尔罕鄂博、毛纳苏布日王鄂博、宝格图鄂博、米格吉木鄂博、阿拉坦浩日高鄂博、阿布拉图鄂博、嘎拉丹鄂博等十三个鄂博。在祭祀鄂博时，中公旗衙门拨出一定的经费，派出官员和差使，分别去鄂博所在地，向十三个鄂博隆重致祭。与此同时，还要举行赛马、摔跤等传统的民族盛会（亦称“鄂博乃日”），用以祝福生活的吉祥如意，牧业的兴旺发达。

在人口方面，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统计，乌拉特中公旗只有人口一千三百户，九千多人。全旗有寺庙三十四座，喇嘛总数为二千一百多人。

在清代末叶，满清政府对蒙古王公采取了诱逼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段，迫使蒙旗开放“蒙荒”。而蒙古王公也为了上取清廷之恩宠，下获地利以自肥，与清廷勾结，在蒙旗内

大量开垦荒地，致使“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丰美的草场，遭到了严重破坏。

及至进入民国后，从袁世凯、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上的土皇帝们，除全部继承并扩大了清廷在蒙古地区实行的“丈垦”政策，移入了大批农业人口开荒种地外，并且还不断地在被开垦的蒙旗地区内，增设县治，迫使牧民步步后退，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地盘。

乌拉特中公旗的牧民，自一九三〇年左右，即被迫迁移到查斯台、希热、哈太山一带居住。过了不久，约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希纳嘎山、鸣鹤图、都格尔河一带，也拥入大批农民垦荒耕地，从事农业生产，逼得广大牧民不得不退到缺乏水源的荒漠草原，养畜放牧。

三、旗政权的组织及其组成人员

旗，满语为“和硕”，意为部落。努尔哈赤兴起后，分满洲为八部，以八种旗帜标领，称为八旗，由此，旗遂为部落的代称。旗，原为军事组织。满清征服蒙古各部后，将蒙古各

部也编为旗。初侧重于军事方面，使之起军队的作用，后来在军事的意义外，又逐渐形成了内蒙古一级的行政单位。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但没有消减蒙旗地区的封建统治和剥削制度，反过来，却又完全保留和继承了清王朝在蒙古地区所采取的全部政策。一九一二年八月九日，北洋军阀政府宣布了照顾蒙旗的制度。制度中规定：“保留蒙古各地王公原有的统治权”。“内外蒙古各部之汗、王公、台吉官爵称号，仍应按原来世袭制度继承，保留。其在本旗享有的一切特权”。“保留蒙古各地呼图克图（活佛的称号）、喇嘛的封号”等等。正由于这种原因，乌拉特中公旗一直维系着王公制度，由辅国公巴克巴海的子孙，世袭本旗札萨克。

（一）、旗衙门的成员及其制度

旗设札萨克，管理全旗事务，为一旗之长。实际上，札萨克就是旗内的领主，清时规定札萨克的职权有二，即：遇有战争向朝廷提供军事实力；根据有关规定，处理旗内行政事

务，即处理旗内行政、司法、征税和任免管旗章京以下的官员与事务。旗衙门是札萨克处理政务的机构，它是控制全旗旗务的最高行政机关。

(1)、衙门的官员及其分工

中公旗札萨克为世袭制。末代札萨克诺颜（长官）为林沁僧格，是巴克巴海的十四代子孙。他于一九三三年，其父巴布道尔吉晋升为乌兰察布盟长时，接任了札萨克。

札萨克下，设有协理台吉（图斯拉各其）协理是札萨克诺颜的助手，由清廷理藩院任命并管理。中公旗有大、小协理两名，大协理家中有专门令牌，作为任职凭证。另外，还设有预备协理或称记名协理两名。大、小协理协助札萨克处理旗里的常务工作。在大、小协理因年迈、疾病、死亡时，由预备协理接续担任协理职务。

凡担任协理职务者，必须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在军政、宗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才行。原来限定，只有台吉（贵族）出身，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有担任协理职务的

资格。后来限资问题逐渐废弛，限制不严，年轻人也可以担任协理职务。凡担任协理职务的人，原则上为终身制，中途不得提出离职退休的要求。

全旗设管旗章京一人，除协助札萨克治理全旗外，主要负责处理民政事务。管旗章京下，还设有梅林章京、扎兰章京各两人，将全旗各苏木分为两翼，由他们分别管辖。上述五章京，是管理旗务的五大要员，俗称为“掌印五官”。此外，旗内设有管家，管家下设达木勒（管财务的）两人，分管全旗的财务工作，负责催收粮饷、肉食、纳贡牲畜和骑乘等一切有关经济上的事务。

管旗章京、梅林章京、扎兰章京的任命，不限出身，台吉、庶民均可出任，并且都不属于终身制，可以告假退休。在他们离职的时候，由旗札萨克授与他们名誉职称。如出身于台吉、喇嘛的管旗章京，可授为达尔罕陶恩或达尔罕安奔的名誉职称；对非台吉出身的管旗章京，可授为宰桑（即汉语宰相的音转，系旗内管事者之称）的名誉职称。凡札萨克恩赐授予

过名誉职称的人员，都有资格参与旗内一般性的政治活动。

(2)、贵族台吉册子

台吉原为汉语“太子”之音转。成吉思汗的后裔子孙，均称为台吉，是蒙古民族中的贵族。及至清代，台吉又被列为爵位，由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清廷效忠程度的好坏，以及在征战中功劳的大小，分别授与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镇国公、辅国公）和台吉、塔布囊（驸马）。台吉、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爵位。从此，台吉又成了朝廷的封爵。

在乌拉特中公旗，各等台吉不仅都有，而且在四等台吉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浩合即破落台吉。这些台吉分布在全旗的各个角落里，每个苏木都有台吉的存在。对台吉出身的贵族、旗衙门每三年要进行一次统计，并造册入档，传世保存。

全旗的台吉虽多，但一、二等台吉很少，据统计表明，中公旗仅有两户一、二等台吉。按规定，一、二等台吉年满十八岁，即可登记

入册。有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三、四等台吉，则必须年满十八岁，才能登记入册。凡台吉入册，不必向旗札萨克叩拜谢恩，只献一块哈达就行了。

一、二等台吉可以直接出任梅林章京，三、四等台吉，也可以出任扎兰章京。至于苏木章京的职务，除其他苏木可由庶人任章京外，按规定乌布尔科尔沁苏木章京必须由台吉担任。各等台吉，按照等级领有相应的阿勒巴图（随丁、奴隶）。一等台吉十六人，二等台吉十二人，三等台吉八人，四等台吉六人。台吉的地位很尊贵，在全旗集会或重大事情上，他们都居于权威性的支配地位。根据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袭的原则，旗札萨克如果后继无人，一、二等台吉还可以继承札萨克职位，执掌旗政。

凡非台吉出身的各级章京，则必须从侍卫开始逐步晋升。每晋升一级，必须向札萨克叩拜谢恩，同时，还要献哈达一块，银洋三元。若无银洋可出者，则须改献靠背栽绒毯一块。

按照台吉家法，台吉之间不准婚配，违反

者，必须绳之以法。凡台吉出身的人死后，其妻室所生孩子，不列入台吉册子，更不能视为台吉的后裔子孙。台吉有顶戴无花翎。如在征战中，因功获得花翎者，称为“有翎台吉”。台吉犯罪也要惩治，但因顾全贵族阶级的体面和威望，惩罚时，必须轻于庶民。

(3)、授予封号及顶戴制度

旗札萨克对协理、管旗章京等“掌印五官”有授予封号，赏赐顶戴之权。在每年的全旗春季集会上，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则向属下授予封号，赏赐顶戴。受赏赐的官员们，则向札萨克叩拜谢恩，表示感谢。至于封号的内容，顶戴的品级，则是根据每个人功劳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赏予。例如，在四十年代时，赏给协理明安满达的封号为“恭谨的巴特尔”；赏给大协理巴图毕力格的封号为“忠诚聪慧的典范”；赏给齐布格扎布安奔的封号为“谦逊的明智者”等等。

清代制度，各级官员都按官衔品级戴顶子、翎子，以区别其身分地位。蒙古地区也不例外。现将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及其下各级官

员的顶戴、花翎叙述如下：

札萨克诺颜，戴映红镀金珊瑚顶子，不透明的花翎。

协理，戴红珊瑚顶子；暗花翎；

管旗章京，戴不透明的顶子；

梅林章京，戴亮蓝顶子；暗花翎；

扎兰章京，戴亮蓝顶子；暗花翎；

一、二等台吉，戴红顶子；

三等台吉，戴亮蔚蓝顶子；

四等台吉，戴暗翠蓝顶子；

破落台吉，原来戴暗黑顶子，后来取消了顶戴；

章京，戴亮白顶子，不透明的花翎；

昆都（骁骑校），戴暗白顶子，暗花翎；

一等侍卫，头戴亮白顶子，单眼花翎。

二、三等侍卫，戴亮白顶子；

哈本，戴有花翎的暗蓝顶子。

上述顶戴、花翎、补服、纓帽及哈达等物，全部由个人出钱购置。

（4）、衙门的笔贴式和差使

笔贴式亦作笔且齐，是在衙门内搞文书

工作人员的称呼。中公旗衙门内设有笔贴式若干人，其任务是搞文书的撰拟、缮写、分发、归档等工作。笔贴式中分正式笔贴式，学习笔贴式两种，他们都是旗衙门从各苏木有文化的青年中挑选来当差的。笔贴式来衙门当差为轮班制，一年分为三班，每班当差一个月，住在衙门内办公。据统计，在解放前三十五年中，中公旗衙门当过差的笔贴式，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后来都被委派为苏木章京和昆都（骁骑校）。

衙门设笔贴式长（即秘书长、也称文书长），例由爵位较高的，年纪大的内行人充任，负责管理文书工作。过去中公旗梅林章京策布格扎布、根登朝克，都曾兼任过笔贴式长。

旗衙门的官员们，对笔贴式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笔贴式在应值月班之前，由于疾病等原因不能上班时，要向衙门请假；如衙门不准假时，必须亲来衙门当面告假。擅自不来上班者，要受处分；

(2)、各类公文，必须用毛头纸（麻纸）来书写，折叠要整齐美观；

(3)、要熟练地掌握使用毛笔的技巧，所有公文均须使用毛笔书写。在书写公文中，要求不准涂抹，不准掉字，字迹要整齐清楚，字牙和词尾（蒙文字母笔划名称）要协调匀称；

(4)、笔贴式在值班期间，不付薪水，伙食费由衙门税收中支付；

(5)、上报或发往旗外的公文，要盖札萨克大印，发至旗内的公文，则盖衙门官印；

(6)、衙门中的文书档案多种多样，有朝廷诏书、上报文稿、往来函件、衙门通知、历史资料、台吉册子、文件概略，等等。要分别存放，不许混杂；

(7)、值班笔贴式在结束工作交班时，必须做好交接工作，交接人都要签名为证。以后无论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都要追究记录员、审核人、校对人、签发人的责任；

(8)、每当月班结束时，笔贴式要按衙门规定，将各类文书，分类整理装订起来，归

档保存；

(9)、笔贴式在值班期间，要轮流守夜，看管印房；

(10)、值班笔贴式要无条件的服从分配，做好工作；

(11)、旗内发生的事件，由笔贴式长出面解决，但必须依据衙门值班官员的意志去办。

在衙门里除笔贴式办理文书外，还有一部分差使供役使。他们的任务是传递公文，通知消息，出席集会，押送罪犯等工作。这些差使都是由各苏木抽调来的青年人充当。他们在执行任务中，无论路途远近，风雨阴晴，都要准时到达，不能稍有停留。差使持有信票，腰间系着包有公文的黄色腰巾，所到之处除了达尔罕户、军队和庙宇外，都无条件地给他们提供乌拉（骑乘）和食宿。其中具有达尔罕（被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身份的差使可以出远门，出席集会，审讯、鞭笞、押送罪犯。

凡当差使的人，做不好工作时，要受经济处罚，严重失职的，还要被判刑。另外，在衙

门中的差使，还有挤奶、伙夫、砍柴夫、背水夫和司钥等。

(5)、衙门的集会

乌拉特中公旗的衙门集会，每年举行三次。这就是在阴历正月间举行春季集会一次。这次集会实际上是正月启用官印的一次集会。集会时，梅林、扎兰、各苏木章京等显贵人物们。都自备膳食、饮料出席集会。集会的主要内容有：官员团拜，祝贺新年，任命苏木官员，授封号、赏顶戴。此外，还要讨论、处理全旗的重大事情。集会在正月中旬选一吉日举行，会期根据情况而定。到秋天还要举行秋季集会。其内容是：向各苏木下达征赋任务，处理诉讼案件，部署当前工作。冬季集会在阴历十月召开，这次集会主要是将秋季集会后征收的牲畜和钱财，上交给旗衙门。

(6)、衙门的搬迁流动

自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军阀混战和土匪捣乱以及大片开荒种地，广大牧民失去牧场等多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导致了乌拉特中公旗衙门多次流动搬迁。在满清时代，旗

衙门曾由昆独伦花（今包钢附近）迁到杜古尔河畔。一九二〇年时，这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有不少的官员染病死去，致使旗衙门不得不从杜古尔河迁到了毕其格图川（今温更公社所在地的西北部）。后来，由于土匪四起，到处抢劫，破坏烧杀，民不聊生。这样以来，旗衙门也无法固定地址，只好审时度势，到处流动，曾先后在巴尔虎山、杭盖诺其、宝尔罕图、乌力吉图、川井、乌兰敖包各地之间，流动办公。

四、苏木政权的组织及其组成人员

苏木原本是基本的军事单位，是旗的直轄机构。随着战争的停顿和消失，苏木逐渐成为军事性的政治组织。

乌拉特中公旗共设六个苏木（苏木也称作“箭”或“佐”，其地位相当于区），作为旗以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掌管地方行政。每苏木设苏木章京（又称箭长或佐领）。苏木章京受札萨克之命，办理审查丁册，征收税物，排除纠纷，征发人夫等事情。在苏木章京之下，设

昆都（又称骁骑校）一人，协助苏木章京处理事务；达木勒（领催）一人，管理苏木财务；门子（宝什户，属于奴隶性质）若干人，搞通讯及一切杂役工作。有的苏木还设有管事一人。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开始，苏木设秘书一人，协助苏木章京办理军政事务。

苏木之下，每十户设一“什长”，作为基层单位负责人。后来将十户改为五十户，每五十户设一铁宾长（蒙语五十为“铁宾”）。现将中公旗六个苏木的铁宾数目列下：

米日苏木有五个铁宾。即：阿鲁铁宾、乌布尔铁宾、阿巴嘎铁宾、浩黑楚勒铁宾、米日铁宾、东铁宾；

东苏木有三个铁宾。即：西铁宾、中铁宾、东铁宾；

玛拉托尔苏木有三个铁宾。即：阿鲁铁宾、乌布尔铁宾、东达铁宾；

乌布尔科尔沁苏木有三个铁宾。即：东铁宾、西铁宾、毛纳铁宾；

高勒苏木有三个铁宾。即：扎鲁特铁宾、巴尔虎铁宾、浩日格铁宾；

阿鲁科尔沁苏木有三个铁宾。即：伊和铁宾、巴嘎铁宾、呼鲁铁宾。

以上共计二十个铁宾。其中扎鲁特铁宾系札萨克诺颜仓的属民，只为诺颜放牧、纳贡、服役，旗衙门不准向他们征税、派差使；苏木门子不能向他们索乘乌拉，旗和苏木更不能从这里征用人夫。

中公旗幅员辽阔，苏木建制少，再加上苏木之间原来没有明确界限，固定牧场，以致苏木之间的多数牧民，穿插居住，十分偏僻分散。后来虽然明确划分了界限和牧场，但由于习惯等原因，插花居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以来，给苏木行使工作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每到征收赋税季节，门子们骑在马上，四出奔走，只跑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还是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例如：高勒苏木的多数户家分散居住在川井地界的边境线一带，而少数人却住在南边的乌拉山前。东苏木的多数牧户居住在位于北部国境线的索伦山、巴音宝日戈壁一带，而一部分户家却住进了乌拉山里。

各苏木的办公地点也是流动性的，跟着苏木章京到处搬家，办公室都是蒙古包和帐篷。苏木每三年举行一次集会。在集会上，苏木章京委派昆都（骁骑校），侍卫和五十户长（铁宾长），处理民事诉讼和检查部署工作。

五、由清末至解放前，历任旗、苏木领导的主要人员

现将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近四十年间的乌拉特中公旗历任札萨克诺颜、协理、“掌印五官”、苏木章京的主要人员，分期列后：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从清末至民国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况是：

札萨克：（1）巴布道尔吉，（2）林沁僧格；

协理：（1）宝音巴达尔胡，（2）那顺敖其尔；

管旗章京：（1）那顺希德，（2）那顺贺希格，（3）策楞，（4）呼珩，（5）拉西；

梅林章京：右章京是：（1）孟和那顺、
诺尔布巴拉，左章京是：（1）策布格扎布，
（2）那仁；

扎兰章京：右章京是：（1）爱力布，
（2）达瓦敖斯尔，左章京是：明安满达；

管事：右管事是：（1）色令格，（2）
阿毕札；左管事是：都古尔；

苏木章京：阿鲁科尔沁苏木章京：（1）
旅静，（2）特古斯，（3）伦奔；

乌布尔科尔沁苏木章京：（1）孟和那
顺，（2）诺尔布巴拉，（3）朋斯格（4）
朝鲁，（5）仁亲敖斯尔，（6）尼庆嘎；

高勒苏木章京：（1）佟杜格，（2）查
格德尔，（3）巴拉珠尔，（4）官布扎布；

东苏木章京：（1）沙格德尔，（2）散
巴拉布，（3）敖斯尔；

玛拉托尔苏木章京：（1）额毕，（2）
巴图扎布，（3）敖德布；

米日苏木章京：（1）查干，（2）桑吉
扎布，诺敏朝克。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伪统治时期

的情况是：

札萨克：林沁僧格；

协理：（1）宝音巴达拉呼，（2）巴图毕力格，明安满达；

管旗章京：（1）敖巴希，（2）策布格扎布，（3）宝日呼，（4）那仁；

梅林章京：右章京是：巴特尔，左章京是：（1）那仁，（2）根敦朝克；

扎兰章京：右章京是：达瓦敖斯尔，左章京是：明安满达；

管事：右管事：（1）伦奔，（2）孟和，左管事：（1）张楚布，（2）宝音贺希格；

苏木章京：阿鲁科尔沁苏木章京：（1）伦奔，（2）达日扎，（3）查格德尔色楞；

乌布尔科尔沁苏木章京：（1）尼庆嘎，（2）孟和扎布，（3）色楞道尔吉；

高勒苏木章京：（1）官布扎布，（2）满头，（3）哈瓦；

东苏木章京：（1）陶格套呼，（2）阿尔毕吉呼，（3）拉舍楞；

玛拉托尔苏木章京：（1）诺尔德格，
（2）喀木扎布；

米日苏木章京：（1）苏和，（2）朝克
图芒来。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统治至
解放前时期的情况是：

札萨克：林沁僧格；

协理：（1）巴图毕力格，（2）明安满
达；

管旗章京：（1）那仁，（2）巴特尔；

梅林章京：右章京是：（1）巴特尔，
（2）敖特根，左章京是：根敦朝克；

扎兰章京：右章京是：（1）达瓦敖斯
尔，（2）查格德尔色楞，左章京是：那木吉
拉苏荣；

管事、右管事是：（1）伦奔，（2）孟
和，左管事是：（1）张楚布，（2）宝音贺
希格；

苏木章京：阿鲁科尔沁苏木章京：（1）
查格德尔色楞，（2）满泰；

乌布尔科尔沁苏木章京：（1）色楞道尔

吉，松迪扎布；

高勒苏木章京：（1）哈瓦，（2）巴特尔；

东苏木章京：（1）拉舍楞，（2）陶格套呼（兼），（3）旦苏荣扎布；

玛拉托尔苏木章京：（1）塔木扎布，（2）图布吉尔格拉；

米日苏木章京：（1）巴拉道尔吉，（2）宝音巴达尔呼。

六、诺颜仓的情况

诺颜意为长官或首长，诺颜仓是旗衙门以外单独的封建王公贵族的官邸群和仓库。主要由札萨克诺颜的家族、亲属、近侍、差役、警卫和饲养管理诺颜仓牲畜的扎鲁特铁宾（奴隶）组成。诺颜的家属、亲戚的生活费用，全部由诺颜仓负担和照料。

诺颜仓备有警卫部队三个排，平时负责警卫并兼办杂差，战时则出征应战。另外，还有公务人员和差役，直接为诺颜及其家族服务。计有：管家、秘书、随侍、伙伕等。

扎鲁特铁宾，既是诺颜仓的家奴，又是诺颜仓的牧奴（阿勒巴图），他们是被直接压榨的主要对象。这种封建式的劳役承担制度，早在元朝以前就有了，他们担负着放牧牲畜，拾取燃料、运水、挤奶、剪羊毛等各项劳动。

关于诺颜仓的财产，据一九四三年不完全统计，共有骆驼三群（分为空胎群和怀胎群），约有六百峰。驼群内有畜群长一人，牧驼员若干人。马五群（分为大、小群），约一千五百匹。马群内有畜群长二人，牧马员若干人。绵羊六群（分为产羔群和空胎群），约两千五百余只。羊群内有畜群长一人，牧羊员若干人。

除上述畜群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诺颜仓每年还要从各苏木征收肉畜。其中，每苏木分摊肉牛六头，羊只不计其数。诺颜仓除了每日宰杀羯羊一只，供诺颜家属食用外，并且还规定牧民给诺颜送上供佛用的活畜应用。因巴布道尔吉信佛戒杀生，如牧民送羊来诺颜仓时，倘若被巴布道尔吉看见则视为罪孽，除将活畜留下外，再罚牧民羯羊一只，以消罪衍。

由于羊只大量聚集，大批羯羊老化，一九四八年，大协理巴图毕力格视察诺颜仓畜群时，发现成年绵羯羊过多，回来对林沁僧格禀告道：“阁下：在您的畜群中，绵羯羊为数相当可观。依我看，今后可否减少向苏木征收肉食羊？”林沁僧格听后慷慨地回答说：“可以”。巴图毕力格回到衙门后，立即向各苏木发出减少征收肉食羊的通知。从此，诺颜仓征用的肉食羊，每年控制在—百只以内。如超出一百只时，就从官仓羊群中宰杀，总算减轻牧民的一些负担。

七、衙门的法律及惩罚

清朝以来，蒙旗统治者以“理藩则例”为依据，加上王公私法，习惯法等法律来统治蒙古人民。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政府的法律，民国制定的法律，在乌拉特中公旗境内同时并存，并行不悖。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又给蒙旗地区的法律增加了新的内容。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法律的多次变化，中公旗衙门的法律形式和内容大

致如下：

(1)、一般形式的惩罚

①、路遇札萨克诺颜，应立即下马施礼请安；倘若敷衍搪塞或无动于衷者，应受到鞭笞惩罚，有职衔者，则削爵夺职。但日本人、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受此限。

②、除享有特权者外，凡骑马横过衙门和诺颜仓大门者，应受鞭打或其它形式的惩罚。

③、酒后惹事生非者，或鞭打，或罚款，酌情处理。

④、骂人、打人被告发者，根据情节轻重，应受到鞭笞或罚牲畜，对侵犯长上者，罚九九牲畜（即八十一只）。

⑤、擅自役使、丢失或致死诺颜仓牲畜者，在受到鞭打的同时，还要罚赔偿牲畜；

⑥、官员和差役，无故不来当差，或者惹事生非者，应受到鞭打、罚牲畜，直至撤消职务；

⑦、凡对持有信票的差使要求换乘骑乘，不予提供方便者，罚牲畜；

⑧、对违令的差事，应受到鞭打，情节严

重者，予以开除；

⑨、对淫乱放荡的人，罚重款（此条徒有其名，未认真执行）。

⑩、盗窃他人财物者，或鞭打，或罚牲畜；

（2）、重刑惩罚及其刑具

对作案多次，屡教不改，和伤人、杀人、抢劫、偷盗、放毒、放火、爆炸等重大罪犯，要受到如下重刑惩处：

①、鞭笞。少则二十大鞭，多则一百大鞭。但下鞭轻重有别，视情节而定；

②、游乡（苏木）。给犯人脖带铁链，轻者十八环，重者二十七环，派人牵引游乡；

③、备鞍。令犯人身背马鞍，驮上一口袋沙子；

④、罚跪。令犯人手带铐，跪在石子上，腿弯处还压杠子（这是从以前装皮口袋的刑法演变来的。此法原为整剥牛皮，并有意在皮板上多留些肉，然后将判处死刑犯人装进口袋，放置于烈日之下。牛皮受到日晒，里面不仅闷臭异常，同时又逐渐收缩，最后犯人痛苦死

去)；

⑤、绞刑。用湿麻绳绞犯人，及至昏厥，用冷水泼面令醒，醒后再绞；

⑥、插签。在犯人指甲中插竹签，使之痛苦异常；

⑦、上拶。绑紧犯人双腿，在腿弯中夹木棍或石头；

⑧、掌巴。用特制的巴掌打嘴巴，根据情节十五至一百下。凡受过这种刑法的人，多数留有精神后遗症；

⑨、抽背。用皮鞭抽打，每次二十至一百下；

⑩、流放。将犯人长期流放于边远处，特别重犯，全家随同流放；

⑪、监禁。凡被判处终身劳役或有期徒刑者，均予以监禁；

⑫、死刑。凡判处死刑的罪犯，予以枪毙。

凡重大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必须禀报札萨克同意和批准。对已经判刑的犯人，由旗衙门召集牧民参加，进行公开处理。在处理中，由轮

班官员主持，其他官员也出席参加，并由有威望的差使，执行行刑任务。

上述惩罚，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行使法律手段的一部分，往往成为个人强横专断的工具，尤其在日伪统治时期，更加变成了套在人民头上的枷锁了。

八、赋税制度

中公旗在每年秋季举行一次的集会上，由衙门官员向各苏木布置征收赋税任务。赋税的项目很多，有牲畜、金钱和实物。其中除衙门、诺颜仓、军队、驿站、寺院所需用的物品外，而且还包括向朝廷进贡需要的大量实物和金钱。并且限期由苏木章京、铁宾长负责按期如数交给旗衙门管家。

在纳贡（税）者中，由于参加战征，运送物资等有功牧民，或在衙门、苏木当差的公职人员，均可免于征税。此外，已离职的达尔哈惕（被免除赋税者）、陶音（贵族出身喇嘛的尊号）、宰桑等，也免于征税。

九、旗军队的建立

从清代开始建立起来的乌拉特中公旗的苏木机构，是清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层军事、行政组织。

清时规定：蒙旗内凡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除喇嘛、庙丁及随丁外，一律编入丁册服兵役。每一百五十名箭丁编为一个苏木（箭），其中五十名服现役为常备兵，一百名从事生产为预备兵。札萨克是全旗的军事指挥官，平时须定期召集军队接受朝廷派人的检阅，战时则动员全旗军队参加战争。凡编入丁册的箭丁、武器、盔甲、马匹，均须自备。后来，由于战争的停息，箭丁制度逐渐废弛。

二十世纪初，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少数喀尔喀部蒙古王公和活佛，在沙俄的策动下，密谋内外蒙合并，企图建立蒙古帝国。当时他们在内外蒙各旗招兵买马，用沙俄提供的大量武器，成立并装备了“独立军”，随即发动了一九一四年的“癸丑叛

乱”。

一九一四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参战，无暇东顾，加之在俄国国内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沙皇俄国的垮台，从此，沙俄企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妄想破灭了，而哲布尊丹巴梦想做全蒙古帝国大汗（皇帝）的愿望，也随之破灭了。

树倒猢猻散。一些从内蒙古各旗被招去外蒙充当独立军的人，也四处逃窜，大部分返回了内蒙。这部分用沙俄来福枪装备起来的人成为土匪，回国后，重新打起早已垮台的“独立军”的旗号在内蒙各地为非作歹。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流窜于乌拉特中公旗的“独立军”，有喀喇沁（旗名）的贺希格图、嘎海索伦、巴雅尔公三股土匪。这些匪徒所经之处，奸污妇女，抢掠财产，民无宁日，牧民们称他们为“独立”土匪。

这些“独立”土匪，在当时为什么如此猖狂，不可一世呢？其主要原因是：

（1）在蒙旗箭丁制度没落之后，并没有

建立起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武装部队，以致不能抵抗使用洋枪的“独立”土匪；

(2) 执政的民国政府，当时正处在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阶段，他们根本不考虑蒙古地区的不安宁局面，更谈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来平息匪患。

(3) 身为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的巴布道尔吉公爷，秉性残暴，而又懦弱无能。他对旗民自高自大，神圣不可侵犯；对土匪则胆小如鼠，畏敌如虎，面对凶悍的“独立”土匪，始终采取逃避态度。

为躲避匪患，巴布道尔吉公爷不顾全旗百姓的死活，收拾细软，携带家眷，逃到巴尔虎山的险山峻岭中躲藏了起来。一九一八年，土匪头子喀喇沁贺希格图等人，在抢劫中，恰好流窜到巴布道尔吉隐藏的深山中，无意中发现了公爷的安乐窝，土匪们喜出望外。

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土匪们除大肆抢掠外，又威逼巴布道尔吉要武器、金银、乘马和食物。并威胁说“如不交出东西，定要他的狗头”。巴布道尔吉当时吓破了胆，除一一答应

照办外，并跪下哀求土匪宽限。喀喇沁贺希格图对他说：“交物日期可以放宽推后。但你要明白，你虽为中公旗诺颜，可是你的脑袋握在我们的手中，想要你的脑袋易如反掌”。说罢，带上土匪扬长而去。

其实，土匪只有七个人。巴布道尔吉明明亲眼看见过土匪的人数，当时他是有能力对付这几个匪徒的。但由于他胆小怕事，不仅没有胆量来对付敌人，反而把自己手里的两杆步枪藏在山洞里。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眼巴巴地让土匪逼近，最后，终于被逮住。巴布道尔吉未来袭位的宝贝儿子林沁僧格，当时他乖乖地给匪徒遛马、斟茶、斟酒，为土匪服劳役，一点儿也没有公子、少爷的架子了。

一九一九年春节来临，在大年初一的早晨，正当公爷巴布道尔吉一家老少跪拜祭天之际，突然听见了马蹄声，随之几个土匪已踏进了山间小道。见此情况，公爷一家不顾一切，连滚带爬地翻过山巅，总算是虎口逃生，拣了性命。土匪们因未捉住巴布道尔吉，恨恨不已，咬牙切齿地说：“后会有期”。便走掉

了。当夜，吓得魂不附体的巴布道尔吉，携带全家，连夜逃跑。关于公爷的去向，不仅留下的家人不托底，就连旗衙门也不知道，后经衙门派人查访，才知巴布道尔吉全家已跑到阿拉腾浩日部的乌兰哈达山沟里，在那里搭帐房居住。

管旗章京那顺贺希格听说公爷巴布道尔吉无法对付土匪，反而采取怯弱的逃跑主义的作法后，感到非常愤慨。他挺身而出，到奔巴图庙和山岱庙与东博格多（活佛中位最高者）喇嘛，以及曾任过中公旗管旗章京的色楞嘎，共同商议筹建军队，以御土匪。当时他们议定几条办法，并立即着手进行。

他们在中公旗西部使用大枪狩猎的神枪手中，精选出二十名猎手，作为建军的基本队伍。另外，又新招富有战斗经验的新兵二人，由这二十二个人，组成乌拉特中公旗的一支队伍。关于武器，除使用猎枪外，那顺贺希格又献出自己新买来的两支别旦式（旧式独弹步枪）步枪，各带子弹一百发。并将二十二名士兵分为两个班，选派了两个班长，每班各持一支别旦式步枪，带子弹一百发。军马、粮、

肉、茶等军需品，暂由山岱、奔巴图庙供应。在服装标志方面，士兵们头扎红头巾，身穿镶有黑边的红布坎肩儿。在胸前背后缝有碗口大小的白色圆布，白布上绣着“乌拉特中公旗军”的黑字。

乌拉特中公旗军的建军仪式，是在奔巴图庙上举行的。当时，祭军旗，鸣礼炮，搞得十分隆重。那些头扎红头巾，身穿蒙古长袍，上套黑边白地黑字红坎肩儿的全副武装的骑兵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环绕奔巴图庙外围转了三圈，大造声势。

在建军仪式上，牧民们送来了丰盛的食品，慰问了乌拉特草原上的第一支军队，并用美好的语言祝福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顺贺希格也在宴会上发表了“保卫旗土家乡是每个旗民的神圣义务”的重要讲话，用以激励士兵的斗志，并向他们分别斟酒，愿他们勇敢杀敌，保卫家乡。旗军建立后，他们没有辜负草原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与“独立”土匪交战过多次，打死、打伤、俘虏了多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猖狂一时

的“独立”土匪们，从此，威风扫地，望风而逃，跑入套内去了。

旗军剿匪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乌拉特草原，身经数战的旗军，不仅军事素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且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已由二十二~~人~~增加到二十五~~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

当旗军大灭“独立”土匪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传到巴布道尔吉弟弟闲散王公朱日米德道尔吉耳内时，他非常感动，对管旗章京那顺贺希格在建军工作中，作出的成就，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与那顺贺希格商议决定，进一步扩大旗军编制和增置武器。

购置新武器由朱日米德道尔吉亲自负责。他慷慨解囊，除拿出自己所有的黄金外，又从全旗富户中预借资金，作为购买武器的本钱。及至款数凑齐后，他准备了驼队、帐房和干粮，携带五名神枪手，改换成商人打扮，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从中公旗出发，直奔喀尔喀的大库伦（今乌兰巴托）。

朱日米德道尔吉一行在抵达大库伦后，隐

瞒了自己是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胞弟的身份，完全以商人购买香牛皮靴子的名义，与居住在大库伦的俄国商人进行了广泛接触。等到他们之间有了一定的交情后，才开始了购置武器的商谈。最后，终于谈妥了购置五十支别旦式猎枪，七千二百发子弹和一批香牛皮靴子的交易。

在返旗时，他们为了路途安全计，又花钱从俄国商人手中购买了两支手枪，用以自卫。在武器到手后，他们昼宿夜行，不敢停留，终于在五月中旬平安回来。

回旗后，朱日米德道尔吉与那顺贺希格商量决定：以枪数招新兵，又招收了旗军五十名，委派队长、司务长各一名；因旗军驻防在西乌盖口子，以地理位置给这支旗军命名为“乌拉特中公旗西队”。与此同时，表彰了第一次组建起来手持大枪的二十名旗军，对他们剿匪杀敌、保卫家乡中所做的贡献，予以表扬，然后，宣布解甲归牧，与家人团聚，并说明将来如不发生紧急情况，就不再召集他们服役。但朱日米德道尔吉诺颜认为：旗军在数量

和质量方面还不够强大，仍有加强和充实的必要。于是与衙门官员协商，决定第二次再去外蒙古，购买武器弹药。

这一次去大库伦，朱日米德道尔吉改变了上次的商人打扮，在穿戴方面，完全依照蒙古上层贵族的服饰装束，并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中公旗札萨克诺颜同胞兄弟的名义，与外蒙上层社会官员广泛接触。在交往中，通过外蒙古官员购到了（7、62）来福步枪一百支，每支带子弹三百发；手枪五支，每支带子弹二百发。在武器弹药到手后，朱日米德道尔吉一行，于十月末返回旗里。

在朱日米德道尔吉胜利返旗后，又召集衙门的文武官员商议，第二次着手整顿与扩大旗军的建制。这一次，征招新兵一百人，分为两个队。根据原来乌拉特中公旗西队的队名，分别命名为乌拉特中公旗中队和东队。每队配备来福枪三十六支，别旦式枪十六支，手枪两支，每支枪各带子弹一百发。

在旗军不断地强大和发展下，以前被迫参加到“独立”土匪中的中公旗的土生土长的

青年，达瓦敖斯尔、敖特根宝日、陶格来、苏德宝、朝鲁等人，便产生了脱离土匪，归附旗军的念头。在他们的带动下，从前附匪的中公旗牧民，都携带全副武装，纷纷赶来投奔乌拉特中公旗旗军。

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精明能干的乌拉特中公旗的小伙子敖特根宝日的事迹。敖特根宝日原来在绰号叫嘎海索伦的“独立”土匪头目手下干了多年，并赢得了嘎海索伦的绝对信任。

当敖特根宝日决心脱离匪部，投奔旗军之时，他暗打主意，用杀死嘎海索伦的实际行动，作为投奔旗军的见面礼。为此，他表面镇静，一切举止都和平时一样，极力为匪徒效劳。有一天，他佯装给嘎海索伦擦拭手枪，乘他不备，从身后端起手枪，朝嘎海索伦头上开了一枪，结果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

在中公旗旗军里，由于象敖特根宝日等这样富有大小战斗经验，熟悉和掌握“独立”土匪情况的人，大量来归，因而，比较容易地消灭了乌拉特草原上不可一世的“独立”土匪。

旗军的武器、弹药、战马也得到了不断补充，战术上也有了提高。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三年末，在日伪统治时期，乌兰察布盟将中公旗保安队改编为边境警察，隶属于日本侵略者的管辖之下，在一个时期内，由于旗内无兵，草原内受到匪徒的不断滋扰，威胁着牧民的生活、生产，当时，在牧主的主持下把各苏木牧民组织起来，成立户家军，从南端的乌拉山，到中部阴山南北的整个乌拉特草原，都组织起了阿力奔（阿力奔蒙语为十、十户为一个班）。如：额德那木斯来，宝音贺希格，策布喀扎布，宝尼亚，色丹巴，都组织了阿拉奔。

同时为了保护包头、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商人的安全，也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旗衙门组织了一个“卫戍西北、保护商人团”，负责这项事务。当时，委派特木勒为团长，下设五个连，派仓独仑（后为韩葆）、余秃子、宝尼亚、色旦巴、那木斯来等五人为连长。

一九四四年，伪蒙疆政府头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将乌兰察布盟伪警察部队改编为蒙古

师，委派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为师长。各旗也建立了蒙古团，中公旗任命雄诺为蒙古团团团长，巴图毕力格、巴图为副团长。直至当年八月，国民党第三十二战区进攻并俘虏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全家老幼，带到陕坝关押起来后，从此，乌拉特中公旗旗军就名存实亡了。

日寇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乌兰察布盟将日伪时期的蒙古师团建制改编为保安司令部，委派雄诺为乌拉特中公旗保安部队少将司令官，巴图毕力格为上校参谋长，道布杰为中校副官，斯仁巴图为参谋部中校副官，达瓦桑布、扎勒风嘎、齐那尔巴图、敖其尔巴图、胡尔查毕力格、敖特根、乌日更格等青年，分别充任上尉副官。司令部下设两个团，六个连，韩霖、朝鲁任团长，塔斯色日古楞、芒黑图斯尔吉楞、宝音贺希格、僧格、乌兰朝鲁、刘陶等任连长，直到解放。

乌拉特中公旗的封建统治制度，从清代到民国，直至解放前夕，延续了三百多年，没有多大的变化。及至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和

平解放后，乌拉特中公旗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从此，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并将旧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党的领导下，乌拉特中公旗人民政府筹备工作组，在奔巴乌兰敖包举行了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全旗那达慕大会，用以庆贺乌拉特中公旗的解放。会场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它招唤着解放后的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会上，宣布了以图布信同志为首的中共乌拉特中旗领导小组的成立，然后，又宣布了成立乌拉特中公旗人民政府，任命明安满达为旗长的决定。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昔日的奴隶翻了身，当了真正的主人，踏上了建设新乌拉特草原的革命征途。一九五一年，旗人民政府迁往海流图。一九五二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将乌拉特中公旗和乌拉特东公旗合并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

庆祝两旗合并大会，八月间在海流图镇召开。当时乌拉特中公旗和东公旗的各族人民，老幼毕至，少长咸集，举行隆重的庆祝，祝福两旗政权合一，在革命的征途上，继续阔步前进。

乌拉特中公旗的札萨克诺

颜——林沁僧格

吉林太 罗布森那木吉拉 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胜道翻译

林沁僧格原为乌拉特中公旗的札萨克诺颜（诺颜即长官）。在日伪时期，曾担任过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盟长及伪蒙古军第六师师长等职务。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九年，他掌管盟、旗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大权近十七年。一九四九年九月绥远省和平解放后，他被任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直至一九五二年逝世。

我们本着研究乌拉特历史，以便对丰富祖国历史遗产作出点滴贡献的愿望，根据知情者提供的资料 and 我们的所见所闻，现将有关林沁僧格的一些生平事迹，作了初步整理，希望更多了解林沁僧格情况的同志予以充实、补充。

一、林沁偪格的家世和出身

满清入关，是在取得蒙古贵族的大力配合下进行的。举凡重大战役，莫不有蒙古士兵为之效劳卖命。从而，蒙古各部首领们深得清廷的信赖和嘉许，取得了王公的爵位，并博得了“从龙佐命，与国休戚”和“佐命殊勋，世袭罔替”等祖祖辈辈统治蒙古人民的特权和领地。

乌拉特（乌喇特）部，原游牧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奉清世祖圣谕，命乌拉特部由呼伦贝尔来阴山脚下，黄河北岸为清廷开辟疆土。是年秋天，秋高马肥，乌拉特部在图巴、谔班、巴克巴海叔侄三人的统率下，由呼伦贝尔的呼布图乃门查干起程，沿阴山脚黄河边行至哈达门、海流图、哈日巴海、哈纳图、哈布经拉、莫仁、模格拆木、本布查干高勒等处，几经奋战，终于赶跑了原住在这一带，尚未臣服于清王朝的蒙古艾毕日米德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功勋。

为了奖励图巴叔侄三人的功劳，清朝皇帝

分别封图巴、谔班均为土希叶公（镇国公），封巴克巴海为土斯拉呼公（辅国公），并将这块地盘划分为中、西、东三旗，令叔侄三人各领一旗，作为牧地。由于这三个旗的首领均为“公爵”，故被人称为乌拉特三公旗。

被分封为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的是叔侄三人中的巴克巴海（辅国公），他是乌拉特中公旗的创始之祖。其牧地在阴山南北辽阔的地域内。由于巴克巴海叔侄之间向未明确划分过旗界，因而，在过去三公旗之间界限观念十分淡薄，往往这旗可以在那旗立敖包，那旗可以在这旗建庙宇。这种情况在其他蒙旗实属少见。

林沁僧格是巴克巴海的十三代后裔子孙。林沁僧格的父亲巴布道尔吉老王爷，（按三公旗不应称王，但世俗习惯呼为王爷，由来已久，积习难改，现从俗称）是乌拉特中公旗的札萨克诺颜。他生有三子，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沿袭封建宗法立子以长的惯例，对林沁僧格自幼就进行精心培养。他从外地请来一名满蒙兼通的教师，作为林沁僧格的启蒙老师，尽心竭力地教他学文化长知识。林沁僧格十八岁的

时候，按照规定，又把林沁僧格的名字记入台吉（蒙古贵族的称号）档子，被人称为大爷诺颜。

从此，林沁僧格进入了成人的行列，经常跟随其父巴布道尔吉外出办事、游历，学习了外界不少新鲜事物，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此时，他俨然以继承父位的姿态出现于人前，以致被旗民们称为“王公之首”。

一九三三年，在林沁僧格年满三十五岁的时候，其父巴布道尔吉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由于父职高升，林沁僧格才得以继承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的职位。但巴布道尔吉虽名为副盟长，但仍住在家中办公，旗内重要事务，仍然掌握在老王爷手里。林沁僧格名为一旗之长，当时只能在其父身旁负责处理一些日常琐碎事务，奔走于畜群之间。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乌兰察布盟。这时，经过巴布道尔吉精心培育和锻炼的林沁僧格已出人头地，不同凡响。被人称为林王的林沁僧格，已在远近各蒙旗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致使得国内外一些野心家、阴谋

家，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拢、利用林沁僧格，以达到霸占、掠夺乌拉特草原的罪恶目的。

二、投降日本

一九三七年夏天，锡林郭勒盟盟长、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企图依靠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实现内蒙古独立的美梦，曾派阿巴嘎旗昭日格图王爷和德王部队司令相诺东日布带了八十名家丁乘四辆卡车来乌兰察布盟，说服盟长巴布道尔吉一同去张家口迎接日本人。当时，巴布道尔吉一方面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另一方面，想让其子出头露面，以扩大影响，并取得德王的欢心。于是，决定让林沁僧格代替他去迎接日本侵略者。

林沁僧格在接受父命之后，出动了大小汽车两辆，携带随从十余人，先到乌兰察布盟拜见了盟长云登楚克，与他商定好去张北迎接日本人的事宜，连夜乘车赶回嘎日呼热，向其父作了汇报，安定了巴布道尔吉的心，又乘车来到达尔罕贝勒旗王府，然后与该旗王爷希日布道尔吉改乘飞机去张家口迎接了日本人。

同年秋天，日本特务亚麻木道（日语发音）前来乌拉特中公旗，住在杭盖诺其。接着在呼鲁斯太、哈能、巴音宝日、昂根特格等地开始建立特务机构（特别衙门）。当时，乌拉特中公旗共有六个苏木（苏木相当于区），其中：准苏米、米日苏木、高勒苏木、乌布日科尔沁苏木等四个沦陷区，虽归林沁僧格执政的乌拉特中公旗傀儡政府管辖，但林沁僧格有职无权，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大坂手中。另外哈那图庙以西的阿鲁科尔沁、马拉图尔两个苏木由巴特尔等人建立的布克替办事处，仍归国民党管辖。这样，整个乌拉特中公旗便被分割成两部分。

由于上述情况，居住在乌拉特中公旗的蒙汉各族人民的生活，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佳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交界处（即两不管的地方）的群众，处境更为恶劣，奸淫抢掠，打骂烧杀，不断发生。而在日寇占领区内的广大牧民，一度曾被日寇和国民党部队封锁贸易，致使穿衣、吃饭都无法解决，只能以碗奶片肉充饥度日。

随后，日本特务源源而来。这些魔鬼们专

横跋扈，鱼肉人民。如身披行脚僧外衣的科尔沁蒙人仁沁，人称“衣司格迭勒图”（意即毡服。因仁沁刚来时身穿红布吊面的薄毡服故得此称）。他骑一头黑驴初来杭盖诺其时，冒充日本特务的伙伕，后来日特亚麻木道调离工作，他便掌握了建立在斯日崩朝海的特务机构，并称自己为什么“仁沁先生”。这个仁沁不但带兵，而且兼办驿站工作，搞通信联系。他经常任意奴役牧民，奸淫妇女，胡作非为，无法无天。

这时，驻在巴音宝日、特面哈沙图、扎格等地的特务也很猖獗。他们吸收地痞流氓为他们刺探中蒙情报，明目张胆地抢劫群众财产，肆无忌惮地奸淫年轻妇女，尤其可恨的是，他们草菅人命，以杀人为乐事。

一九四一年秋，驻在呼鲁斯太的日本特务头子古岛收留了一群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跑来的马，放牧于呼鲁斯太。不久，这群马又顺风跑回去了，让乌吉力图庙的马倌德力格尔巴图和加勒二人看见，因没有报告，就被扣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罪名，被抓去严刑拷打，并扣押了牧民艾敏吉尔嘎拉，追问丢马之事。幸亏

那顺贺希格部队的孟肯班长备下厚礼，再三央求，才将这三人的保释出来，拣了三条活命。还有中公旗牧民乌日金、东公旗牧民温都尔宾巴等人，都是被特务们活活打死的。解放后，原乌拉特中公旗日伪警察队长宝音贺希格曾交待说：“杭盖诺其特务机关在日伪统治时期，前前后后共杀害了四十四条人命”。

对于特务们的罪恶行径，中公旗政府不仅不敢过问，反而每年向牧民征收大批牲畜、粮草养活他们。这更助长了特务们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

由于林沁僧格在追随日本帝国主义、趋附德王、李守信这方面比较出色，因而颇为他们重用和信赖。于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他先后兼任过百灵庙蒙政会监委委员、伪内蒙古联合会参议员、伪乌兰察布盟总务厅厅长、教育署长。后来又提升为伪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盟长，伪蒙古军第六师师长等要职。执掌乌兰察布盟属下七个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贝勒旗、茂明安旗、希热图夏华〈召河〉、乌拉特东公旗、中公旗、西公旗）的军政大权。

三、国民党军队对林沁僧格的两次大袭击

林沁僧格投降日本后，曾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其中最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袭击是一九三八年发生的。这年秋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余太，正在向西进军之际，这时一千多名国民党杂牌军在团长乔二安的指挥下，进入乌拉特东公旗。他们打散了该旗协理米沁呼的军队，烧毁了米沁呼的房屋，命令米沁呼给带路到乌拉特中公旗抗击日军。

行至乌布浪口子两军相遇，当即展开了战斗。在战斗中，日本兵用坦克、飞机、大炮向国民党军队猛烈开火。可是乔二安这团杂牌军，害民则有余，抗敌却不行。由于装备不好，武器又差，再加上士气低沉，在日寇强大攻势下，这团人马和随同他们来参战的乌拉特西公旗敖特根（三喇嘛）的军队正要溃退，幸有马鸿逵的几个团赶来支援，他们才得以安全撤退。

在这次战斗中，使很多无辜的牧民、妇女儿童惨遭杀害，尸体狼籍，血肉模糊，令人目不忍睹。战斗结束，日寇反而占领了乌布浪口子

和乌镇等贸易重地。从此，给当地的蒙汉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从战场上侥幸撤退的国民党杂牌军乔二安部翻过了敖包沟、召素沟，分别打退了林沁僧格所属的一个中队和德王派来保护林沁僧格的特格希那木尔部队的拦截，深入到宝尔汗图以北，打死了乌拉特中公旗卫队的策波格和正在念经驱魔消灾的喇嘛嘎日宝，纵兵抢劫了座落在宝尔汗图沟的王府。他们抢走乌拉特中公旗历代王爷遗留下来的金银、珠宝、衣物、绸缎、玉器、陶器、地毯、鞍具、古玩、书画等大量名贵财产，又放了一把大火，把王府烧得干干净净。烧了蒙古包五十六顶（内有王府蒙古包二十多顶），及历代的历史资料、档案、经卷及其他一切名贵物品。

乌拉特中公旗驻守杭盖诺其的精锐部队二百人（该队有二百枝步枪。一百枝系以前国民党给的三八式步枪；另一百枝是日本人给的七九步枪）闻讯赶来，与乔二安部队激战了一昼夜，击退了乔二安部，保护了杭盖诺其特务机关。

乔二安部在撤退途中，又大肆抢劫烧杀，使广大人民群众深深陷入一场浩劫之中。他打死中公旗部队的米龙班长，放火烧了本巴套海庙、德德其勒庙、阿日依波勒庙。在烧本巴套海庙时，把中公旗赠给班禅额尔德尼喇嘛的黄缎子高级蒙古包及全套用具烧为灰烬。沿途他们将阿达格萨拉、都日图沙巴格、巴音乃高勒一带牧民的牲畜、财产抢劫一空，顺便还赶走了哈太庙的一千余匹黑花马。

乔二安部满载而归，尝到了抢掠的甜头。因此，他们把抢劫牧民作为家常便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轮番进入乌拉特中公旗牧区境内，在毕其格图滩、温更、海流图、阿日嘎查、呼日木图、赛音呼都格及昆都仑一带抢光了牧民尼玛、希日布、宝音德力格尔、道尔吉、达木林、古石朝日吉、那楚克、赛音脑木图的二千七百多匹马。

第二次袭击是在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深夜开始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伪乌兰察布盟警察部队改编为伪蒙军，林沁僧格兼任蒙古军第六师

师长，乌盟所属各旗扎萨克也都被任命为团长。在乌拉特中公旗，林沁僧格之子雄诺被任命为团长，协理巴图毕力格和巴图二人被任命为副团长。

林沁僧格父子同时升官，这是一件大喜事，为了纪念这次高升，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初，林沁僧格在距百灵庙以南二十华里处建造了一座敖包。这座敖包是由十三个石堆组成的，取名为“朝克图敖包”，（意为威武雄壮）。敖包落成后，立即举行大祭，并召开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参加这次盛会不但有乌兰察布盟所属七个旗的军政首领，还从各旗选调了摔跤手和快马参加比赛。

大会期间，林沁僧格用飞机从多伦诺尔请来了活佛喇嘛，为敖包念经。并选定吉日举行祭祀大典，首先将十三只秀斯（羊背子）摆上祭坛，然后向敖包献哈达、鲜奶、美酒以祭祀天地。接着，林沁僧格率伪乌盟公署和各旗头目向敖包焚香膜拜。祈祷神佛保佑其多福多寿、吉祥如意。

在隆重的祭祀敖包大典结束之后，立即开

展了盛况空前的那达慕活动。除进行了赛马、摔跤、射箭等各项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外，并大摆筵席，载歌载舞地热闹了七天。

会后，林沁僧格、雄诺父子二人于农历七月二十日兴高彩烈地回到了乌拉特中公旗王府。当时，有一个绰号叫“哈日叶满德勒图”（意即穿黑山羊皮袄）的国民党特务，从给王爷种菜的老李那里打听到了林沁僧格父子俩回来的消息，一面向傅作义报告，另一方面给种菜的老李下达了烧掉林沁僧格侍卫的军火库命令。这时，林沁僧格父子还兴味盎然，沉浸在欢乐之中，二十三日下午六时许，旗府军火库突然起火，经过抢救后，查明烧毁两挺机枪、三支七六二步枪，子弹一万三千多发。二十四日深夜，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派遣暂四军骑四师李绥明等三个骑兵团，分别袭击了盘踞在杭盖诺其、斯日崩朝海、川井、乌力吉图等四个中心点的日本特务机构和伪蒙军，并放火烧了林沁僧格的十几间瓦房。

在国民党部队捣毁斯日崩朝海日本特务机构时，那个“衣司格迭勒图”，即穿毡（呢）

服的特务头子“仁沁先生”，也舍去了毡服，赤身逃跑。给他作毡子的牧民巴拉登却日格、吉勒格、苏和及被他霸占的妇女塔木扎被打伤，赛恩吉雅、巴吉格、杨吉玛、巩尼希等人被打死。在袭击川井时，驻在川井的伪蒙军排长那顺贺希格、班长塔扎布和一名皮匠也被打死，其余的伪蒙军全部逃散。

在这次袭击中，还抓走乌拉特中公旗协理明安满达和参领兼合作社副主任根登朝格、乌力吉图分销店主任巴图那生，抢走了旗绒毛厂的一千多件毛布服和许多毛毯，旗合作社为日本顾问保管的一支手枪、衣物及乌力吉图分销店的三万斤驼毛、两万斤羊毛和价值伪蒙币三万多元的货物。

二十四日凌晨，国民党连长吕满三率领全连人马，由国民党特务二驼羔（大号叫玉贵）作向导，袭击了座落在乌力吉图、宝日呼哨的王府。当时林沁僧格与其父巴布道尔吉和众亲属均已逃出。在逃跑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截住。三十余人全被俘获。林沁僧格等被俘后，分乘三辆牛车，由国民党部队押送陕坝。

在押送途中走了三天，当快抵达乌盖口子时，才遇见国民党派遣来接他们的官员。他们是：乌拉特中公旗西参领达瓦敖斯尔和驿使朝格乌力吉。到第五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林沁僧格一行才到了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即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地陕坝镇。

第二天，巴布道尔吉，林沁僧格见到了傅作义。傅作义责令林沁僧格由乌拉特中公旗给傅作义军队供应军马及肉食，林沁僧格不敢不遵，当即满口应允。几天后，傅作义释放了明安满达，根登朝格等人，唯将林沁僧格全家软禁在陕坝。

林沁僧格一家被俘后，德王、李守信立即调集了呼和浩特、杜尔伯特（四子王旗）、希热夏毕（召河）等地的伪蒙军和行政人员，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向川井挺进。但此时国民党部队早已撤走，伪蒙军考虑到追赶无益，便留在川井驻了一个冬春。他们敲诈勒索附近的牧民，刁难留守在川井的伪公务人员。又使人民蒙受灾难。

自从林沁僧格被抓走以后，旗政由巴图毕

力格、明安满达主持。他们俩分别代理乌拉特中公旗傀儡政府的札萨克职务，管辖治理日占区的东边四个苏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四、软禁、监视和拉拢

(一) 林沁僧格全家被软禁在东升庙。

被傅作义留在陕坝的林沁僧格切望早日得到自由。他曾以居住在陕坝不服水土为借口（实际上他怕日机轰炸），多次请求回到乌拉特中公旗家乡居住。对此，傅作义没有完全答应他的要求，只同意送他到国民党管辖区的东升庙去住，实际上仍被软禁起来。

不久，傅作义便把林沁僧格全家送往东升庙。为了防止林沁僧格再次投靠日本人以及和其他人发生联系，便以保护其安全为理由，派出一连队伍和几名特务，携带一部电台驻守在查干布尔嘎斯和乌兰布尔嘎斯沟口，严密搜查来往行人，不准林沁僧格全家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每遇到形势紧张时，就将林沁僧格一家送往蛮会居住。同时又借口林沁僧格有叛投日寇

的阴谋，收缴了巴布道尔吉、林沁僧格等人和他们警卫人员的枪枝，交给了效忠于国民党的达瓦敖斯尔保管。

（二）防备林沁僧格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内蒙古的一部分爱国进步蒙古族人士，陆续奔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寻求革命真理。当时，国民党为了防止林沁僧格逃往蒙古，采取了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他的看管。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夏，才同意林沁僧格迁往山后的乌兰陶勒盖庙居住。从表面看来好象放松了对林沁僧格的看管，实际上他们在保护林沁僧格安全的名义下，增加了军队和特务，并在当地蒙古族中吸收国民党特务协助监视。

（三）拉拢、羁縻、官复原职。

日本投降第二年，为了利用林沁僧格，国民党对林沁僧格一家的态度，由监视、软禁一变而为拉拢、羁縻。恢复了巴布道尔吉乌兰察布盟盟长，林沁僧格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的职务，又任命雄诺为乌拉特中公旗保安部队少将

司令，巴图毕力格为旗保安部队上校参谋长，道布杰为旗保安部队中校副官长，韩葆齐鲁为旗保安部队上校团长，一九四六年旗衙门设在腾哈拉嘎的巴音农村时，又派波黑敖其尔（贺守贤）为乌拉特中公旗国民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特务佟文、陈某也长期住在乌拉特中公旗旗府，就近监视林沁僧格的举止行动。

一九四八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巴图毕力格、雄诺二人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巴图毕力格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这年春季林沁僧格之父老王爷巴布道尔吉寿终正寝。林沁僧格竭尽子职，大办丧事，极尽其奢侈、糜费之能事。他曾向各苏木征收二千多只羊，五百多头犏牛（包括诺颜仓的牲畜），卖到包头，所得款项，用作建筑乌力吉图庙，并在庙中为其父巴布道尔吉遗体建立陵塔的费用，此外，还下令全旗人民为其父志哀百日。在志哀期间，规定老百姓之间不准问好请安，不准剃头理发，不准婚嫁和欢庆往来。

五、参与德王筹建伪蒙古自治政府

日本投降后，德王又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蒋介石电令他“忍辱负重，着想将来”。德王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从张家口到北平。八月底乘飞机到重庆，他在面见蒋介石时，曾请求国民党政府准许内蒙古实行高度民族自治。蒋介石答复说：“现在不是提此事的时候，你马上返回北平。在北平要避免与人接触，暂时隐居起来。”并答应每月给德穆楚克栋鲁普生活费法币五十万元。

一九四八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以前，德王从北平乘飞机逃到南京，然后又转乘飞机准备去青海省会西宁。当行至兰州，他忽然改变了西行的主意，决定在兰州逗留一个时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由兰州来到阿拉善旗王府定远营（巴彦浩特），与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合作，接收了从东蒙逃出来的苏和巴特尔的骑兵第一旅作为主力，准备在定远营建立伪蒙古自治政府。

据道布杰（林沁僧格的女婿）回忆：一九

四八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包围北平，林沁僧格的儿子雄诺正在北平医治胃病。对于儿子的安全，林沁僧格感到坐立不安。同时包头、乌拉特西公旗部分地区已解放，林沁僧格产生了对自己身家性命的担忧。于是，他决定到阿拉善旗去躲避。十二月间，林沁僧格以去岗本（青海塔尔寺）拜佛为名，携带妻子亲眷三十多人，骑骆驼进入阿拉善旗乌兰布和大沙漠。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林沁僧格一行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受到了达理札雅王爷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这时美国特务达格瓦敖斯尔也来到定远营，他是受德王指使来筹建伪蒙古自治政府的，不久雄诺与德王一同来到了定远营。

雄诺这时已经加入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达格瓦敖斯尔秘密策划建立的反动组织“美蒙青年友好联盟”，并且又恋上了达格瓦敖斯尔的女儿巴德玛，俩人形影不离，十分火热。

林沁僧格自到定远营后，积极地参与了德王策划的成立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并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一九四九年五月中

旬，他带其三子帕拉沁札布随同德王去广州，请求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当时阎锡山任伪行政院长，开始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后，并没有死心，又继续活动，最后，终于得到了默许，并发给经费银元一万块，长短枪二百五十枝。达到目的后，林沁僧格与德穆楚克栋鲁普于五月二十日左右回到了阿拉善旗定远营。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德王等人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了“蒙古代表大会”，雄诺、道布吉也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原计划十天的会议，由于形势紧张只开了五天。会上宣布成立了伪蒙古自治政府，并选举产生了政府的领导人员。伪政府是由十二人组成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当选为政府主席，达理札雅当选为政府副主席，林沁僧格被任命为教育署长，雄诺被任命为保安委员会委员。

在林沁僧格去广州时，雄诺与达格瓦敖斯尔之女巴德玛也一同去银川。他们在银川市饭店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贺客盈门，热闹非凡。

几个月后，林沁僧格把从旗里带到定远营的金银钱钞已花光，无可奈何，只好向阿拉善旗协理罗巴图孟柯借钱使用。罗巴图孟柯以商人黄胖子的名义借给银元一千五百块，每百元月息六元。为了偿还这笔借款，林沁僧格又从乌拉特中公旗所属的阿鲁科尔沁苏木和玛拉图尔苏木征集骆驼三十峰，变卖后还清了借款。解放后他怕翻身牧民和他算帐，一九五〇年回到中公旗后，主动从他的马群里拿出三十匹马子，以一匹马抵一峰骆驼还给了牧民。

在伪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就要垮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宁夏解放了；九月十九日绥远省也宣布和平解放。这时，伪蒙古自治政府已经土崩瓦解，有的人逃进了沙漠戈壁，有的人飞往台湾，有的人就地起义参加革命，德王依然坚持反动立场，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午后，他到阿拉善旗王府向达理札雅及其母亲辞行，随即骑骆驼先到图克木庙，然后去阿拉善旗拐子湖（现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住了一个时期，最后，投奔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其部队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

九月初，林沁僧格也从定远营悄悄地搬了出来，到达日巴盖哈日陶勒盖搭起帐篷居住。九月中旬，雄诺打算乘汽车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汽车行至图克木庙以东的沙丘时。车总轴折断，无法行动，遂弃车乘驼到其父所居住的地方，劝林沁僧格和他一同投奔蒙古。对于此事，林沁僧格严加拒绝。他说：“从我们祖辈起居住在乌拉特中公旗这块地方已经十四代了。它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别处我是不去了。”对于父亲的话，雄诺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过来却说：“我宁死在蒙古，也不死在汉人手下！”就这样，一九四九年九月末，雄诺扔下其老父林沁僧格，携带妻子巴德玛，伙同德王手下的阿拉坦敖其尔、昭日格图王、罗布森淖尔布等二十四人来到中蒙边界哈日额日格时，蒙古边防军用汽车接走了雄诺等十二人，其余的十二人则被蒙古边防军驱赶回来。

六、和平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

林沁僧格尽管在定远营积极参与了伪蒙古自治政府的筹建活动，并担任了要职，但他内心里对中国共产党终于要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形势是清楚的。为此，他在阿拉善旗时，就打发旗协理巴图毕力格回中公旗主持旗政，并再三叮嘱巴图毕力格说：“这里的事情我负责。你把咱旗的工作大胆地抓起来。根据当前的形势，你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去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出了问题我负责。”

根据林沁僧格的指示，巴图毕力格马上派人和驻在四子王旗的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将联系情况随时向林沁僧格作了报告。

当时，中共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毕力格巴特尔、萨木腾、辛玉等同志亲自给乌拉特三公旗的当权者林沁僧格、巴图毕力格、陶德吉尔嘎拉、宝音吉尔嘎拉、额日和道尔吉、松布阿尔巴图等人写信，请他们去乌兰花共同商议乌拉特三公旗和平起义的问题。当时，除乌拉特

西公旗协理松布尔巴图外，其他旗的主要封建上层人物均不敢去。林沁僧格、巴图毕力格二人也不敢贸然前去，只派了本旗参领那木吉勒苏仁、文书陶格陶呼二人为代表前往乌兰花参加了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巴图毕力格再次收到毕力格巴特尔、萨木腾两位同志的来信。他当即带领连长孟格特色日吉楞到巴勒乌拉山头，背着德王秘密会见了林沁僧格，并与林沁僧格整整谈了一天。最后，两人草拟写给中共乌盟工作委员会的复信，林沁僧格让其女婿道布杰誊写后，连夜送往住在阿布日拉图山后的那木吉拉苏仁手中，并叫他将此信亲自送到驻在乌兰花的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

据道布杰回忆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毕力格巴特尔、辛玉、萨木腾诸先生钧鉴：拜读大函，不胜欢欣。谨致问候，遥祝安好。

敬启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等深信不疑。为此，我们郑重宣布，率领全旗民众及全体军政人员从

即日起参加革命。”等语。

一九五〇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四师在围剿分散在阿拉善旗东部和乌拉特中公旗境内的德王残匪及其他土匪时，都得到过中公旗保安部队的有力配合和大力支援。

尽管如此，但是林沁僧格由于他的出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加之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毒害太深，因而他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对革命道理不清楚，虽然参加革命，但仍顾虑重重。一九四九年，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曾两次邀请林沁僧格、巴图毕力格去乌兰花会面，他二人都不敢去，只是派别人代表他们去探听消息。同年十二月底，绥远省政府、绥远省军区和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通知乌盟各旗军政领导到呼和浩特汇报工作，林沁僧格还是没有去，只委派协理巴图毕力格、团长齐鲁二人参加了会议。一九五〇年四月底，在四子王旗乌兰花召开的成立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林沁僧格还是没有亲自参加。

一九五〇年四月，林沁僧格才从阿拉善旗

的希日查干哈达搬回家乡，居住在乌兰敖包和哈拉查盖萨拉。五月间，绥远省人民政府认定林沁僧格是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解放的起义人员，遵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任命林沁僧格为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至此，林沁僧格才完全放下心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的领导，出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其后，曾随同民族上层人物参观团，与其夫人恩和其其格到内地参观，深深地受到了教育。

一九五二年，林沁僧格患病，久治无效，这年冬天在乌拉特中旗政府办公室里突然发病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八、林沁僧格的家族、佣人及财产

一九四九年时，林沁僧格家庭人口共有十九人。除林沁僧格和他的夫人恩和其其格外，林王还生有四子三女。长子巴拉登关布与三子帕拉沁扎布都是喇嘛，次子雄诺栋鲁布一九四九年九月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四子贡布嘎尔，大女儿诺勒金苏荣（道布杰之妻），二女儿色仁米德格，三女儿杨金玛。还有林沁僧格之伯

母娜仁其其格，外甥女吉日吉木、脑尔苏荣、外甥巴图、乌力吉巴图；二儿媳脑尔吉玛（雄诺二老婆）、巴达玛（雄诺三老婆）、女婿道布杰、外甥女婿达瓦桑布、孙子桑嘎（雄诺大老婆所生）等。

林沁僧格诺颜仓的佣人，在王府内有十五人（其中：男十一人，女四人。包括医生和大管家、二管家各一人）。另外还有牧工三十人。

林沁僧格共有牲畜总头数约为四千二百多头（只）。其中有马四群，约一千二百多匹，马倌八人；有牛三群，约二百多头，牛倌五人；有骆驼三群，约三百多峰，驼倌七人；有羊五群，约二千五百多只，羊倌十人。

另外，林沁僧格在大余太有清洪水地一百〇八顷（即一万〇八百亩），佃户六十余户，家兵一个连（佃户中的青壮年怕抓壮丁，便为林沁僧格当兵，护田种地），连长叫僧格。土地达玛拉（即经管土地的负责人）有那木斯来、巴图那生等人。乌汗格日勒按四、六股分成，一般年景林沁僧格王府可收粮（以小麦为主）

三百石（一石为三百斤），丰年可收四百石。还有汽车一辆（在日本占领时曾有过七辆汽车）。

综观林沁僧格，在他的大半生中，由于民族主义思想严重，深深陷入民族主义泥淖中不能自拔。但在另一方面，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为人正直、性情温和、办事民主，爱惜人才，并且大力发展教育，建立公办民族小学三所（男校二所、女校一所），在校生二百余名。举办民族工商业，在旗内兴办了毛织厂和供销社等，给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定好处。

注：这段经历是现海勃湾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绥明同志提供的。

（乌拉特中旗政协供稿）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2 2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